

精神分析经典译丛

# 我们时代的病态人格

[美] 卡伦·荷妮 著

KAREN HORNEY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00120791

B84-065

19



精神分析经典译丛

主 编：孙名之

副主编：陈 收 李肇翔 金 锋

〔美〕卡伦·荷妮 著

# 我们时代的病态人格



北航 C0538789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时代的病态人格/[美]荷妮著;陈收译.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10

(精神分析经典译丛/孙名之主编)

ISBN 7-80105-834-8

I. 我… II. ①荷…②陈… III. ①病态心理学②人格心理学 IV. B8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6618 号

### 我们时代的病态人格

|      |                         |
|------|-------------------------|
| 著者   | [美]卡伦·荷妮                |
| 译者   | 陈收                      |
| 策划编辑 | 江红 陈杰平                  |
| 出版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
| 发行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
| 经销   | 全国新华书店                  |
| 排版   | 博瑞激光照排厂                 |
| 印刷   | 南方印刷厂                   |
| 开本   | 850×1168 32开            |
|      | 6.625印张 145千字           |
| 版次   | 2001年1月第1版              |
|      | 2001年1月第1次印刷            |
| 印数   | 1—5000册                 |
| 书号   | ISBN 7-80105-834-8/B·26 |
| 定价   | 12.00元                  |
|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地址              |
|      | 北京安定门内大街40号 邮编 100009   |
|      | 电话 64010831 64010840    |

## 《精神分析经典译丛》 出版说明

精神分析学说是奥地利精神病医生、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在 20 世纪初创立的。弗洛伊德最初是作为神经病学家和精神科医生来从事研究的。其研究对象主要是歇斯底里症患者。他发现歇斯底里症的根源主要不是由于生理的原因,而是在于深刻内在的心理因素。他将这种内在的心理因素归结为儿童期被压抑的性意识,并由此创立了“无意识性本能学说”,认为神经症的发作就是性意识的长期压抑最后总爆发的结果。弗洛伊德将他的发现加以总结,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最富创见的心理学说,并将这一学说全面推广到哲学、社会、宗教、文化领域,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

但是弗洛伊德的思想体系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即他的全部学说贯穿着生物学观点,否认人性的历史性,否认社会、文化因素对人格发展的影响。随着精神分析运动的发展,一些精神分析学家们不断批判性地发展弗洛伊德的思想,日益强调社会文化因素的作用,逐渐与弗洛伊德的学说分裂和分离。1911 年阿德勒就开始反对弗洛伊德的本能学说,强调社会条件和人际关系对人格发展的影响,建立了精神分析的个体心理学。此后荣格也独树一帜地建立了精神分析的原型理论。尤其是 40 年代在美国兴起的新精神分析学派即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因强调社会文化的作用而

F1333/0P

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形成鲜明的对立,其主要代表人物有荷妮和弗罗姆等人。其中弗罗姆将他的精神分析理论应用在资本主义的社会批判上,形成了独特的精神分析的人本主义思想。

在精神分析运动中,尽管出现了不同的思想,形成了不同的流派,但是精神分析学派总的还是有一些共同的东西,即强调儿童期的影响,强调压抑的作用,用病态的观点来看待现代的人性等。精神分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蓬勃发展,深入到西方社会、生活、思想、文化各个领域,融合到了整个西方社会之中,成了西方社会不可分离的一部分。究其原因,乃是因为两次世界大战对西方人性造成的戕害,以及后工业社会给人的精神造成的强大压力之故。

精神分析学说早在 30 年代就传入我国,近年来出版界也陆续翻译出版了一些精神分析学家的重要著作,尤其是弗洛伊德的重要著作,但是都较为零散,未见系统。在我国,随着高科技的发展,市场经济的深入,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社会竞争日益增强,人们的心理压力越来越大,由此造成的精神苦闷越来越多。尤其是儿童,从小就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压力,这些压力和苦闷如果得不到及时的缓解和宽慰,天长日久就会形成心理畸形和性格变态,导致病态人格或神经症。如何缓解精神压力,如何消除不良影响,如何避免病态人格,如何营造融洽的家庭氛围、和谐的社会环境,健康地生活和成长,这是我国学界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基于此,我们组织翻译了这套《精神分析经典译丛》,希望能够给我国学界和广大读者提供一些参考。本译丛共 18 种,精心选取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阿德勒、荣格、荷妮和弗罗姆的经典之作,分别从性欲、社会、生活环境、文化传统等方面对人的病态心理——大至精神疾患,小至日常笔误、舌误等过失进行了深入的精神分析。读书界完全懂得

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为我所用,这一点无需我们多说。这套丛书是我们精心组织人力翻译完成。尽管如此,其错误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希望方家不吝赐教。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编辑部

1999 年 12 月

# 我们时代的病态人格

[美] 卡伦·荷妮 著

陈 收 译

---

## 导 论

在写这本书时,我心中的目的一直是想给出生活在我们之中的那些病态的人一幅准确的画像,与此相应描述那些在实际生活中驱动他们的那些冲突,他们的焦虑,他们的痛苦以及他们在与他人和自己打交道时所遇到的困境。在这里我并非涉及某一特殊的神经症或几种类型的神经症,而是集中在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反复出现在我们时代的几乎是所有的神经症患者的人格结构上。

我把重点放在实际生活中现存的冲突以及神经症患者解决这些冲突的努力上,集中在实际生活中存在的焦虑,以及他们为对这些焦虑而建立的防御机制上。我将重点放在实际生活的情景之上,这并不意味着我摒弃这样的理念:从本质上来讲,神经症的发展是由于儿童早年时期的一些体验。但是我与很多心理分析学者不同,因为我认为,以一种强烈的偏好把注意力集中在儿童期的经历之上,并认为后来的反应在本质上只是早期反应的重复,这种做法是不合理的。我想表明,儿童时期的体验与后来的冲突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这种关系并不是像某些心理分析学家们所假定的那样只是简单的因果关系。尽管儿童时期的经历对于神经症来说是决定性的条件,但是,这些经历并不是后期困境的惟一原因。

如果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实际的病态困境上时,我们就会认识到,神经症不只是由于偶然的个人经历才产生的,而是由我们生

---

活于其中的特定的文化处境所产生的。事实上,文化处境不仅使个人的经历显得重要而可信,而且它最终决定它们的特殊形式。例如,有人命中注定有一个独断的或者“自我牺牲的”母亲,但是,只在特定的文化处境中,我们才找得到这个独断的或“自我牺牲的”母亲。而且,也正是因为这些现存的处境,这些经历才能对后来的生活施加影响。

如果我们认识到文化处境对神经症患者的重要意义,那么,作为弗洛伊德理论根基的那些生物的和心理的条件就不那么重要了。弗洛伊德的这些条件的影响只有在具有确切的证据的基础上才值得加以考虑。

我的理论取向导致我对神经症的许多基本问题作出了一些全新的解释。尽管这些解释涉及的是迥然不同的问题,诸如:受虐问题、病态关爱需求的内涵、病态罪责感的意义,但是,它们具有共同的基础,这就是:都强调焦虑在产生病态人格倾向方面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由于我的很多解释是偏离弗洛伊德的,有些读者可能会问,这还是不是精神分析?答案取决于他对精神分析的本质持什么样的看法。如果他认为精神分析完全是由弗洛伊德所提出的大量理论构成的,那么,我在这里所做的就不是精神分析。然而,如果他认为精神分析的本质在于某种基本的思想倾向,它涉及的是无意识过程的作用,无意识得以表现的各种方式,使这些过程进入意识的治疗形式,那么,我在这里所做的就是精神分析。我认为,严格地依附于弗洛伊德的理论解释,包含着希望在神经症患者身上寻求弗洛伊德的理论引导人们所预期寻找的东西的危险。它使理论停滞不前。我认为,尊重弗洛伊德的伟大成就,其本身就表明,它是

建立在弗洛伊德所奠定的基础上的,并且用这种方法我们能够实现精神分析的未来所具有的各种可能性,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治疗上都是如此。

上述这些评论也回答了另外的一个可能的问题:我的解释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是阿德勒主义。在某些观点上,我与阿德勒所强调的观点有些相似,但是,从根本上讲,我的解释是建立在弗洛伊德的基础之上的。事实上,阿德勒是这样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如果不在弗洛伊德的基本发现基础上进行研究,而是进行自己的单方面的研究,那么,即使他对心理学的过程富有真知灼见,他的真知灼见也是贫乏无力的。

本书的主旨不在于界定我与其他心理分析学者的异同。总的说来,我讨论的局限在我与弗洛伊德明显不同的那些特定的问题上。

我在这里所呈现的是我在对神经症进行长期的心理分析过程中所获得的一些印象。为了说明我的解释是有根有据的,我不得不在本书中详述一些病史。在一本书中给出神经症问题的一般表现,这程序实在是相当的笨重。然而,即使没有这些材料,专家、甚至门外汉还是能验证我所说的观点的正确性。如果他是一个有心的观察者,那么,他就能将我的假设与他自己的观察和体验加以比较,并在此基础上对我所说的东西加以拒绝或接收,改变或强调。

本书用平实的语言写成,为了晓畅明白,我一直避免讨论过多的枝节。我尽量避免专业性的术语,因为专业术语有碍于清楚明白的思想。这样,对于许多读者来说,尤其是对于门外汉来说,就易于理解病态人格的各种问题。但这可能是一种错误的、甚至是危险的结论。我们无法回避这样的事实:所有心理学上的问题必

然都是极为复杂而精微的问题。如果有任何人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事实,那么我可以提醒他,不要阅读本书,以免在他探求既定的方法时感到可笑和失望。

本书是讲给那些门外汉和那些专门治疗病态人格并熟悉相关问题的那些人听的。这些人不仅包括神经症专家,而且包括社会工作者和教师,还包括那些在研究不同的文化时,意识到心理因素的重要意义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最后,我希望它对神经症患者自己有所助益。如果他不从根本上将任何心理学上的思想斥之为心灵的侵入者和强加的东西的话,那么,他在受苦的基础上,比起其健康的兄弟来,对心理学上的复杂性具有更为敏锐和精细的理解。不幸的是,了解他的境遇不会治疗他;在他所阅读的东西中,他易于认识他人的问题而难以认识自己的问题。

借此机会,我要表示对伊丽莎白·托德女士的谢意,是她编辑了此书。令我思想受益的那些学者,我在正文中都要提到。我主要感谢弗洛伊德,因为他为我们提供了工作的基础和工具,我还要感谢我的病人,因为我的一切见解都来自我与他们的共同工作。

《精神分析经典译丛》

责任编辑

(按姓氏笔划排列)

|     |     |     |     |
|-----|-----|-----|-----|
| 韦尔立 | 王逸明 | 江 红 | 孙进军 |
| 陈杰平 | 李乃庄 | 李正堂 | 李海燕 |
| 李荣贵 | 李 璞 | 张贵来 | 杨 华 |
| 崔曙光 | 曾 林 | 傅芝发 |     |

# 目 录

|      |                      |        |
|------|----------------------|--------|
| 第一章  | 神经症的文化含义与心理含义·····   | ( 1 )  |
| 第二章  | “我们时代的病态人格”的原由·····  | ( 14 ) |
| 第三章  | 焦虑·····              | ( 22 ) |
| 第四章  | 焦虑与敌视·····           | ( 36 ) |
| 第五章  | 神经症的基本结构·····        | ( 50 ) |
| 第六章  | 对关爱的病态需求·····        | ( 66 ) |
| 第七章  | 病态关爱需求的更进一步特征·····   | ( 75 ) |
| 第八章  | 寻求关爱的方法和对拒绝的敏感性····· | ( 89 ) |
| 第九章  | 病态关爱需求中的性欲作用·····    | ( 97 ) |
| 第十章  | 对权力、声望及财富的追求 ·····   | (108)  |
| 第十一章 | 病态的竞争·····           | (126)  |
| 第十二章 | 逃避竞争·····            | (140)  |
| 第十三章 | 病态的罪责感·····          | (156)  |
| 第十四章 | 病态受苦的意义·····         | (176)  |
| 第十五章 | 文化与神经症·····          | (192)  |

## 第一章 神经症的文化含义 与心理含义

今天,我们非常随意地使用“神经症”这个词,却从不曾对这个词意指的内容有一个清楚的概念,“神经症”这个词常常只不过是一种“文雅地”表示不同意见的一种方法:一个人从前可能爱说某某懒惰、敏感、贪婪或多疑,现在则喜欢说某某“有神经症”。然而,当我们使用“神经症”这个词的时候,我们的心中实际上是有所指的,尽管我们不曾清楚地意识到它,但是我们在确定选择这个词的时候,还是用了一定的标准的。

首先,神经症患者的反应不同于一般的人。例如,一个女孩喜欢安于现状,拒绝接受一次加薪,不愿意与上司保持一致,我们就倾向于认为她有神经症;或者一个艺术家,一个星期只挣30美元,但是如果他工作勤奋一些,他本可以挣得更多,可是他不这样做,偏偏喜欢过这种清贫的生活,把大量的时间花在一帮女人身上,或者沉溺于专门的癖好,对此,我们也会认为这个艺术家有神经症。我们之所以要称这些人为神经症患者,其原因在于,我们大多数人熟悉,并且只熟悉一种行为模式,这就是,争取在世界上出人头地,做人上人,挣比满足基本生存多得多的钱。

这些例子表明,我们指称一个人为神经症患者应用的一个标准就是,这个人的生活方式是否与我们时代的普遍认可的行为模

式合拍。一个女孩子没有竞争欲,或者至少没有明显的竞争欲,如果她生活在某种普韦布洛<sup>①</sup>印第安人的文化中,她会被视为完全正常的人;或者,如果一个艺术家生活在意大利南部或墨西哥的一个村庄里,他也会被视为一个正常人。因为,在这些环境中,不可想象,人们在基本需求之外去挣更多的钱或使更多的劲。回溯得更远一点,在古希腊,超出自己需求之外的工作态度被视为是极为下贱的。

所以,神经症这个词,尽管原来是个医学上的术语,但是现在不能没有文化内涵来使用它。人们不用了解一个病人的文化背景即可以诊断他的断腿。但是如果人们称一个印第安男孩<sup>②</sup>为神经症患者,只因为他告诉我们他具有他信仰的幻像,那么我们就大错特错了。在这些印第安人的特殊文化中,幻像和幻觉的体验被认为是一种特殊的天赋,是一种来自圣灵的神恩,具有这种幻觉和幻像的人,他们由此可以享有特殊的威望。在我们之中,如果有一个人与其逝去的祖父谈话,他就会是一个神经症患者或神经错乱的人,而在某些印第安部落,这种与祖先的交流是一种公认的模式。如果提起他逝去的亲属的名字,一个人会感到极为恼怒,我们就会认为这个人是个神经症患者,但是在吉卡里拉、阿巴契印第安人的文化中,<sup>③</sup>他就是一个极为正常的人。一个男人如果走近一

① 美国西南部等处的印第安人的村庄。

② 参见斯库德尔·麦琪(H. Scudder Mekeel)的“医生与文化”(Clinic and Culture)一文,载于《变态与社会心理学学报》(*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第三十卷,1935年版,第292~300页。

③ M. E. 奥普勒(M. E. Opler):“对两个美国印第安部落的矛盾情感的解释”(An Interpretation of Ambivalence of Two American Indian Tribes)载于《社会心理学学报》(*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第七卷,1936年版,第82~116页。

个月经来潮的妇女感到极为害怕,我们就会认为他有神经症,而在很多原始部落里,对月经来潮时的恐惧是一种普遍的态度。

正常的概念不仅在上述不同的文化中具有不同的内涵,而且在同一种文化中也会因世异时移而大异其趣。例如,在今天,如果一个成熟的、独立的妇女认为自己是“一位堕落的女人”,“不值得高尚的男人去爱”,因为她曾经有过性关系,她就会被怀疑成是一个神经症患者,至少在很多社会圈子中被怀疑具有神经症,但是在40年前,这种负罪的态度就会被认为是正常的。正常的概念也因不同的社会阶级的不同而不同。例如,在封建社会里,一个男人成天游手好闲,只痴迷于游猎和作战,人们会认为他是正常的,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如果有封建社会男人的态度,那一定会被视为不正常的。这种正常与不正常的区分还因性别的不同而不同,只要他存在于一定的社会中。例如在西方的社会中就是如此。在这里,人们认为男人和女人具有不同的气质。对于女人来说,当她接近40岁时,成天忧心于衰老是“正常的”,而如果一个男子汉大丈夫在这个年龄里成天喋喋不休他的年龄,那就会被认为有神经症。

在某种程度上,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都知道所谓的正常具有不同的含义。我们知道中国人吃的食物与我们西方人吃的食物不同;知道爱斯基摩人对于净有不同的概念;知道古代的巫医治病所使用的方法与现代医生治病使用的方法完全不同。然而这种不仅在风俗习惯上的不同,与在欲望和情感上也存在着的不同却很少为人所理解,尽管人类学家们曾经或明或暗地阐述过。<sup>①</sup>正如萨

---

<sup>①</sup> 参见人类学文献在这一方面的精妙阐述: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在三个原始社会中的性和气质》(*Sex and Temperament in Three Primitive Societies*);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文化模式》(转下页注)

丕尔<sup>①</sup>所说的那样,现代人类学的功绩之一就是不断重新发现正常的东西。

每一个文化都理由十足地坚持这样的信仰,即只有他们自己的那些情感和欲望才是“人类本性”的惟一的正常表达,<sup>②</sup>对于这一规则而言,心理学也从不例外。例如:弗洛伊德就把他自己的观点总结为:女人比男人善妒,然后设法在生物学的基础上来解释他这一假设的一般现象。<sup>③</sup>弗洛伊德也似乎假设,一切的人类都体验

(接上页注)(*Patterns of Culture*);A. S. 哈洛韦尔(A. S. Hallowell)即将发表的著作:《民族学领域作家的精神分析指导手册》(*Handbook of Psychological leads for Ethnological Field Workers*)。

① 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文艺人类学与神经症学”,载于《变态与社会心理学学报》第二十七卷,1932年版,第229~242页。

② 参见鲁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

③ 在其“两性生理解剖之不同的一些心理结果”一文中,弗洛伊德提出了这样的一种理论:两性生理解剖上的差异不可避免地导致每个女孩妒嫉男孩拥有阳具。随后,女子的这种对拥有阳具的渴望转变为对作为阳具拥有者的男人的渴望。再后,她会妒嫉那些与男人有两性关系的女人——更确切地说,妒嫉这些女人对男人的占有——就像她起初妒嫉男人具有阳具一样。在阐述这类观点时,弗洛伊德经不住他那个时代的诱惑:对整个人类的人性进行一般的概述,尽管他的一般性概述产生于对一个文化领域里的观察。

人类学家不会质问弗洛伊德的那些观察的可靠性,他们会把这些观察当作一定时代一定文化中的某一部分人的观点来接受。然而,他们会指出下述观点来质问弗洛伊德的一般性概述的可靠性:人们对妒嫉的态度千差万别,有些男人比妇女更为善妒,有些男女皆不具有妒嫉,有些男女又都妒嫉异常。考虑到这些不同,他们会拒斥弗洛伊德——事实上是任何人的——这种努力把他的观察放在两性生理解剖上的不同来进行解释的企图。与此相反,他们会强调,有必要对不同的生活景况以及这些生活景况对男女妒嫉之心的影响进行调查。例如,对于我们的文化而言,就有必要质问,弗洛伊德的这些观察对我们文化中的神经症女性来说是正确的,但是它们是否也可以应用到这种文化的正常女性身上呢?之所以必须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那些日复一日地与神经症患者打交道的精神分析学家们经常看不到这样的—一个事实:在我们的文化中还存在着正常的人。同时,还必须质问,产生善妒心理或对异性具有占有欲的生理条件是什么,在我们的文化中,男女之生活景况有何不同以致产生了不同的妒嫉之心。

过谋杀的负罪感。<sup>①</sup> 然而,无可辩驳的是如何对待杀戮,人类之间的态度也有天壤之别。正如彼得·弗洛伊歇(Peter Freuchen)所表明的那样,<sup>②</sup> 爱斯基摩人并不认为谋杀必须加以惩罚。在很多原始部落中,一旦其成员被其他的部落杀死,那么其家族成员的损失可以通过提供一种替代物来加以补偿。在有些文化中,被杀之人的母亲的丧子之痛可以通过收养谋杀者为子来加以平息。<sup>③</sup>

如果我们进一步引证人类学上的发现,我们必定认识到,我们关于人类本性的某些观念是多么的幼稚,例如,竞争的观念、兄弟姐妹之间的对立、感情及性欲之间的亲密关系等内在于人性的一些倾向的观念就是些幼稚的观念。我们关于正常的观念,就是通过认可在一特定团体之内的某种行为和情感标准而获得的。这个特定团体把这些标准加诸于其成员的身上。但是这些标准因文化、时代、阶级和性别的不同而大异其趣。

上述这些考察对于心理学而言初看起来不过如此,其实具有极深刻的意蕴。立竿见影的结论就是,使人们感到心理学的全知全能值得怀疑。从我们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的相同发现之中,我们决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两种文化都是由于同样的动机。认为一种新的心理学发现揭示出了内在于人性之中的一种普遍倾向的观点也不再真实可靠。这一切的作用就是要证明一些社会学家不断断言的那些观点:没有对一切人类都适用的正常心理学。

然而这些限制由于开启了一些认知的新途径而更具广阔前

①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图腾与塔布》。

② 彼得·弗洛伊歇(Peter Freuchen):《北极探险与爱斯基摩人》(*Arctic Adventure and Eskimo*)。

③ 罗伯特·布里福尔特(Robert Briffault):《母亲们》(*The Mothers*)。

景。这些人类学考察的基本内涵就是：我们的情感和态度极大程度地是由我们生活的环境塑造而成的。这种环境既有文化的环境又有个体的环境，它们相互交织在一起，共同作用，相辅相成。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我们了解了我们生存于其间的文化景况，我们就会具有更好的机会更为深入地理解正常情感和态度的特殊性质。而且，由于神经症是正常行为模式的偏差表现，所以，对于他们而言，也就具有更好地理解的前景。

从某程度上来讲，这里所采取的途径，乃是追随弗洛伊德的那条将其最终引向展示一个迄今为止尚未被思考的理解神经症患者的世界的路径。在理论上，弗洛伊德将我们的歧异性格追溯到生物学上天生的本能上，但是，他也曾强调地指出过这样的意见——在理论上，特别是在实践上——不对个人的生活环境进行详细了解，尤其是不对儿童早年所遭受的情感影响进行了解，我们就无法理解一个神经症患者。把相同的原理应用到一种给定文化的正常和病态结构的问题上，就是意味着，如果不详细了解特殊文化对个体施加的影响，我们就无法了解这些特定文化中正常的和病态的结构。<sup>①</sup>

---

① 很多学者都把文化因素的重要性视为心理学情景的决定性的影响。埃里希·弗罗姆在他的“论基督教义的产生”(Zur Entstehung des Christendogmas)(载于 *Imago*, 第十六卷, 1930 年版, 第 307~373 页)是阐述这种方法的第一篇精神分析的文献。其后其他的学者普遍地效尤, 例如魏尔海姆·赖希(Wilhelm Reich)和奥托·芬尼克尔(Otto Fenichel)。在美国, 哈里·斯塔克·沙利文(Harry Stack Sullivan)是第一个看到神经症学必须考虑文化内涵的人。另外的一些美国神经症专家也以同样的方式看到了这个问题, 他们包括: 阿道夫·迈耶(Adolf Meyer)、威廉·怀特(William A. White)的《20 世纪的神经症学》(*Twentieth Century Psychiatry*)、威廉·希利(William A. Healy)和奥古斯塔·布朗纳(Augusta Bronner)的《关于失职的最新启示》(转下页注)

此外,它还意味着我们必须跨出决定性的一步超出弗洛伊德。这样的一步是可能的,尽管这一步是在弗洛伊德发现的基础上迈出的。因为,尽管一方面,弗洛伊德已经走在了他那个时代的前头,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他过分强调心理特征的生物学上的起源,他深陷于他那个时代的科学取向而不能自拔。他假定,我们文化中常见的那些本能欲望或客观关系,乃是在生物学上所确定的“人性”或产生于不可改变的处境(这些处境是在生物学上给定的“前生殖”阶段,即俄狄浦斯情结)。

弗洛伊德对文化因素的轻视不仅导致了错误的结论,而且极大地阻碍了对导致我们的态度和行为的那些真正力量的理解。我认为,这种轻视乃是为什么精神分析——只要它盲目地步弗洛伊德开创的理论之后尘——尽管看起来在其表面上具有无限的潜力,但事实上却在走向死胡同,日益体现出一套不断发展的艰涩理论以及应用一套含混不清的名词术语的主要原因。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神经症患者乃是正常人的偏离。这一标准极为重要,尽管它还不是十全十美。很多人可能偏离了一般的生活模式而不具有神经症特征。上面提到的那位艺术家,他拒绝花更多的时间挣更多的钱,而是满足于基本的生存,他可能有神经症,或者他可能只是极为明智,不想陷入当今生存竞争的恶性斗争之中。另一方面,很多人可能具有严重的神经症,尽管表面看来他

---

(接上页注)(*New Light on Delinquency*)。最近,有些心理分析学家,诸如F. 亚历山大(F. Alexander)和A. 卡丁纳(A. Kardiner),已经开始对心理学问题的文化内涵发生兴趣。在社会学家中,具有这种观点的尤可参见H. D. 拉斯韦尔(H. D. Lasswell)的《世界政治学 and 个人的不安全感》(*World Politics and Personal Insecurity*)和约翰·多拉德(John Dollard)的《生活历史的标准》(*Criteria For the Life History*)。

非常适应现存的生活模式。正是这些病例,使得精神的或医药的观点极为重要。

令人惊奇的是,要从这种观点来说明那些构成神经症的因素是什么则极为困难。无论如何,只要我们只研究表面的现象,就极难发现一切神经症的共同特征。我们绝对不能将症状——诸如恐惧、压抑、功能性生理疾患——用作标准。因为它们不一定会表现出来。因为总存在着一些禁止的作用,其原因我将在后文讨论,但是,这些症状可能会非常精巧,或者说它们非常难以辨认,以至于难以从表面上观察到。如果我们单从表面的现象来判断与他人的那些混乱关系,包括混乱的性关系,也会产生同样的困难。然而有两种特征我们可以在所有的神经症患者身上找到而无需对其人格结构有更为明确的了解:即僵化的行为反应和可能与现实之间的差异。

这两种特征需要进一步的解释。关于僵化的行为反应,我指的是缺乏那种使我们能够根据不同的情境作出不同的反应的那种灵活性。例如对正常人而言,当他感到或看到的那些原因是这么一回事时,他会感到怀疑;然而神经症患者不管情境如何,无论何时何地,他是否意识到他的处境,他都会疑虑重重。一个正常的人可以区分一个人到底是诚心实意的恭维还是假心假意地献宠;神经症患者则分不出这两者之间的不同,他可能在一切情境下都会对之一概反对。如果一个正常人感到无辜受罚,他会恼怒异常;一个神经症患者则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会有恼怒的反应,即使是他认识到他是咎由自取亦复如是。一个正常人可能有时在一件重大的难于决断的事情上犹疑不决;一个神经症患者则无时不是瞻前顾后。

然而,只要当它偏离于文化模式时,僵化的行为反应才是神经症的表现。在西方的文明中,大部分农民对任何新颖的或奇异的事物都有根深蒂固的怀疑。这是一种正常的模式;小资产阶级天生地就注重节俭,这也是一种正常的僵化行为反应。

同理,一个人的内在潜能与他在生活中的实际成果不相一致,很可能只是由于外在的因素。但是,如果他极具天赋,而又有诸多发展的可能性,而此人仍一无建树,那么这也是一种神经症的表现;或者,如果尽管他具有一切足以使他感到快乐的可能性,而仍不能心情舒畅;或者如果尽管她是一个漂亮的女人却仍觉得自己没有吸引男人的能力,这些都是神经症的表现。换言之,神经症患者总是固执于自己的思想而不能自拔。

如果我们撇开这些表面现象不谈,而只是探究产生神经症的动力性效果,就会发现有一种一切神经症都具有的基本因素,这就是焦虑和抗拒它们的防御机制。尽管神经症的结构极为复杂,这种焦虑却是促使一切神经症过程得以运作的动因。这一见解的意义将在后面的章节中加以详细的讨论,因此,此刻我不举实例来加以证明。不过即便我们只是暂时地接受这种观点为一种基本的原理,我们仍然要对此种观点作进一步的阐述。

事实上,这种见解表面上太过宽泛。焦虑或恐惧——让我们暂时交互使用这两个词语——乃是无处不在的,而抗拒焦虑的防御机制也是随处可见。这两种反应并不仅限于人类。如果有一头动物遭受危险的威胁,它就会疯狂反击或者逃之夭夭,我们也同样具有这种恐惧和防御的情景。如果我们担心被雷电击伤,我们就会在屋顶上安上避雷针,如果我们担心某种意外事故,我们就会投资保险以备不测。这里同样存在着恐惧与防御的因素。在每种文

化中,恐惧和防御都有其不同的特定形式,而且可能会加以制度化,例如,为了防御对邪恶之眼的恐惧,人们戴上眼罩;为了防御对死亡的恐惧,人们设计了各种各样的仪式;为了防御月经带来的邪恶,人们就设计了种种禁忌来回避经期中的妇女。

这种相同性使我们忍不住要得出一种错误的逻辑结论。如果恐惧和防御因素是神经症的根本因素,那么,为什么不将那已制度化的反抗恐惧的防御机制称之为“文化”神经症的证据?这一推论的谬误所在乃是由于这样的事实,即这两种现象有共同的因素。但是,它们不一定是完全同一的。人们不能仅仅因为一座房子全是由岩石建筑而成就称这所房子为岩石。那么,使它们专门成为神经症的病态的恐惧和防御的特征是什么?会不会这种病态的恐惧都仅只是想象?不会。因为这样一来我们也可以易于将对死亡的恐惧称之为想象出来的东西;这两种情形都是缘于对病态的恐惧和防御的无知。会不会神经症患者根本不知道他为什么害怕?不会。因为原始人都不知道他为什么有死亡恐惧的情绪。这两者的区别与意识和理性的发展无关,乃是由于下面两种因素。

首先,每种文化的生活境况都会产生某些恐惧。这些恐惧有可能是由于外在的危险(自然、敌人),由于社会关系的形态(由于压抑、不公平、强迫的依赖、挫折产生的敌视),由于文化传统(传统上对鬼魂、对禁忌之破坏的恐惧)引起的,不论他们的来源如何,个人或多或少地屈服于这些恐惧。但是一般而言,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每个人都会具有这样的恐惧,而且无人能够避免。然而,神经症患者不仅具有一般人都具有的恐惧,而且由于在他的个人生活境况中——然而,这种个人的生活境况与一般的境况交织在一起——他还具有另外的恐惧,这些恐惧在数量上和程度上都偏离了

文化模式的恐惧。

第二,在给定文化中存在的恐惧一般都有一定的保护机制(诸如禁忌、仪式、风俗)的防御。一般说来,这些防御机制代表一种处理恐惧的更为方便简易的方法,而神经症患者的防御机制则是完全由另外的方式建立的。所以,正常人,尽管也有他的文化中所产生出来的恐惧和防御,一般仍然能发挥他们的潜在能力,享受生活提供给他们的一切乐趣。正常人能够充分利用他的文化赋予他的一切机会。换一个说法就是,他遭受的只是他的文化中不可避免的那些痛苦,他不会无事生非。与正常人相反,神经症患者遭受着比一般人多得多的痛苦,他始终得为他的防御付出额外的代价,因而在生机和扩展性上受到阻碍,或者更为具体地讲,在建功立业、享受生活方面受到阻碍,从而导致了我们在上面所提到的分裂情况。事实上,神经症患者始终在遭受着痛苦。在讨论那些一眼而知的神经症特征时,我之所以没有提及这一事实,惟一的原因就在于,这些情况不表现出来时,人们不一定能够看得到,甚至神经症患者自己可能也意识不到他在遭受痛苦这一事实。

说到恐惧和防御,我担心此时很多读者会没有耐心阅读用这么大的篇幅讨论神经症的构成这种简单的问题。长话短说,心理现象向来都是复杂的,但表面看起来相当简单的东西绝不能给出一个简单的答案,一开始我们就碰到的这个困境也不例外,在整部书中,无论我们处理什么问题,都会涉及到这个困境。描述神经症患者的主要困难在于,我们既不能单用心理学的工具,也不能单用社会学的工具来提供一个满意的答案,而必须交互使用这两种工具。一会儿要使用心理学的工具,一会儿又要使用社会学的工具,就像我们在前面已经做过的那样。如果我们只是从动力学或心理

结构上的观点来处理神经症患者,我们就会假定正常人根本不存在。只要我们超出我们的国界或具有与我们相同的文化的国界,我们就会陷入更大的困境。如果我们用社会学的观点来处理神经症患者,把他们仅仅当作是一定社会的共同行为模式的偏离,我们就会大大地忽视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那些神经症患者的心理特征,没有哪一个学派和国家的心理医生会把这些结果当作他们久已习惯称之为神经症患者的结果之一。因此应该将这两种方法协调成为一种方法,即既要考虑到外在的表面上神经症,又要考虑到涉及心理过程的动力学上的神经症,但又不将其中的任何一种方法看做最初的和具有决定性的方法。这两种方法必须结合在一起。一般说来,这是我们上文中已经采用过的方法。因为我们指出,恐惧和防御是神经症患者的动力中心之一,但是,只有当他们偏离同一文化中的恐惧和防御模式甚多或甚大时,才足以构成神经症。

我们还得沿着这个方向再进一步。神经症还有另一种本质性的特征,这就是,神经症患者还有一种矛盾冲突的倾向。对这种倾向,或者,至少对这种倾向的内容,神经症患者自己毫无察觉。而且对这种冲突自动地试图加以调和、解决。弗洛伊德将这种特征称之为神经症不可或缺的因素。病态冲突与文化中的共同冲突之不同,既不在于冲突的内容,也不在于病人是否根本上对此有所意识——在这两点上,一般的文化冲突都是一致的——而是在于这样的事实,即神经症患者的冲突极为强烈,而且这种冲突会越来越重,神经症患者试图减轻和解决冲突——这种减轻和解决冲突的努力恰恰是病态的——而且不能令一般人满意,往往损害了完整的人格。

反思这些考虑,我们尚不能对神经症有一个完满的定义,但是

我们可以对神经症作出这样的描述：神经症是由恐惧和防御恐惧并试图找到解决冲突倾向所产生的心理困扰。基于实际的理由，我们最好只有在这种心理困扰偏离了特殊文化中的共通模式时，才称之为神经症。

## 第二章 “我们时代的病态人格”的原由

由于我们的兴趣集中在神经症影响人格的方式上,所以我们探究的范围设定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有很多这样的神经症出现在人们身上,即他们的人格是正常的,未曾受到歪曲,却也会由于对充满了矛盾冲突的外在环境的反应而产生神经症。在讨论了某些基本心理过程的性质之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简要地考虑一下这些单由环境产生的神经症的结构。<sup>①</sup> 我们现在的主要兴趣不在它们身上,因为它们并不表现为病态人格,而只是暂时不能适应既定的困难处境。当我们说到神经症时,我们指的乃是性格上的神经症,即情景,在其中——尽管其症状的表象与神经症的症状完全一致——主要的困扰在于性格的扭曲<sup>②</sup>。它们乃是潜在的慢性过程的结果,一般在孩提时代就已开始,并或多或少,或强或弱地影响到人格的一部分。从性格神经症的表面来看,也可能是由于实际的情景冲突而产生的,但是如果仔细地研究一下该病人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这种困难的性格特征早在情景混乱之前就产生了,暂时性的困境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早先存在的个人困境,而且,

---

① 情景神经症实际相当于 J. H. 舒尔茨(J. H. Schultz)所说的“外源少见神经症”(Exogene Fremdneurosen)。

② 弗兰茨·亚历山大曾建议用神经症这个词指称缺乏临床症状的那些神经症。我认为这个词不太适当,因为症状的有无常常是与神经症的性质无关的。

该病人会对一种生活情景有病态的反应,而对于一般的健康人来说,这种生活情景根本就不是什么冲突。这种情景只是显露了早已存在的神经症的存在。

另一方面,我们对神经症的症状表象并不太感兴趣。我们的兴趣主要在性格困扰本身,因为人格扭曲是神经症中常见的现象,而在临床上的症状不同或完全没有。而且,从文化的观点上看,性格形成比症状更为重要,因为是性格而不是症状影响着人类的行为。熟知神经症的结构,认识到症状的治疗不一定就意味着神经症的痊愈,一般说来,心理分析的兴趣和注意力集中在性格扭曲上而不是在症状上。具体地讲,我们可以说,并不是火山本身,而是火山的爆发,而病源的冲突则像火山一样藏在个人的深处,不为病人本人所知。

认可了这一限制,我们可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现代的神经症患者是否具有我们所说的我们时代的神经症患者根本上具有的那种共同特征?

至于伴随着不同类型的神经症患者的性格扭曲,令人惊异的是它们的差异而不是它们的相同之处。例如,歇斯底里性格就完全不同于强迫性人格。然而,使我们惊异的这些不同性格是结构上的不同,或者,用更一般的词来说就是两种困扰显现的方式之不同,以及解决困扰的方式之不同,例如:在歇斯底里性格中,投射占了大部分的作用,与之相比,在强迫的性格中,理智的冲突则占据了大部分的作用。另一方面,我心中所想的相似性并不是外表的行为或它们产生出来的方式,而是它们的冲突内容的本身。更确切地说,这些相同性主要的并不在于造成困扰的经验,而在于实际上推动人们失常的那些冲突。

为了澄清原发的力量和它们的类型,有必要作出一些假设。弗洛伊德和大多数精神分析家都强调这样的原则,分析的任务是通过发现性欲冲动的根源(例如特殊的性感区域)或一再重复出现的孩提类型来完成的。尽管我认为不追溯病人孩提时的处境就不能完全理解神经症患者,但是我相信,如果片面运用发生学上的探究方法,就会弄乱问题,而不会澄清问题,因为它会导致人们忽视实际存在的无意识的倾向、这些倾向的功能以及与其他倾向的交互作用。这些其他的倾向包括:冲动、恐惧和防御性措施。发生学上的理解只有在它帮助功能上的理解时才是有用的。

根据这一信念,在分析时,我已经发现,大多数不同的人格,属于不同的神经症类型,它们会因年龄、气质、兴趣而不同,它们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那些基本的动态中心冲突和它们的交互关系内容,在本质上是完全相同的<sup>①</sup>。我在心理分析实践方面的经验已经为非心理分析的人们和当代文献中的那些人格的观察所证实。如果神经症患者的那些一再重复出现的问题在于被剥夺了他们常常具有的那些丰富多彩的和奥妙无穷的性格,那么我们会注意到,它只是在程度上不同于在文化上困扰正常人的那些问题。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得不与竞争、害怕失败、情感孤独、不信任他人和我们自己等问题进行心灵上的争斗,但是神经症患者的问题则比这些问题多得多。

一般说来,同一文化中的大多数人都不得不面临同样的一些问题。这一事实表明了这样的结论,即这些问题是由这个文

---

<sup>①</sup> 对这种同一性的强调并不意味着无视对特殊的神经症类型的科学研究。相反,我深信在描述心理困扰的整个情景、它们的起源、它们的特殊结构和特殊表现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化中存在着的特定生活处境所造成的。它们并不代表“人类本性”所共有的问题,这一点可以由下述事实得到确证,即其他文化中的原发力量和冲突与我们文化中的不同。

因此,在谈到我们时代的病态人格时,我不仅指的是存在着具有基本的共同特性的神经症患者,而且指的是,这些基本的共同性根本说来是由我们时代和文化中的现存的困境所产生的。随后,我将尽我所了解的社会学知识向大家表明我们文化中的哪些困境要对我们具有的心理冲突负责。

我所假定的文化与神经症之间关系的正确性应该由人类学家和神经症学家的共同努力来证实。神经症学家不仅要研究出现在某一特定文化中的神经症,就像人们所做的那样,用正常的标准研究神经症的发病率、发病的严重性以及神经症的类型,而且尤为重要是,他们应该从这些文化所潜藏的基本冲突的观点来研究神经症。人类学家则应该从文化结构为它的人民制造了何种心理困境这样的观点来研究同样的文化。在这些基本冲突中所表现出来的相似性之一乃是易于进行表面观察这种态度的同一性。所谓表面观察,我指的是一个好的观察者无须借助于心理分析技术的工具,就能从他所熟悉的人那里,比如他本人、他的朋友、他的家庭成员或他的同事那里发现神经症患者。对这一经常可能的观察,我将作一简短的概述。

所以,这种可观察的态度可以按照下列方式大致作出分类:第一,给予和获取爱的态度;第二,自我评估的态度;第三,自我肯定的态度;第四,侵略性;第五,性欲。

关于第一点,我们时代的神经症的主要倾向之一就是过分地依赖于他人的支持或依赖于他人的关爱。我们都希望讨人喜欢并

且受到他人的称赞,但是在神经症患者那里,这种对关爱和支持的依赖大大地超过了他人生活中应具有的关爱的真正意义。尽管我们希望我们所爱的人喜欢我们,但是在神经症患者那里,却存在着对欣赏和关怀不加分别的渴求,不管他们是否关心他人,他们对这些人的判断是否具有任何意义,他们往往意识不到这种无休止的需求,但是当他们所渴求的关心没有来临时,他们就会在他们的敏感上出卖他们的存在。他们可能感到受到了伤害,例如,如果某人不接受他的邀请,有时不给他打电话,甚至只是不同意他们的某些意见,他们就感到深受伤害。这种敏感性可能会被一种“管它呐!”的态度所消除。

而且,在他们希望得到的爱与他们自己感受爱和给予爱的能力之间存在着一种明显的矛盾。他们一方面渴求他人满足自己的希望,另一方面对他人的需求漠不关心。这种矛盾的态度并不是总能表现出来。例如,神经症患者很可能过分地关心和渴望帮助他人,但是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时,我们可以注意到,他的这些行为是出自强迫的,而不是自发地出自内心的热情。

在这种对他人的依赖感中表现出来的内在的不安全感,是我们在对神经症患者进行表面观察时感到惊异的第二个特征,自卑和能力不足的感觉乃是神经症患者普遍具有的特征。它们的表现方式多种多样,诸如,没有能力、感到愚笨、没有吸引力等想法——而这些想法在现实的生活中是没有任何基础的。有些天资聪慧的人可能会感到自己愚不可及,有些美丽如花的妇女感到她们没有吸引力。这些自卑感可能会以抱怨和担忧的形式明显地在表面上表现出来,或者这种根本没有的缺陷,会被认为是理所当然,当作一种事实而在上面花费许多心思。另一方面,他们可能用自我夸

大这一补偿性的需求来加以掩饰,以强迫性的习性来炫耀,以我们文化中的一切沽名钓誉的特性来哗众取宠:诸如爱钱如命、收藏古画、收藏古旧的家具、占有女人、与名人攀关系、到各地旅游或炫耀自己的知识等等来掩饰自己内心的冲突。这两个方面的倾向可能会有一个方面完全突出地表现出来,但是更为普遍的是,人们可能会不分轩輊地感到这两个方面倾向的同时存在。

第三种态度,即自我肯定,包含了明确的禁止作用。所谓自我肯定,我指的是肯定自我或自己的主张的行为。我并不是在过分地引人注目或出风头这种意义上来使用这一术语的。在这一点上,神经症患者表现出许多的禁止作用。他们在表达自己的欲望或寻求某物、按照自己的兴趣做某事、表示一种意见或作出一些批评、命令某人、选择希望交往的人、与人打交道等等事情上,他们都禁止着自己的行为。他们在我们所谓的坚持自己的原则方面也有所禁止:神经症患者往往无法保卫自己防止他人的攻击,或者,如果他们不愿意接受他人的愿望时,他们无法表示拒绝,例如,一个推销女郎向他推销他不想买的东西,或一位邀请他参加集会的人,或一位想与之做爱的人等等,虽然他心中想拒绝,但却无法拒绝。最后,还有对他所需要的东西进行认知方面的禁止:在作出选择、形成意见、勇于表达符合自己利益的愿望方面都有障碍。他们常常不得不掩饰这些愿望。我的一位朋友在作出他自己的考虑时,有许多的禁止。如电影必须是有教育意义的,饮酒必须限制在健康的限度之内。尤为重要的是这后一类人,他们不能作计划,<sup>①</sup>

---

<sup>①</sup> 在《命运和神经症》(*Schicksal und Neurose*)一书中,舒尔茨-亨克(Schultz-Hencke)是少有的几个精神分析家之一,他充分地把兴趣集中在这一重要观点上。

无论是一次旅行还是描绘人生理想,神经症患者都漂浮不定,犹豫不决,甚至职业和婚姻这样的重要决定,他们也没有一个自己在生活中到底要些什么这样一个清楚明白的概念。他们完全是由某种病态的恐惧所支配的,正如我们在守财奴身上所见到的那样,这种守财奴因为害怕贫穷而积攒钱财;或者卷入那些无休无止的恋爱绯闻的人,这些人害怕进入一项建设性的工作。

第四种障碍,即侵略性,我指的是,反对他人、攻击他人、损害和侵犯他人的行为或任何一种敌视的行为,这种态度与自我肯定的态度完全相反。这种困扰表现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方面。一方面是倾向于进攻、统治、过于精确、管制他人、欺骗或吹毛求疵。具有这些态度的人偶尔能意识到自己的进攻性,但是通常他们很少意识到这一点,并且在主观上确信他们是诚实的或仅仅表示一种意见,或认为他们的要求极低,尽管在现实中他们十分蛮横、咄咄逼人。然而,在另外一些人那里,这些困扰的表现完全相反。人们会发现这些人在表面上很容易感到受了欺骗,被人统治,受到了斥骂,被侮辱或损害的态度。这些人常常也意识不到这只是他们自己的态度,而是悲哀地认为,全世界都在反对他、管制他。

第五种态度即在性欲方面的态度的特殊性可以大致地归类为对性行为的一种强迫需求或对性行为的禁止。这种禁止可能会出现在对任何导致性欲满足的步骤的禁止上。这种禁止可能发生在对异性的追求上,对求爱、或享受性爱上。前面所描述的那些特有的态度都会在性欲的态度中表现出来。

也许我们应该更加详细地描述我们在上文中所提到的那些态度。然而,在下文,我将返回到前面提到的每个态度,而现在若对此进行喋喋不休的讨论,并不会使我们更了解它们。为了更好地

了解它们,我们必须考虑产生这些态度的那些动力过程。为了认识这些深藏不露的动力过程,我们会看到所有这些态度,尽管它们看起来缺乏一贯性,但是它们在结构上都是相互关联的。

### 第三章 焦 虑

在详细地讨论现今的神经症之前,我必须拣起我在第一章中遗留下来的那些没有做完的事情中的一件,并澄清我所说的焦虑的内涵。这么做非常重要,因为正如我在上面所说的,焦虑是神经症的动力中心,所以我们无时无刻不与它打交道。

在前面我就把焦虑作为恐惧的同义词来使用,由此表明了它们之间的紧密关系。事实上,它们都是对危险的一种情感上的反应,而且都伴随着生理上的感觉,如颤抖、盗汗、剧烈地心跳,这些生理反应可能非常强烈,一种突然的、强烈的恐惧可能会导致死亡。然而,它们二者也有不同之处。

一个小孩只是出了一点丘疹或轻微的感冒,做母亲的就担心孩子会死,我们称这种担心为焦虑;但是如果小孩生严重的疾病,做母亲的担心孩子会死,我们就称之为恐惧。如果一个人站在高处,或必须讨论他所熟知的主题时表现出害怕的态度,我们就称之为焦虑;如果一个人在风雨交加的山上迷了路,因而表现出害怕的态度,我们称之为恐惧。至此,我们有了一个简单而明晰的区分:恐惧乃是对一个人不得不面对的危险的一种适当的情绪反应,而焦虑则是对这种危险不适当的反应,或者甚至是对想象出来的危险的一种反应。<sup>①</sup>

---

<sup>①</sup> 在《精神分析导论讲演新篇》(*New Introductory Lectures*)(转下页注)

然而,这一区分有一缺陷,这就是,决定反应是否适当得依据特定文化中存在的一般的知识。但是,即使这种知识宣称某一态度是在此文化中未曾见过的态度,神经症患者也会毫无困难地在他的行为找到一个合理的基础。事实上,如果人们告诉一个神经症患者说他可能会遭到一个胡言乱语的疯子的攻击之担忧是一种病态的焦虑,那么就会陷入无望的争论。这个神经症患者会指出他的恐惧是实实在在的,并会指出他所害怕的那种东西会发生。如果一个人实际的恐惧的反应与他所遭受的危险不相一致,那么即使是原始人也会变得同样地固执。例如一个部落的原始人在吃某种动物上有些禁忌,如果他偶尔误食了所禁忌的肉食,那么他也会害怕得要死。作为一个外在的观察者,你可能会称这种恐惧为不适当的情绪反应,认为在事实上是一种没有任何根据的幻想。但是一旦知道了这一部落的禁忌你就会认识到这一处境对于误食人来说代表着一种真正的危险,这是一种会使狩猎和捕鱼一无所获的危险,或者这是一种会导致疾病的危险。

然而,我们在原始人身上发现的焦虑与我们所说的我们时代的神经症患者的焦虑之间有一种不同之处。神经症患者焦虑的内容不同于原始人焦虑的内容,原始人焦虑的内容是同一部落的人都感到焦虑的内容,而神经症患者焦虑的内容不是大家都感到焦虑的内容。在这两种人之间,一旦焦虑的意义得到了理解,不当反应的印象也就消失了。例如,有些人对死亡有一种恒久的焦虑,另一方面,由于他们遭受的苦痛,他们有一种想死的隐秘欲望。他们

---

(接上页注)的“焦虑与本能生活”这一章中,弗洛伊德在“喜欢的”和“病态的”焦虑之间作了相似的区分,他将前者称之为“对危险的理智的”反应。

对死亡的不同恐惧,加上与他们对死亡的一厢情愿的想法混合在一起。产生了对逼近危险的强烈忧虑。如果人们了解了所有这些因素,人们就忍不住称他们的这种死亡焦虑为正常的反应。另外一个简单的例子也可以在这样的一些人身上看到,当他们发现自己正置身悬崖边缘,或一个很高的窗户边,或在一座很高的桥上时,他们就感到非常恐惧。这也是一些无中生有的恐惧,这种恐惧反应看起来是一种不当反应。然而这种处境也许在他们的内心产生过,或者在他们内心中引起这样的冲突:是生存还是忍不住要从高处往下跳?!正是这种冲突致使他们感到焦虑。

所有这些论点都表明我们的定义必须加以改变。恐惧和焦虑都是对危险的不当反应,在恐惧的情形中,危险是一种透明的、客观的东西,而在焦虑的情形中,危险是一种深藏不露的、主观的东西。这也即是说,焦虑的强度取决于处境对某人的意义,对于神经症患者来说,他为什么感到焦虑他本人根本就不知道。

焦虑与恐惧之间的不同,其实际内涵在于,试图说服神经症患者摆脱焦虑——说服的方法——是没有用的。他焦虑的不是现实生活中实际存在的处境,而是在他的内心出现的处境。因此,治疗的任务只能通过找出这一处境对他的意义来求得问题的解决。

在确定我们所说的焦虑的内涵的性质以后,我们还必须找出焦虑所起的作用。我们文化中的一般人很少意识到焦虑在他的生活中的重要性。通常他们只记得在孩提时代有过焦虑,他做过一次或多次焦虑的梦,当情景超出常规以后,他感到极为恐惧,例如与一位有影响的人作一次重要的谈话,或在考试之前都有过焦虑。

关于这一点,我们从神经症患者身上得到的知识并不统一。有些神经症患者完全意识到他们为焦虑所苦。其表现千差万别:

它可能表现为烦躁不安的焦虑,以焦虑——攻击的形式表现出来;它也可能与特定的处境或活动联系在一起,如恐高、恐上街、恐公众表演;它也许有一确定的内容,如担心失去理智,得癌症、吞针头等。其他的人认识到他们不时有焦虑,他们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这些神经症患者焦虑的处境,但是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些处境的重要性。最后,有些神经症患者只是意识到压抑、不满足感和在性生活中的困扰。但是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有过或曾经有过焦虑。然而,进一步的探究,通常即可证明他们的那些说法并不准确。在分析这些神经症患者时,人们总是会发现他们也像前面所说的神经症一样,在其表面之下深藏着焦虑。精神分析使得这些神经症患者意识到他们先前的焦虑,他们可能会回忆起他们的焦虑的梦或使他们感到恐惧的那些情景。然而,他们所承认的焦虑的程度通常不会超过正常人的程度。这表明,我们可能有尚未知晓的某些焦虑。

如果按照上述方式进行描述,这里所说的问题的意义就显示不出来。它只是整个问题的一部分。我们有关爱、生气、怀疑的感受,它们来得如此之快,以致我们难以意识到它们;它们是如此的短暂,以致我们很快便忘了它们。这些感受可能真是无关紧要而又短暂易逝,但是在他们的身后恰恰隐藏着巨大的动力力量。我们对某一情感的意识程度并不表明这一情感的力度或重要性。<sup>①</sup>关于焦虑,这不仅表明我们可能有我们未曾意识到的焦虑,而且还表明这种焦虑很可能是我们生活中的决定因素,而我们并未意识

---

<sup>①</sup> 这只是弗洛伊德的基本发现——潜意识因素的重要性——这一方面的一段释义。

到这一点。

事实上,我们仿佛在极力地逃避焦虑,或者避免感受它。对此有很多的原因,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强烈的焦虑是我们所具有的最折磨人的情感。那些遭受过强烈焦虑的病人们,他们宁死也不愿再体验焦虑的感受。此外,焦虑中还包含着某些因素,这些因素对病人尤为难以承受。其中一个因素就是无助。在面对巨大的危险时,人们可能会变得积极而有勇气。但是在焦虑状态中,事实上,人们感到非常无助。要承认无助对于那些满脑子只是权力、地位、控制任何处境的那些人来说,特别难以忍受。由于感到他们的反应明显不当,他们恼恨它,好像它代表一种软弱或懦弱似的。

焦虑中的另一个因素是明显地非理性。容忍任何非理性的因素控制他们,对于有些人来说更是无法忍受。对于那些隐秘地感到内心中非理性矛盾的力量应接不暇的危险的人,和那些自动地训练自己受理智的严格控制的人而言,这种非理性是特别无法忍受的。所以,他们根本不愿忍受这种非理性的因素。除了包含着这些个人性的动机之外,这后一种反应还涉及一种文化的因素,只要我们的文化特别强调理性的思维和行为,并认为非理性或看起来是非理性的东西是低劣的话,情况就是如此。

在一定的程度上与此相联系的焦虑中的后一种因素:由于焦虑的这种非常强烈的非理性因素,焦虑表现出一种隐藏的警告,即我们内心的某些东西会失去控制,所以它要强烈地控制我们内心的某种东西。不仅我们有意识地将它看做是一种挑战,而且在内心隐秘地认为我们在进行挑战,不论我们是否选择承认这种态度。我们大家都不会喜欢这种挑战,人们很可能会说,我们反对的就是认识到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某些态度。然而,一个人越是感到无

助,越感到他已经陷入到这种恐惧和防御机制的复杂网络之中而不能自拔,他也就越执着于这样的幻想:他是对的,他在每件事情上都完美无缺,他在本能上也就反对任何——即便只是间接的和隐秘的——他做错了这样的提示,并不作任何态度的改变。

在我们的文化中,逃避焦虑有四种方法:理性化,否认,麻痹,避免可能会产生焦虑思想、感受、冲动的情景。

第一种方法——理性化——乃是避免责任的最佳解释方法。它包括将焦虑转化为理性的恐惧。如果这种转换的心理价值为人所忽略,我们就想象说,这种理性化并没有改变什么。那位过分担心她的孩子的母亲事实上正是关心她的孩子,不管她是否承认她具有焦虑的情绪或是否她把她的焦虑解释为合理化的恐惧。然而我们则可以在任何时候做下述的实验:告诉这位母亲,她的反应不是理性的恐惧,而是一种焦虑,告诉她,这是对现存危险的一种不当反应,并且包含了个人的因素。她的反应会是,竭力否认你的指教,并且使出浑身的解数来证明你是错误的:玛丽不是在托儿所感染上这种病的吗?强尼不是在爬树时摔断腿的吗?最近不是有人用糖果来诱骗孩子吗?她的行为难道不是完全出自关爱和责任感吗?<sup>①</sup>

无论何时,当我们碰到这种对非理性态度的竭力防御时,我们都会确信,这种防御的态度对个人具有重要的功能。这样的母亲不但不会对她的的情绪感到无助,相反她会感到她能积极地为这种处境做些事,她不但认识不到她的软弱,相反她会为她的高标准感

---

<sup>①</sup> 参见桑多·拉多(Sandor Rado):《过分操心的母亲》(*An Over-Solicitous Mother*)。

到自豪。她不仅不承认她的态度充满了非理性的因素,相反她感到自己是非常理性和合理的。她不但正视和挑战以改变她内心中的某种东西,相反她却把她的责任转嫁给外部世界,由此逃避面对她内心的动机。当然,由于她不摆脱她的担心,她不得不为她暂时的有利付出代价。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孩子得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但是她认识不到这一点,总而言之,她不想认识到这一点,因为她深深地陷入这样的幻想而不能自拔:自己可以不必改变内心的缺陷,而又能设法拥有改变所获得的一切利益。

对于相信焦虑是一种理性的恐惧的一切倾向而言,这一原理是千真万确的真理,而不论它的内容是:分娩的恐惧、对疾病的恐惧、对食物的恐惧、对灾祸的恐惧、还是对贫困的恐惧,都是如此。

逃避焦虑的第二种方式是否认它的存在。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除非否认它,也即是说将它从我们的意识中排除出去,否则我们也拿焦虑没有办法。诸如颤抖、盗汗、心跳加速、喘不过气来、尿频、呕吐、腹泻,以及在心理方面的烦躁不安的感觉,受打击或麻痹了的感觉,所有这些现象都是恐惧或焦虑的生理上同时发生的情况。我们担心或意识到恐惧和焦虑时,我们都有可能具有这些情感和生理感觉;它们也可能是现存的被压抑的焦虑的唯一表现。在后一种情况中,个人对他的情景所了解的一切是如此的明显易见,因为在某一处境中他不得不频繁地去小便,在火车上会感到眩晕呕吐,在夜里会不时地盗汗,而这一切都没有任何生理上的原因。

然而,也有可能有意地否认焦虑,有意地去克服它。试图通过不断地忽视它而摆脱恐惧,这种情况偶尔也发生在正常人的身上。这种情况最常见的例子是士兵,他们不断地促使自

已克服恐惧,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行为。

神经症患者也可能有意识地决定去克服这种焦虑。例如,一位临近青春期的姑娘,深受焦虑的折磨,特别害怕遭到抢劫,因此有意识地决定无视这种焦虑,夜晚独自一人睡在阁楼,独自一人在空荡荡的房子里踱步。她告诉心理学家的第一个梦显现出她的这种态度的各种不同的方面。它包括事实上是恐惧的各种情景,但是每一次她都勇敢地面对这些恐惧的情景。有一次,她在夜里听到花园里有脚步声,她走到阳台上问道:“谁在那儿?”她成功地摆脱了对抢劫的恐惧,但是她根本没有改变激发她的焦虑的那些因素,因此,仍然存在的焦虑所产生的其他的结果依然存在。她继续逃避现实,胆小怕事,她感到自己是个多余的人,不能安下心来做任何有建设性的工作。

在神经症患者心中,这种有意识的决定并不常有。通常这些过程都是自发的。然而神经症患者与正常人的不同之处不在于有意识地作出决定的程度,而是它所产生的结果。神经症患者“集中精力”所获得的一切结果乃是摆脱一种特殊的焦虑现象,就像前面所说的女孩那样,摆脱的只是对抢劫的恐惧。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要低估这一结果,它可能有实际的价值,也可能在加强自尊心上有生理上的价值。但是由于这些价值常常作了过高的估计,因此有必要指出它的消极的方面。<sup>①</sup> 不仅人格基本的动力学依然没有改变,而且,当神经症患者丧失了存在于他内心的困扰的某一显著现象时,他也就同时丧失了把握住它们的关键刺激。

---

<sup>①</sup> 在强调症状的消失不是痊愈的充分表现这一观点时,弗洛伊德总是强调这一点。

漫无目的地摆脱焦虑的过程在许多神经症患者身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且常常认识不到这种摆脱过程。例如,侵犯性,在一定的处境中,很多神经症患者都会表现出来,却常常被认为敌视对手的一种直接表达方式,然而,它最初很可能是一种处于一种受攻击的压力下克服怯懦的不相干的表现。敌视的态度也会经常存在,此时神经症患者可能会大大地表现出他所感到的侵略性,他的焦虑促使他去克服他的怯懦。如果这一点被忽视了,就会存在将不相干的侵略性错当成真实的侵略性的危险。

第三种消除焦虑的方法就是麻痹它。这一点可以有意识地做到。而且确切地说是通过酗酒和吸毒来达到。然而,还有很多方法做到这一点,而它们之间没有明显的关联。其中之一就是因害怕孤独而投身于社会活动;不论这种恐惧是否已经被认识到,还是表现为模糊的不安,都不可能改变这种情景。另一种麻痹焦虑的方法是沉溺于工作,这种过程我们可以从工作的强迫特征上认知,也可以从在星期日和节假日中表现出来的不自在上来认知。同样的目的也可以通过对睡眠的极度需求来达到,虽然从睡眠中往往不能获得清醒的结果。最后,性欲活动也可以作为一种安全的阀门来排遣焦虑。人们早就知道强迫性的手淫可能是由焦虑产生的,但是,各种性关系也是由焦虑产生的。那些主要是通过性欲活动来缓解焦虑的人,一旦没有机会获得性欲的满足,即便是在短时间内,就会变得极为不安和恼怒。

逃避焦虑的第四种方法是最极端的方法:它包括躲避那些可能会产生焦虑的一切情景、念头或感觉。这可能是一种有意识的过程,就像害怕开车的人不去开车,害怕爬山的人不去爬山,都是这种方式的表现。然而,他也有可能模糊地或根本没有意识到他

有焦虑症,而且可能是在模糊地或根本没有意识到他在逃避焦虑。例如,他可能在某些事情上有些延搁、踌躇,因没有这方面的知识而没有将它与焦虑联系起来。例如在作出决定、看医生或写信等方面。或者他可能“假装”,也就是说主观上相信他所计划的这些活动——如参加一次讨论会,给部下下达一次命令,与另外一个人疏远——并不重要。或者,他可能“假装”不喜欢做这些活动,并且以此为理由躲避它。一个害怕在集会上被人忽视的女孩可能会逃避集会,而自欺欺人地说她不喜欢社交活动。

如果我们进一步指出这种逃避是自发地起作用的,我们就可以看到一种禁止现象。所谓禁止,它包括不能去做、感受或思考某种事情。它的功能乃是逃避那些为去做、去感受或去思考某种事时就会产生的焦虑。人们意识不到这种焦虑,而且无法通过有意识的努力来克服这种禁止。这种禁止作用在功能性的歇斯底里丧失中,以最为引人注目的形式表现出来:歇斯底里的失明、失语或四肢瘫痪。在性欲范围内,性冷淡和性无能是这种禁止的典型代表,尽管这种性欲禁止的结构可能非常复杂。在心理范围内,常见的禁止现象包括注意力不能集中,不能形成和表达自己的意见,不能与他人交往等等。

如果花几页的篇幅专门罗列禁止的现象,以使对禁止的各种不同形式和禁止出现的频率有一个完整的印象,应该是很有价值的。然而,我认为,我应该把这个题目留给读者自己去观察,因为禁止是日常中常见的现象而且很容易认识,如果它们充分表现出来的话。这里也有必要简单地考察一下必要的前提条件,以便人们认识到禁止作用的存在。否则,我们就会低估了禁止发作的频率,因为我们通常并没有意识到我们真正具有的禁止作用到底有

多少。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值得做些事情以便意识到我们不能做它。例如,在我们认识到禁止作用之前,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拥有达到这些事物的野心。有人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是否不常知道我们想要什么,但事实上决非如此。例如,让我们假设有一个正在听一篇论文的宣读,并对此篇论文想作些批评。但是他怯于表达他的批评,此时就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禁止;有时会出现一种强烈的禁止,使他不能组织他的思想,结果在讨论结果之后或者在第二天的早晨这些组织才会又回到脑海中来。有时禁止更为强烈,以致阻止他有批评的念头,而在这种情形下,假定说他事实上感到要对该篇论文进行批评,可是却又易于盲目地接受宣读者所说的观点或者甚至对他表示钦佩,而他根本没有意识到他有任何禁止。换言之,如果禁止作用强大到检查欲望和冲动,那么就不可能意识到禁止作用的存在。

如果禁止作用在一个人的生活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功能,使得他乐于坚持认为这是不可战胜的事实,那么阻止意识的第二种因素就会出现。例如,如果有人对任何竞争性的工作感到强烈的焦虑,结果使得他在每次尝试工作之后都感到疲惫不堪,那么这个人可能坚持认为,他不够强壮,做不了这项工作;这种信念阻止着他,但是,如果他承认这种禁止,他可能会回去工作,将自己暴露给这种可怕的焦虑的面前。

第三种可能性使我们返回到文化的因素上。如果那些个人的禁止作用与文化所允许的禁止形式恰好相同,或与现存的意识形态相同,那么他们就不可能意识到个人的禁止作用。一位病人对接近女人具有严重的禁止,不曾意识到这种禁止作用,因为,他根

据普遍接受的女人是神圣的这一观念来看待自己的行为。一位对欲望实行禁止的人很容易把自己的行为解释成是在遵守节俭即美德的古训,对政治的或宗教的或任何有特殊利益的教条的批评实行的禁止作用可能是逃避引人注目,我们可能完全不知道任何暴露给惩罚,批评或隔离这种焦虑的存在。然而,为了判断情景,我们当然必须详细地了解个人的因素。不作批评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存在禁止的作用,它也有可能是由于一般的心不在焉,由于愚笨或由于他具有与教条相同的信仰。

这三种因素中的任何一种都可以解释不能认知现存禁止的原因,也能解释这样的事实:即便是有经验的心理分析学家,要想查出这些禁止,也感到非常之困难。但是即使假定我们能够认识所有这些禁止,我们仍然过于低估了禁止作用发生的频率。我们不得不考虑所有的这些反应,尽管这些反应不会全部形成禁止,但是却都在朝着这个结果发展。在我心中所想的态度中,我仍然能做一定的事情,但是,与这些事情相联系的焦虑却对行为本身施加了一定的影响。

首先,在从事我们感到焦虑的一种活动时,会产生出一种压抑、疲劳甚至是精疲力竭的情绪。例如,我的一位病人,她已经从对上街散步的恐惧中恢复过来了,但是在散步时,她仍然具有极大的焦虑,当她在星期天上街散步的时候,她总是感到精疲力竭。这种精疲力竭并不是由于身体虚弱,这一点可以由这样的一个事实来加以证明:她干繁重的家务活时一点也不觉得累。正是与户外散步相联系的焦虑使得她感到精疲力竭。这种焦虑虽然减少了,使她能够到户外散步,但是它并没有完全消失,它使得她的散步精疲力竭。我们通常将工作中的困难归咎于工作过于繁重,但事实

上它并不是由工作本身引起的,而是由对工作或对同事的关系的焦虑而引起的。

另一方面,与一定的活动相联系的焦虑会使这种活动的功能受到损害。例如,如果有一种与下命令有关的焦虑,那么,这些命令将会以一种歉意的、无强制作用的方式下达下来。骑马的焦虑将会使他不能控制这匹马。人们对这些焦虑的意识程度也不相同。有人可能会意识到焦虑使他不能以满意的方式完成他的任务,或者他可能有这样的感觉:他什么事情也做不好。

第三,与一种活动相联的焦虑会损害从事这一活动时本应该有的快乐。这一点对较小的焦虑作用而言并不适用;相反,它可能会产生更多的愉悦。带着某种恐惧乘坐游乐场里的过山车可能会使游戏更为刺激引人,但是,如果带着强烈的焦虑来坐过山车,可能会使游戏痛苦异常。与性关系相联系的强烈焦虑使得性交索然无味,但是如果他没有意识到这种焦虑,那么他就会感到性关系毫无意义。

最后的这一点可能使人感到茫然,因为我在前面已经讲过厌恶情绪可能会用作逃避焦虑的一种手段,而现在我却说厌恶可能是焦虑的一种结果。事实上,这两种结论都是正确的。厌恶可能既是逃避焦虑的手段又是焦虑的结果。这只不过是心理现象复杂难解的一个小小的例子而已。它们复杂而广泛,而且除非我们下定决心必须考察无数的、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否则我们就不能在心理学的知识上取得任何进步。

讨论如何保护自己、防止焦虑的目的并不是要给出一切可能的防御机制的全部现象。事实上,我们很快就会了解到防止焦虑产生的更为彻底的方法。我现在的主要目的是证明这样的一种论

断：我们具有比我们所意识到的焦虑多得多的焦虑，或者说，我们具有我们根本未曾意识到的焦虑，并且要指出某些应该注意到的更为常见的共同点。

所以，简言之，焦虑可能潜藏在生理不适的感情之后，如心跳加速和感到疲劳等的后面。它们可能被大量看起来有理的恐惧所掩盖；很可能正是这些潜藏的力量驱动我们去酗酒或使我们沉溺于各种不同的逸乐消遣之中。我们常常发现它是不能做或不能享受某种事情的原因，我们也总是发现它们是潜藏在禁止作用之后的驱动因素。

由于某些我们将在后文讨论的原因，我们的文化使生活于其中的个体的生活产生了大量的焦虑。因此在实际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已经建立了一个或另一个我们在上文中提到过的焦虑。一个人的神经症越严重，他的人格就越多地受到这种防御机制的渗透和控制，他也就有越来越多的事情不能做或不想做，尽管按照他的活力、心理能力或教育程度，他完全有资格希望自己去去做这些事情；神经症越严重，禁止也就越多，而且越精巧、越强大。<sup>①</sup>

---

① 在《精神分析导论讲演》(*Einfuehrung in die Psychoanalyse*)一书中，H. 舒尔茨-亨克特别强调了这种“缺口”(luecken)的至关重要性，这就是我们神经症患者的生活和人格中发现的那种“缺口”。

## 第四章 焦虑与敌视

在我们讨论恐惧与焦虑之间的区别时,我们发现的第一个结论就是,焦虑乃是在本质上包含有主观因素的恐惧。那么,这种主观因素的性质是什么呢?

让我们从描述个人在焦虑不安时所具有的体验来作为开始吧!他有时感到有一种强有力的、无法逃避的危险,对这种危险,他本人感到彻底的无助。不管是什么样的焦虑现象,不论它是不是对癌症疑病性的恐惧、对暴风雨的焦虑、具有恐高症,还是任何相似的恐惧,那种逼人的危险和对危险的防御这两种因素始终存在。有时,他感到无助的那些危险的力量乃是感到来自他自己无法控制的冲动的威胁——害怕自己忍不住从高处跳下去,或忍不住要用刀子捅死某某人;有时这种危险完全模糊不清、不可捉摸,而是常常感到处在焦虑的攻击之中。

然而,这种情感本身并不是焦虑的惟一的特征,在任何包含有一种实际上具有的逼人的危险和实际上具有的对危险的无助这样的情景中,这些情感可能是完全一样的。我可以想象得到,在地震时人们的主观体验,或两岁的婴儿正受残忍的折磨的这种主观体验,与一个具有暴风雨的焦虑的人的主观体验完全不同。在恐惧的情形下,危险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的,对这种危险的无助感是由现实决定的,在焦虑的情况下,危险是由心理因素造成的或想象出来

的,这种无助也是由个人自身的态度决定的。

所以,焦虑中主观因素的问题有必要进行更为具体的探究:什么是产生威逼的危险和对此危险无助态度的心理条件?无论如何,这是心理学家必须提出的问题。身体中的那些化学条件也能导致这些情感,然而与生理不适伴随的焦虑完全不同于心理的焦虑,因为,化学条件可以使人松弛和沉睡。

正如处理其他问题那样,在处理焦虑问题时,弗洛伊德也向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他通过他的杰出的发现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焦虑中的主观因素在于我们自身的本能驱动;换言之,伴有焦虑的危险和对这种危险的无助感都是由我们自身冲动的强大力量所引起的。在本章的末尾,我将详细讨论弗洛伊德的这些观点,而且也将指出在哪些方面我的结论与他的完全不同。

一般说来,任何冲动都有潜在的力量去激发焦虑,如果对它的发现或追究意味着对其他的兴趣或需求的侵犯,而且如果它是完全强迫的或完全主动的,那么情况就会是如此。在具有明确而严厉的性禁忌的时代,例如维多利亚时代,忍不住性欲冲动常常意味着招致现实的危险。例如,一位未婚少女,就必须面对社会丑闻的现实危险,而那些耽于手淫欲望的人,就将面对这样的危险,如遭受阉割的威胁,或致命的身体伤害和心理病的警告。同样的道理在今天也是适合的。某些病态的性冲动,如暴露癖和恋童癖,也是要遭到严厉禁止的。然而,在我们的时代,就“正常”的性冲动而言,我们的态度是如此的宽容,以致允许我们自己来满足它,或在现实中加以发泄,比以往面临的危险要小得多,因此在这点上,基本上没有什么事实性的理由来恐惧“正常的”性关系。

性文化态度的改变很可能要为这样的事实负较大的责任:依

据我的经验,这些性冲动本身只有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才是焦虑背后的动力力量。这个论点仿佛有些夸张,因为毫无疑问,在表面上看来,焦虑的确仿佛是与性欲相联系在一起。神经症患者常常发现具有与性交相关的焦虑,或者作为焦虑的结果在这方面具有禁止作用。然而,进一步的分析表明,焦虑的基础通常并不在于性冲动本身,而是在于与之相伴的敌视与冲动,例如性交中的伤害或侮辱性伙伴的冲动。

事实上,不同种类的敌意冲动是神经症焦虑产生的主要原因。我不太担心这一新的论断听起来又像是只是适合于某些案例的正确性中推论出来的不适当的概括性结论。但是,这些案例,在其中,人们可以发现在敌视和由敌视产生的焦虑之间的直接关系,并不是我这一论断的惟一基础。我们都知道,强烈的敌视冲动可能是焦虑的直接原因,如果追求它意味着对自我目的的破坏的话。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这些情况。F先生与玛丽姑娘在山上旅游,F先生对玛丽姑娘心仪已久。然而由于某种妒嫉,他对她极为粗野和敌视。当他与她行进在陡峭的山路上的时候,他感到焦虑的严重的袭击,呼吸急促,心跳加快,因为他有一种有意识的冲动要将玛丽姑娘推下山崖。像这样的焦虑结构与源于性欲的焦虑的现象完全相同:这是一种强迫性的冲动,如果屈服这一冲动,对自我将会造成极大的灾祸。

然而,在大多数的人那里,与敌视和神经症焦虑之间的直接关联并不明显。那么,为了阐明我为什么要宣称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中,敌视的冲动是导致焦虑的主要的心理力量,现在,有必要详细地考察一下,由压抑敌视产生的各种心理结果。

压抑敌视指的是“假装”一切事情都是正确的,因而在我们应

该奋斗时或至少在我们希望奋斗时压抑奋斗,所以这种压抑的第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便是,它产生了一种没有防御的情感,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加强了一种早已存在的无防御的情感。如果敌视被压抑了,当一个人的利益事实上遭到侵犯时,他人就可能会占他的便宜。

一位化学家 C 先生的经验代表了日常发生的这一类的情形。C 由于工作过度,因而产生了人们称之为心力交瘁的情绪。他很有天赋,而且野心极大,但自己却不知道这一点。由于某种我们暂时搁置一边的理由,他压抑了他的野心的冲动,因此表现为极度的谦虚。当他进入一家大化学工厂的实验室时,他的一名同事 G 先生,一位比他年长位尊的人,把他置于自己的卵翼之下,对他表示了极度的友好。由于一些个人的因素——依赖他人的关爱,对批评性观察的早就有的胆怯心理,他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野心,而且也未从他人身上看出这种野心——C 先生很高兴地接受了 G 先生的友谊。而且没注意到事实上 G 先生除了对他的职业之外,对其余的毫不关心。有一次他隐隐地感到震惊,G 先生把一个可以付诸实行的发明的创见说成是他自己的,而事实上这是 C 先生的创见,他以前有一次在一次友好的谈话中透露给 G 先生的。有一阵子,C 对 G 感到不信任,但是,因为他自己的野心事实上在他的内心激起了强烈的仇视,所以,他不仅立即压抑了他的仇视,而且也同时压抑了由此产生的正当的批评和不信任感。所以,他仍然相信 G 是他最好的朋友。结果,当 G 劝告他不要做某一项工作时,他只从表面的价值来接受这一劝告。当 G 作出了那项本可以由 C 来作出的发明时,C 只是感到 G 的天赋和智力远远超过他本人。他很高兴有这样一位值得钦佩的朋友。所以,在压抑了他的不信

任和他的愤怒后,C忽视了这样一个严重的问题,即G先生是他的敌人,而不是他的朋友。由于他执着于自己所喜欢的幻觉,C放弃了为他自己的利益而斗争的思想准备。他甚至没有认识到,他自己的一个重要利益就是进攻,因此,他不能为他的利益而奋斗,而让他人利用了自己的弱点。

这种以压抑作用来克服的恐惧也可以由对敌视的有意识的控制来克服。但是一个人是控制他的敌视还是压抑他的敌视并不是他自己选择得了的,因为压抑类似于一种反射过程。如果在某一特定情景下我们无可忍受地意识到处在敌视之中时,它就会发生。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用意识来加以控制。对敌视的意识变得无可忍受的原因是,我们所敌视的人有时同时是我们喜欢和需要的人。人们可能不想正视诸如妒嫉或占有这样的原因,因为这些原因导致了敌视,或者人们害怕认识他内心对他人的敌视。在这种情况下,压抑是恢复信心最为便捷的方法。通过压抑,害怕敌视的情绪从意识中消除了,或阻止它进入意识之中。我喜欢用另外的方式不断重复这句话,因为虽然它简单易知,但是它却是精神分析中较少为人所理解的论断之一:如果某人压抑了他的敌视,他就无法意识到他的敌视。

然而,恢复信心最快的方法,从长远说来并不一定就是最安全的方法。通过压抑过程,敌视——或者为了表明它的动力特征,我们最好用愤怒这个词来表示——可以从我们的意识中驱除,但决不会消灭。它从个人人格中脱离出来,因而失去控制,作为具有爆炸性和爆发性的作用在他的内心翻转,因而力图加以发泄。被压抑的情感的爆发更为剧烈,因为由于它的隔离,它表现得更为强大,而且常常更为不可思议。

只要我们意识到怨恨,那么这种怨恨的扩张便以这种方式受到了限制。首先,当他处在一给定的环境中时,对其环境的考虑,使他明白能做什么以及他能对其敌人或他所声称的敌人做什么。其次,如果他怨恨的是他所钦佩或所喜欢或所需要的人,那么这种怨恨迟早会统合到他的情感整体中。最后,因为人可以对什么是适宜于做的,什么不适宜于做的事情形成一种直观的感觉,只要人形成了这样的人格,这种人格也会限制他的敌视的冲动。

如果愤怒被压抑了,那么,达到这些限制的可能性就切断了,结果,这种敌视的冲动就从内外两个方面侵入这些限制性之中,尽管只是以想象的方式侵入其中。如果我上面提到的化学家顺从这种冲动,他就想告诉他人,G先生如何滥用了他的友谊,或者向上级透露G先生剽窃了他的思想或者不让他从事他的这一思想的实验。由于他的愤怒被压抑了,这种愤怒就分散扩张开来,比如说有可能在他的梦中显示出来;情况很可能是,在梦中,他以某种象征的形式充当杀手,或者成了一个令人钦佩的天才,而其他的人则变成了为人所不齿的人。

通过分散他的愤怒,被压抑的仇视经过一段时间后为外在的因素所强化。例如,如果一位高级雇员对他的上司有了仇视的情绪,因为这位上司不与他商量就随意支派他,如果这位职员压抑了他的愤怒,从不对这位上司的安排提出反对的意见,那么,这位上司就会一直骑在他的头上,那么新的愤怒就会不断地产生。<sup>①</sup>

---

<sup>①</sup> F. 坤克尔(F. Kuenkel)在他的著作《性格学导论》(*Einfuehrung in die Charakterkunde*)中已经注意到这样的事实:神经症患者的态度需要环境的反应,以便增强这一态度本身,结果,病人越陷越深,越来越难以自拔。坤克尔称这种现象为恶性循环(*Teufelskreis*)。

另一种压抑敌视的结果是从这一事实中产生的,一个人把那些难于控制的具有高度爆发力的情感埋藏在自己的心中。在讨论这一情况的结果之前,我们得考虑一下由这一情况所产生的问题。通过这一定义,压抑一种情感或一种冲动的结果是,个人不再意识到他的存在,所以在他的意识中,他不知道他对他人怀有愤怒的情绪。那么,我如何能够说他把压抑的情感“埋藏”在心中?其答案在于,在意识与无意识之间没有严格的选择,但是,正如 H. S. 沙利文(H. S. Sullivan)在一篇讲演中所指出的那样,有几种不同的意识水平。不仅被压抑的情感仍在起作用——这是弗洛伊德的基本发现之一——而且在意识的深层次上,个人都知道这种情感的存在。用更简单的话说,这表明,我们根本不是什么傻子,事实上,我们观察到的比我们所意识到的要好得多,正如我们通常比自己所想象的更能了解他人一样——比如,我们所得到的第一印象往往比较正确——但是我们可能有充分的理由不去认知我们的观察力。为了避免重复啰嗦的解释,当我意指我自己知道我内心的活动而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时,我们就用“深藏”这个词来表示。

压抑敌视这一结果本身就足以产生焦虑,如果敌视和对他人利益的潜在危险总是非常大的话。模糊的焦虑状态也可以用这种方式建立。然而,通常这一过程并不是达到这一点就停止不动了,因为它迫切需要摆脱那种在内心威胁人的利益和安全的危险情感。于是第二种反射般的过程产生了:个体把他的敌视冲动“投射”到外部世界。第一种“伪装”即压抑作用需要第二种“伪装”:他“假装”那种破坏性的冲动并不是来自他的内心,而是来自外部的某人或某物。从逻辑上讲,他自己的敌视冲动所针对的人正是他所投射的对象。结果,这个人就被假定具有与自己相同的心理,部

分的原因是这个人具有了自己受压抑冲动时所有的粗野性质,部分是因为在任何危险下这种能力的程度不只是依据实际具体的情景,而且要根据他们所采取的态度。人们的防御机制越少,所出现的危险也就越大。<sup>①</sup>

作为一种副作用,这种投射作用也用来满足自我辩护的需要。并不是个人自己要去欺骗、偷窃、侵占、侮辱他人,而是他人要欺骗、偷窃、侵占、侮辱个人。一位妻子忽视了她自己要破坏丈夫的冲动,并主观地确信她对其丈夫体贴温柔、奉献良多,因为这种投射作用,因而认为她的丈夫虐待了她。

这种投射作用的过程可能会、也可能不会为达到同一目的的其他过程所支持:一种报复性的恐惧也许会抓住这种压抑的冲动。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要想伤害、欺骗、欺诈他人,就会有一种他人也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恐惧。这种报复性的恐惧到底在多大的程度上是人性的普遍特征?到底有多少是源自罪与罚的原始经验?它作为个人的报复的动机到底达到了何种程度?这些都是有待于解决的问题。毫无疑问,它在神经症患者的心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由被压抑的敌视所导致的这些过程产生了焦虑的情感。事实上,压抑产生了具有焦虑特征的态度:对于来自外部的强大危险所带来的威胁,他感到无法防御。

---

① E. 弗罗姆(E. Fromm)在《权威与家庭》(*Autoritaet und Familie*)[国际社会研究所的马克斯·霍克海默尔(Max Horkheimer)编]一书中非常明确地表明,我们对危险的反应所产生的焦虑并不机械地依赖于现实危险的程度的大小,“一位发展有无助和消极态度的人即便是对较小的危险也会产生极度的不安”。

尽管焦虑发展的步骤一般说来比较简单,但是在实际上,产生焦虑的条件通常却难于理解。其复杂因素之一就是,被压抑的仇视冲动通常不是投射到相关的个人身上,而是投射到其他的事物上。例如,在弗洛伊德那里有一个案例,小汉斯没有发展出对他双亲的焦虑,而发展出对那匹白马的焦虑。<sup>①</sup> 我的另一位非常敏感的病人,在压抑了她对她丈夫的敌视以后,突然形成了对在游泳池匍匐游水的不安。看起来世间的任何事物从细菌到狂风暴雨都会成为焦虑的对象。这种将焦虑从相关的人身上转移开来的倾向的原由是非常明显的。如果焦虑的对象是双亲、丈夫、朋友或与自己具有亲密关系的某一个人,那么这种想象出来的敌视就与现存的权威、爱恋或欣赏的关系完全不相称。这些案例中的原理就是否认对周围的敌视。通过压抑他自己的仇视,个人否认这样的事实:他自己的心中的确有敌视的情绪,但是通过把他的被压抑的敌视投射到狂风暴雨上,他否认了他心中的这种对他人的敌视。许多美满婚姻的幻想就是建立在这种鸵鸟政策之上的。

压抑敌视不可避免地要产生焦虑,这一结论并不意味着焦虑每次都会将其发生的过程彰显出来。焦虑可能会即时地被一种保护性的措施转移了。这些保护性的措施我在前面已经讨论了一些,在后文还会继续讨论。例如,处在这种情景中的一个人可能会通过下述的方法来保护自己:发展出对睡眠或饮酒的强烈需求。

焦虑的形式有无限多种,它们可能是从压抑敌视这一过程中产生出来的。为了更好地理解它的结果,我将列举其各种不同的可能性。

---

<sup>①</sup>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文集》第三卷。

A:感到危险是从某人自己的冲动中产生的。

B:感到危险是从外界产生的。

从压抑敌视的结果上,A群看起来是压抑的直接结果,B群则以投射作用为前提。无论是A群还是B群都可以下分为两个子群。

① 感到危险是针对自己的。

② 感到危险是针对他人的。

由此我们就可以得出四个主要的焦虑群:

A.① 所感到的危险来自某人自己的冲动而且针对的是自己。在这一焦虑群中,敌视再度针对自己。我们将在下文中讨论这一过程。

例如:对从高处跳下来的恐惧即是此例。

A.② 所感到的危险来自自己的冲动,但是针对的却是他人。

例如:用刀子伤害他人的恐惧即是此例。

B.① 所感到的危险来自外界,针对的是自己。

例如:对暴风雨的恐惧即是此例。

B.② 所感到的危险来自外界,而且针对的是他人。在这一焦虑群中,敌视被投射到外部世界,但是敌视的原初客体仍然存在。

例如:过分关爱的母亲对威胁其子女的危险的焦虑。

不用说,这样分类的价值是有限的。在提供快速确认焦虑的取向上,它可能有些用处,但是它并没有包括各种可能性。例如,我们不可由此推断,具有A型焦虑的人决不会投射他所压抑的焦虑;我们只能推断出这样的结论,在这种特定的焦虑形式上,不具有投射作用。

敌视能产生焦虑,它们二者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夸张。这一过

程还会对周围的其他方式发生作用；当焦虑是由威胁感所产生时，与敌视产生焦虑相反，它也容易在防御中产生一种反抗性的敌视。在这种情况下，它不同于任何恐惧，因为它可能会激发攻击。如果反应性的敌视被压抑了，它也会产生焦虑，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一个循环。这种焦虑与敌视之间的循环作用，使得它们的一方总能产生和加强另一方，使得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我们在神经症中所发现的那些大量的残忍的敌视，<sup>①</sup> 这种交互作用也是为什么严重的神经症患者虽没有任何明显的外界困难处境，却仍然常常使得病情恶化的原因。焦虑和敌视谁是主要的因素，这一点并不重要。对于神经症动力学来说，最为重要的是焦虑和敌视是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

一般说来，我所提出的焦虑概念是通过本质上是心理分析的方法阐述的。这一概念是用潜意识力量，即压抑、投射等过程的动力学来运作的。然而，如果我们阐述得更为详细一些，那么，在诸多方面，它与弗洛伊德所采取的立场有所不同。

弗洛伊德已经成功地阐述了焦虑的两个基本观点。第一个观点，简言之就是焦虑导致了冲动的压抑。这种被压抑的冲动专指性欲的冲动，而且它纯粹是一种心理学上的解释，因为它基于这样的信念，如果性欲的能量不能释放，那么它的身体就会产生生理上的紧张，并转化为焦虑。按照弗洛伊德的第二个观点，焦虑——或他称之为病态焦虑的东西——是由对这些冲动的恐惧产生的，对

---

<sup>①</sup> 如果认识到敌视是由焦虑加强的这一情况，那么显然就没有必要去破坏欲望的特殊生物源泉，正如弗洛伊德在其死亡本能理论中所阐述的那样。

这些冲动的发现和追求将会产生外在的危险。<sup>①</sup> 这第二种解释是心理上的,它不仅指的是性欲冲动,而且也指侵略的冲动。在解释焦虑时,弗洛伊德并不关心冲动的压抑或不压抑,而只是关心对这些冲动的恐惧,因为对这些冲动的追求会导致外在的危险。

我的焦虑概念则是基于这样的信念:上述弗洛伊德关于焦虑的两个观点必须统合在一起,这样才能理解焦虑的全貌。所以,我已经将他的第一个概念从纯粹的心理学的基礎上解放出来,并将其与第二个概念结合在一起。一般说来,焦虑并不是产生于我们对冲动的恐惧,而是产生于对我们受压抑的冲动的恐惧。我认为,弗洛伊德之所以没有很好地利用他的第一个概念——尽管它基于天才般的心理学的观察之上——乃是由于他只是用生理学上的观点来阐述焦虑,而不提出下述心理学上的问题:如果一个人压抑了一个冲动,那么在他的内心心理上会发生什么情况?

我不同意弗洛伊德的第二点是:弗洛伊德不重视理论而更为重视实践。我完全同意他的这一观点:焦虑可能会由表现为外在危险的冲动所产生。性欲冲动很可能就是这样的一种冲动。但是,只有它所依赖的严厉的个人和社会的禁忌才会使它成为危险的冲动。<sup>②</sup> 根据这一观点,由性欲冲动所产生的焦虑出现的频率在很大的程度上依赖于对性欲的文化态度。我不认为性欲本身是焦虑的一个特定源泉。然而,我相信,在敌视中有这种特定的源

---

①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导论讲演新篇》(*New Introductory Lectures*)论述“焦虑与本能生活”一章。

② 在社会中,可能正如塞缪尔·巴特勒(*Samuel Butlen*)在《*Erewhon*》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任何生理疾病都会遭到严厉的惩罚,致病的冲动会是被禁止的焦虑。

泉,或更确切地说,对敌视冲动的压抑是焦虑的特定来源。为了阐述这一概念,在本章我已经阐述了几个简单、实用的名词:不管什么时候发现焦虑或焦虑的迹象,我心中产生的问题都是:是什么样的敏感因素伤害并因此激发了敌视作用,如何解释压抑的必然性?我的经验是,沿着这一方向进行探索,就能满意地理解焦虑。

我本人不同于弗洛伊德的第三点是:弗洛伊德假定,焦虑只是在孩提时代才产生的,从出生时所想象的焦虑开始,到阉割的焦虑,他还假定晚年所产生的焦虑乃是基于幼儿时期遗留下来的反应。“毫无疑问,在我们称之为神经症患者身上,他们对危险的态度仍有幼儿期焦虑的残余,并且没有从过去的焦虑处境中成熟起来。”<sup>①</sup>

让我们分别来讨论在这些解释中所包含的因素。弗洛伊德断言,在童年时期,我们特别容易对焦虑产生反应。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很好地理解这一事实的原因之一是,儿童时期对不利的影响相对说来比较无助。事实上,在神经症患者中,我们总是发现焦虑的形成开始于孩提时代,或至少我称之为基本焦虑的基础在于这一时期。然而,除此之外,弗洛伊德相信,成年神经症患者的焦虑仍然与早先激发他的焦虑的处境有关联。举例说来,这就意味着,成年人仍然具有孩提时代的那种阉割的恐惧,尽管这种恐惧的形式变了。毫无疑问,在少数的例子上,我们仍然发现儿童时期的焦虑不安反应,以毫无改变的方式在适当的条件下在他的晚年重现。<sup>②</sup>

①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导论讲演新篇》论述“焦虑与本能生活”一章。

② J.H. 舒尔茨在《神经症、生活困境和医疗责任》一书中记录了这种病例。一个雇员经常变换工作,因为固定的老板会使他恼火和焦虑精神分析表明那些优秀的人有某种鄙视激怒他的芒刺。病人的反应证明,(转下页注)

但是,一般说来,我们所发现的,用一句话来表示,就是不是重复,而是发展。在一些病例中,精神分析使我们对神经症是如何发展的有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解。我们可以发现,从早期的焦虑到成年的奇异人格有一个没有中断的反应链条。因此,后期的焦虑除了其他情景外,也包含着孩提时存在的特定冲突所形成的各种因素。但是焦虑作为一个整体并不是孩提时的反应。如果认为它是如此,就会混淆两种不相同的事情,将一种幼稚的态度错当成孩提时才产生的态度。我们既然称焦虑为一种幼儿的反应,那么至少为公平起见,我们就应该称它为儿童早熟的态度。

---

(接上页注)3年前,他的父亲曾用威胁的方式攻击过他的母亲,他曾对此极为恼火和焦虑,他对老板的反应不过是对他父亲的反应的一种重复。

## 第五章 神经症的基本结构

焦虑可以通过实际的冲突情景来加以充分的解释。然而,如果我们在一个病态人格中找到了一种产生焦虑的情景,那么我们就总是不得不考虑以前存在的焦虑,以便解释为什么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产生了敌视并将其压抑下来。那么我们将会发现,这种从前的焦虑相应地也是从前存在的敌视的结果,以及诸如此类等等。为了理解这整个的发展是如何开始的,我们不得不回到童年时代。<sup>①</sup>

这将是我处理儿童经验问题的少数几个场合之一。比较心理分析文献中的常规做法而言,我较少涉及儿童期。究其原因并不是因为我认为儿童期不像其他的心理分析学者所认为的那样重要,而是因为在这本书中我想处理的不是神经症患者格的实际结构,而是想处理那些导致神经症患者格的个体经验。

在考察大多数神经症患者的儿童期时,我已经发现,这些人的共同特性就是这样的一种环境,这种环境显示了下述在各种不同的综合形式中的特性。

基本的错误乃是常常缺乏真正的温暖和关爱。一个儿童能够

---

<sup>①</sup> 在此我并没有触及到追溯到童年要追溯到多远才是必要的这一问题。

忍受大量平常所谓的创伤——例如突然的断乳、偶尔的打骂、性经验等等——只要在他的内心感受到需要和爱护,情况就会如此。不用说,儿童能够敏锐地感受到关爱是否真实,而且不会为任何虚假的关爱表示所欺骗。儿童没有接收足够的温暖和关爱的主要原因在于由于父母自己的神经症患者而不能给予他以温暖和关爱。尤其常见的是,以我的经验来看,这种温暖的根本缺失被掩饰起来了,父母内心认为,他们已考虑到孩子的最佳利益。教育理论教导她说,一位“理想”母亲的溺爱或自我牺牲的态度是造成这样一种氛围的基本因素,正是这一氛围为孩子将来的不安全感奠定了至关重要的基石。

尤有甚者,我们发现了父母本身所具有的产生敌视的各种行为与态度,诸如偏袒其他的孩子,不公正的责备,令人捉摸不定的忽而过分溺爱忽而声色俱厉的拒绝,不守诺言,以及对待孩子的需求的态度,从暂时的不闻不问逐渐过渡到对孩子最合理的需求进行不断的干涉,诸如干涉孩子交友,嘲笑孩子的独立思考,破坏孩子追求的兴趣,不管是艺术上的、体育上的还是机械上的——总而言之,父母的这种态度,即便不是有意为之,但是在效果上还是破坏了孩子的意志。

在有关产生儿童敌视的因素的心理分析文献中,主要强调的是挫折了儿童的愿望,尤其是性欲和妒嫉方面的愿望。情况可能是,产生幼儿敌视的原因,部分地是因为,一般说来父母的禁止快乐的文化态度,特别说来,则是父母禁止了幼儿的性欲,不管是性好奇、手淫还是与其他的儿童之间的性游戏。但是可以肯定地说,挫折不是反叛性敌视的惟一原因。观察表明,毫无疑问,儿童正如成人一样,能够接受许多责备,如果他们感到这些责备是公正的、

公平的、有必要或有目的的。例如,儿童并不介意有关清洁的教育,如果父母不对此施加过分的压力,而且不以完美和严厉来苛求孩子的话,儿童也不会介意偶尔的惩罚,如果他感到这种惩罚是对他的关爱而且是公平的,而不是有意的伤害和侮辱的话。挫折本身是否能引起敌视,这一问题难以判断,因为在对儿童加诸很多责备的环境中,通常还存在着诸多其他的刺激因素。重要的是挫折所包含的精神,而不是挫折本身。

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乃是因为人们常常强调挫折本身的危险性导致很多父母滥用这一观念,远远超过了弗洛伊德,并使许多父母不敢干涉子女的行径,惟恐子女因此受到伤害。

正如在成人中那样,儿童那里,妒嫉也的确是可怕的仇恨的来源之一。毫无疑问,兄弟姐妹之间的妒嫉<sup>①</sup>以及父母之间的妒嫉,在神经症儿童身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且这种态度对儿童后来的生活来说也具有终生的影响。然而,关于产生妒嫉的条件,则有诸多的疑问。那在兄弟阋墙之争中以及在俄狄浦斯情结中所发现的妒嫉反应必定会在每个儿童身上都会产生吗?或者它们乃是由特定的条件激发出来的?

弗洛伊德所说的俄狄浦斯情结是在神经症患者身上观察到的。他在神经症患者身上发现,对父母一方的强烈妒嫉反应能够产生足够的破坏力,这种破坏力能产生恐惧,并因此对人格的形成和人际关系产生永久性的困扰影响。由于常常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患者身上观察到这些现象,因此,弗洛伊德假定这些现象是一种

---

<sup>①</sup> 参见戴维·利维(David Levy):“兄弟竞争试验中的敌视模式”,载于《美国精神卫生学刊》(*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第六卷,1936年版。

普遍的现象。他不仅假定俄狄浦斯情结是神经症的核心,而且他试图在此基础上理解其他文化中的复杂现象。<sup>①</sup>然而这一普遍性的结论是值得怀疑的。在我们的文化中,妒嫉反应的确容易从兄弟姐妹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中产生,正如容易从每个紧密地生活在一起的群体中产生一样。但是没有证据表明,这种具有破坏作用的特定的妒嫉反应——当我们谈论俄狄浦斯情结和兄弟姐妹之争时就会想到这一点——是我们的文化中固有的,更不用说其他的文化了,它不具有弗洛伊德所说的普遍性。它们是人类的一般反应,但是都是受儿童成长的气氛的影响而在后天产生的。

具体地讲,到底是哪种因素得为妒嫉的产生负责,在后文讨论病态妒嫉的一般意蕴时我们就会理解到。我们不妨在此提一提,缺乏温暖和竞争精神有助于产生此一结果。除此之外,病态的父母创造了我们上文所讨论的那种气氛,他们通常不满意自己的生活,没有满意的情感或性关系,因此易于使子女成为他们爱欲的对象。他们将自己的关爱需求释放在子女的身上。尽管这种关爱的表达并不总是具有性欲的色彩,但是无论如何,它是富有情感意义的。我很是怀疑,潜在于子女与父母之间的性欲会强大到足够影响一种潜在的困扰。无论如何,我不知道有任何病例不是神经症父母通过恐怖与温柔逼迫子女进入这种热情的关系,并包含了弗洛伊德所描述的占有欲和妒嫉。<sup>②</sup>

---

① 参见弗洛伊德:《图腾与塔布》(*Totem and Taboo*)。

② 这里所作的评述的一般观点与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概念有所不同。这些评述假定的是,它不是一种生物学上给定的现象,而是受文化制约的。由于很多学者讨论过这些观点——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转下页注)

我们习惯相信对家庭或家庭成员的仇视对儿童的发展来说是不幸的这一论断。的确,如果儿童起而反抗病态父母的行为,这是相当不幸的。然而,如果有很好的反对理由,那么对儿童人格的形成来说所具有的危险并不在于对抗议的感受与体验,而在于对抗议的压抑。压抑批评、抗议或责备会产生很多危险,其中之一是儿童可能会将所有的责备都揽到自己的头上并感到自己不得人爱;这种处境的意蕴我将在后文中讨论,在这里要讨论的与我们有关的危险是:受压抑的敌视会产生焦虑并开始形成我们上文所讨论的那些病态人格。

为什么在这种环境中成长的儿童会压抑他的敌视?其原因有很多,而且是以不同的程度和混合形式发生作用,它们包括:无助、恐惧、关爱或犯罪感。

儿童的无助常常仅仅被当作一种生物学上的事实。尽管儿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事实上是依赖于他的环境来实现其自身的需求——比起成年人来,他们既没有体力又没有经验——然而,人们过分强调这个问题的生物学方面。儿童在2~3岁以后就会发生一种决定性的改变,他们从生物学上的依赖转变为对一种包括儿童的心理、智力和精神生活的依赖性。这种依赖从儿童成熟一直持续到青年时代,直至能够牢牢把握住自己的生命为止。尽管儿童依赖父母的程度对每个人来说皆有不同。它完全依赖于父母试图在对后代的教育上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是使孩子强壮、勇敢、

---

(接上页注)贝姆(Boehm)、弗罗姆(Fromm)、赖希(Reich)——因此在这里我只限于指出我们的文化中可以产生俄狄浦斯情结的那些因素:在婚姻中缺乏和谐,结果使得两性关系发生冲突;父母的无限权威力量;对儿童的各种性发泄的禁忌;把儿童当作婴儿,从感情上依赖父母并使之孤立起来的倾向。

独立、能对付各种处境,还是使孩子顺从,对生活一无所知,或简而言之直到 20 岁或更大年龄时仍对孩子实行婴儿式的教育。在不利的环境中成长的儿童,无助常常为恐吓、溺爱或使儿童始终处在情感依赖状态的这些行为来人为地加强。一个孩子越是无助,他也就越不敢感受和表示反对意见,而这种反对意见在内心中也就持续得越久。在这种情况下,强调情感——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格言——乃是:我必须压抑我的敌视,因为我需要你。

恐惧也可以直接从威胁、禁止和惩罚中产生,也可以由突发脾气或由儿童所见到的暴力情景所产生,它还可以从直接的恐吓中产生。例如用生活中一些巨大的危险来加深儿童恐惧的印象:细菌、街上的车辆、陌生人、未受教育的孩子、爬树等等。孩子越感到恐惧,他越不敢表示甚至感受敌视。在这里,格言就是:我不得不压抑我的敌视,因为我害怕你。

关爱也可能是另外一种压抑敌视的原因。

父母缺乏真诚的关爱,却常常在口头上强调他们是如何地爱孩子,他们如何为孩子耗尽心血。一个儿童,尤其是受到恐吓的儿童,就会抓住这种关爱的替代品而不敢进行任何的反抗,因为他们惟恐丧失因驯服而得到的报酬。在这种情景下,其格言就是,我不得不压抑敌视,因为我害怕失去爱。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讨论了儿童压抑敌视父母所由此产生的情景,因为他害怕一旦他表示出对父母的敌视,他就会破坏他与父母的关系。他为这种明显的恐惧所驱使,这就是:这些强大的巨人会遗弃他,收回他们的好意,或起而反对他。此外,在我们的文化中,儿童常常为感觉或表达他的敌视或反对意见而感到有罪;这就是说,如果他感到或表示出对父母的怨恨,或者如果他打破了父

母所建立的规矩,那么他会被教育成承认他自己一文不值或轻视自己。这两种有罪感的原因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儿童在禁止领域的越轨方面的负罪感越重,他就越不敢对父母有任何轻视或责备。

在我们的文化中,性欲领域乃是最经常激发负罪感的一个领域。无论这种禁止是由听得见的沉默还是由公开的威胁和惩罚表现出来,儿童经常感到的不仅是被禁止的性好奇和性行为,而且如果他沉溺于其中,他就是污秽不堪不值一提的卑贱。如果儿童对父母的一方有任何性幻想和欲求,那么,尽管他们接受了对性欲态度的禁忌,因此会将此幻想压抑而不表达出来,这些思想仍然会使儿童感到犯罪感。在这种情景下,其格言就是:我不得不压抑敌视,因为如果我感到敌视,那么我就是一个坏孩子。

在不同的综合中,上文所提到的任何一种因素都会使儿童压抑他的敌视,并最终产生焦虑。

但是是不是每种婴儿期的焦虑最终都必然导致神经症?我们的知识还不够先进,因此尚不能充分地回答这个问题。我的信仰是,对于神经症的形成来说,婴儿期的焦虑是必然的因素,但不是充分的原因。一些有利的环境,如早期环境的改变或各种各样的相互作用的影响,都可能预示特定的神经症的形成。然而,正如情况经常所发生的那样,如果生活环境并不能减少焦虑,那么不仅这种焦虑会保持不变,而且——正如我们在下文中将会看到的那样——它必然会逐渐增加和激发构成神经症的各种过程。

在这些可以影响加深婴儿期焦虑的因素之中,有一种因素我要特别地加以考虑。敌视和焦虑的反应是局限于那逼使儿童产生敌视和焦虑的环境,还是它会发展成一种对一般人的敌视和焦虑

的态度,这两者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别。

例如,如果一个儿童非常幸运,有一个慈爱的祖母,一个善解人意的老师,一些好朋友,他与这些人的体验可能会阻止他从他人那里只得到坏的印象。但是,他在家庭中的经验变得越困难,孩子越会易于形成对父母及其他儿童的敌视反应,同时也对每个人产生不信任或敌视的态度。孩子越是孤单,越不能使他人的经验成为自己的经验,那么这种病态的人格也就越强烈。最后,孩子越是掩饰对他自己的家庭的怨恨,例如,通过同意父母的态度来掩饰,他就会越将其焦虑投射到外部世界中,并因此相信一般的“世界”是危险的、可怕的。

对“世界”的一般焦虑也可能会逐渐地形成和增加。在上面所描述的环境中长大的儿童,在与其他的儿童的交往中,不敢像他们一样富有进攻性和好斗。他们不知道自己需求什么,将一个无害的玩笑当成一个严重的拒绝。比起其他的儿童来,他们更容易受到伤害,而且更不会保护自己。

由我在上面所提到的那些因素所产生或形成的处境,或者与此相似的因素所产生的环境,乃是一种在内心逐渐增加、无所不在的孤独感,及置身于充满敌意的世界的无助感。这种对个体环境的敏锐反应,会结晶成一种人格态度。这种态度本身并不构成神经症,而是一种培植神经症的土壤。由于这种态度在神经症中所起的基本的作用,因此我给它一种特别的称呼:基本焦虑。它与基本敌视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

在心理分析中,透彻地研究过所有不同的个体焦虑的形式后,人们会逐渐认识到这一事实:基本焦虑都屈从于与人的一切关系之中,个体的焦虑可能是由具体的原因激发的,但是即便在实际情

景中没有具体的刺激,基本的焦虑仍然存在。如果将全部的神经症现象与一个国家的不安定的政治状态相比,那么基本焦虑与基本敌视将与潜在的对国家的不满和抗议相似。在这两个例子中,表面上都看不到不正常的现象,或者它们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就国家而言,它们可能表现为骚乱、罢工、集会、游行;在心理领域,焦虑的形式可能表现为各种各样的症状。不管这种特别的刺激如何,焦虑的各种现象都是从一种共同的背景中发泄出来。

在单纯的情景神经症中并没有基本的焦虑。它们乃是由对个人的实际冲突矛盾情景之病态性反应所构成的,这个人的人际关系并未受到困扰。下述情况可以用作这些病例中的一个典范,因为这些病例经常会在心理治疗的实际病例中出现。

一位 45 岁的妇女抱怨在晚上心跳加速和焦虑不安,且伴有盗汗现象。但是在临床上并未发现她有任何器官上的毛病,所有的证据都表明她是一个健康的人。她给人的印象也是古道热肠、心直口快。20 年前,由于一些环境而非她本人的原因,她嫁给了一位比她大 25 岁的男人。她与他相亲相爱,他们之间的性关系也很令人满意,共同生育了 3 个孩子,孩子也很有出息。她吃苦耐劳,在做家务方面是一把好手。在过去的五六年中,他的丈夫开始变得有些不正常,性能力大不如前。但是她忍受了这些而没有任何病态的反应。麻烦开始于 7 个月之前,一位可爱的、年龄与他相当的可以托付终身的男人开始注意到了她。结果,她开始对她那老朽的丈夫感到怨恨,但是考虑到她的整个思想和社会背景以及良好的社会关系,她完全压抑住了这种情感。借助于几次会诊的帮助,她能够正视这种冲突的情景,并因此摆脱了焦虑。

没有什么比拿神经症患者与上文所举的例中单纯的情景性神

经症加以相互比较更能够指出基本焦虑的重要性了。单纯的情景性神经症发现在健康的人身上,这些健康人由于可理解的原因而不能有意识地解决冲突的情景,也就是说,他们不能面对冲突的存在和冲突的性质,因此无法作出明确的决定。这两类神经症患者之间的明显不同之一就是,情景神经症患者的治疗有极大的成功率。对性格神经症的治疗有极大的难度,并因此而持续一段很长的时间,有时治疗期太长以致病人都难以忍受;但是情景神经症相对说来比较容易治疗。对情景进行可理解的讨论,往往不仅是对症状的治疗,而且是对病因的治疗。在其他的一些病例中,对病因的治疗乃是通过改变环境而清除困难。<sup>①</sup>

所以在情景神经症中,我们有这样的一种印象:在冲突的情景与神经症反应之间有较为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在性格神经症患者之间看起来并不存在。由于这种现存的基本焦虑,最轻的刺激也会激发最严重的反应,这一点我们在下文将进行更详细的讨论。

尽管焦虑的表面形式,或者说防御焦虑的表面形式的范围是无限的,而且每个人的表现也各不相同,但是,基本焦虑在每个地方或多或少都是一样的,只是在程度和强度上有所不同而已。它大致可以描述为渺小感、无足轻重感、无助感、遗弃感、危险感,总之,它们出自滥用、欺骗、进攻、谦卑、背叛、妒嫉这样的情感。我的一位病人在自发地给出的一张画上表达了她的这种感情。在这张画上,她像一个弱小、无助、赤裸的小孩坐在背景的中央,周围包围着各种有威胁的怪物、人和动物,准备进攻她。

在神经症患者身上,我们常常发现对这种焦虑存在的高度知

---

<sup>①</sup> 在这些病例中,心理分析既无必要也不适合。

觉。在偏执狂或妄想狂病人身上,这种焦虑局限在某一特定的人身上;而在精神分裂病人身上,对他周围世界的潜在敌视常常有一种敏锐的知觉,以至倾向于将善意当作表示潜在的敌视。

然而,在神经症患者身上,对基本焦虑的存在却很少有所知觉,对基本的敌视也没有什么知觉,至少不知道它对于整个生命的重要性的意义。我有一个病人,在梦中将自己看成是只小老鼠,不得不躲在小洞中,以免被别人踩到——因而对自己在生活中的行为给了一个十分真确的画像,这位病人真切地意识到在实际生活中她害怕每一个人,但是她告诉我说她不知道什么是焦虑。对每个人的基本不安可能会被一种表面的信仰所掩盖。这种信仰就是:一般的人都是非常可爱的,并且可以以一种良好的关系与他人共同相处;对每个人的深深厌恶也完全可以通过随时随地地称道他人而加以掩饰。

尽管基本的焦虑是关涉人的,但是它可能会完全摆脱它的个人特征,而改变成为暴风雨、政治事件、细菌、意外事故、罐装食品的威胁的感觉,或为命运所击倒的感觉。对于受过训练的观察者来说,认识这些态度的基础并不难,但是在神经症患者认识到这种焦虑并不真的是与细菌等东西有关,而是与人有关,认识到他对人的恼怒并不是,或者说并不只是对现实刺激的一种充分而又合理的反应,而是因为他对他人产生了基本的敌视,也就是说,不再信任他人之前还要求进行强烈的精神分析的工作。

在描述神经症患者的基本焦虑的意蕴之前,我必须讨论一个在许多读者心目中存疑的问题。被描述成神经症的基本构成成分的这种对他人的基本焦虑和敌视态度,难道不是一种我们大家都隐秘地具有的——尽管可能是比较轻的程度——“正常”态度吗?

在考虑这个问题时,人们必须区分两种观点。

如果“正常”是用于一般人的态度这个意义上而言的话,我们就可以说,基本焦虑的确是德国哲学和宗教语言称之为“生物的恐惧”(Angst der Kreatur)的一种正常推断。这个术语所表示的事实上是我们大家对我们更有力量的那种东西的无助感,这些更有力量的东西有:死亡、疾病、衰老、自然灾害、政治事件、事故等等。我们初次认识到这一点是在儿童时的无助时期,但是这些认识一直伴随我们终生。这种对生物(Kreatur)的焦虑与基本焦虑一样,具有比我们更为强大力量的无助因素,但是它却并不包含有对这些力量本身进行敌视的意思。

然而,如果在就我们文化的一般意义上来使用“正常”一词,那么我们就可以说:一般来说,经验会使我们文化中的一个人——如果他的生活并不太与世隔绝的话——成熟时变得对他人更为保守,更尽量避免信任他人,更为熟悉这样的事实:人们的行为常常并不率真,而是受懦怯和便利心理所决定。如果他是一个诚实的人,那么他就会也包括他自己;如果他不是一个诚实的人,那么在他人的身上他会对这一点看得更为清楚。总而言之,他形成了一种完全与基本焦虑有关的态度。然而,还是有诸多的不同:健康成熟的不会对这些人性的弱点感到无助,同时在他的身上也不会发现基本的病态态度所具有的莫名其妙的情感。他仍然保持有能够维持真诚友谊以及信赖他人的能力。或许,它们之间的区别可以由这一事实得到解释:健康人使他的巨大的不幸的经验局限于某一他能控制的年限,而神经症患者则使它们处于不能控制的年限,结果,他的无助对这些不幸发生了反应,形成了焦虑。

神经症患者就对他自己和对他人的态度而言,其基本焦虑有

特定的含义。它指的是情感孤立,当它与自己内心的软弱感一起出现时,这种情感孤立就更为难受。它意味着自我信任的基础变得脆弱了。它带有一种潜在冲突的种子,这种冲突发生在他渴望依赖别人又不能依赖别人的这种两难之间,因为他对他人深感不信任而又敌视。它意味着,由于内心的软弱,个人感到具有这样的欲望,即将所有的责任都推向他人,保护自己,关心自己。然而由于他所具有的基本焦虑,使他具有太多的不信任,以致难以实现这些欲望。这样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他不得不将自己的大部分精力放在安全的保护上。

焦虑越难以忍受,意味着越不得不彻底地保护自己。在我们的文化中有四种主要的方法,人们可用之保护自己消除焦虑,这就是:关爱、顺从、权力、逃避。

第一,获得任何形式的关爱都可以用作对焦虑的强有力的防止。格言是:如果我爱你,你就不会伤害我。

第二,顺从可以按照是否关系到特定的个人或制度而加以粗略地区分。顺从有这样的一种特定的焦点,例如,对标准的传统观点顺从,或对某些宗教的仪式的顺从,或对某些有权势的人的要求顺从,在遵从这些规则或顺从这些要求时,是所有行为的决定性动机。这种态度可能会采取“好”的形式表现出来,尽管好的含义与所顺从的要求或规则完全不同。

如果顺从的态度与任何制度或个人无关,它会以更一般形式表现出来,这就是:服从所有人的潜在欲望并避免产生怨恨的一切可能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压抑了自己所有的要求,压抑了对他人的批评,心甘情愿地受他人的虐待而不自卫,而且愿意不加区别地帮助他人。偶尔有些时候,人们意识到这样的事实:焦虑是

行为的基础,但是通常他们根本意识不到这一事实,并且坚定地相信,他做了他所做的,因为心中具有大公无私和牺牲自我的理想,这种理想有时太过分,把自己的欲望都舍弃了。无论是顺从的特定形式,还是顺从的一般形式,其格言是:如果我放弃,我就不会受到伤害。

这种顺从的态度也服务于通过关爱来确保安全的目的。如果关爱对一个人来说是如此地重要,以至于他生命的安全感依赖于它,那么他愿意为此付出一切代价,主要说来,这就意味着,他顺从于他人的一切愿望。然而,其结果是,一个人不能信任任何关爱,而他的服从态度的目的不是为了赢得关爱,而是为了赢得保护。有些人只在顺从时才感到安全。在他们那里,焦虑是如此的严重,对关爱是如此的不信任,以至于连关爱的可能性都没有。

防止焦虑的第三种努力是通过权力——力图通过赢得实际的权力或成功、或占有、或钦佩、或智力优势而达到安全感。在这种保护的 effort 中,其格言是:如果我有权力,就不会有人来伤害我。

防止焦虑的第四种手段是逃避。采用上述保护措施的人群都心甘情愿地满足于世界,用一种或另一种方法来应付世界。然而,还有一种逃避世界的保护措施。这并不意味着做荒江野老,过遗世独立的生活;而是意味着当他人影响到自己的外在或内在的需要时,他不去依赖他人。外在需要方面的不依赖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达到,例如:聚敛财物。这种聚敛财物的目的完全不同于追求权力或影响的目的,他们对财物的使用也不相同。因为不依赖他人而聚敛财物者,他们感到非常焦虑,以致不能享用这些财物,同时他们也具有一种吝啬节俭的态度,因为其惟一的目的是要使一切事物获得安全。另外一种不依赖他人的方法也可以达到外在的

独立于他人的惟一目的,这就是将自己的需求缩减到最小。

例如,内在需求不依赖于他人可以通过力图从感情上独立于他人,因而没有任何事情能伤害自己或使自己感到失望。它意味着舍弃自己的感情需求。这种舍弃的表示之一就是:不严肃地对待任何事情,包括自己。这种态度常常可以在知识分子圈中发现。不严肃地对待自己并不是说认为自己不重要。事实上他既不严肃地对自己,又认为自己非常重要,因此处在这两种态度的相互矛盾之中。

这种逃避的方法与顺从或屈从的方法相类似。因为二者都是舍弃自己的欲望。但是后者的舍弃其目的是为了获得“良好”的印象或者是为了屈从于他人的欲望以便感到安全,而前者则根本不是为了获得“良好”的印象,舍弃欲望的目的是为了不依赖于他人。这里格言是:如果我逃避,就没有事情能伤害到我。

为了评估这些不同的防止焦虑的努力在神经症患者身上所起的作用,有必要认识他们潜在的强度。它们并不是由于一种希望满足快乐或享乐的欲望所产生的,而是由一种希望得到自信的希求所产生的。然而这并不是意味着它们无论如何都没有本能的欲望强大或更具强迫性。经验表明,例如,野心这一驱动力的影响像性欲冲动一样强大或更强。

这四种方式中的任何一种方式,无论是追求全部的方式或是追求主要的方式,都会使他们所缺乏的安全感再度出现,如果生活景况允许人们追求它而不发生冲突——尽管这种片面的追求通常要付出使整个人格贫瘠的代价。例如,一位采取顺从态度方法的女人,可能会在这样一种文化中发现安宁和大量的次级性满足,这种文化要求屈服家庭和丈夫,顺应各种传统的形式。如果是一位

元首形成了一种对权力和财富的不倦追求的性格,那么其结果又可能是安全感的再现和功成名就的人生。然而,事实上,对一个目标一往无前的追求,常常不能实现自己的目的,因为他所确定的要求太过分,或太考虑不周以至卷入了与周围环境的冲突。尤其更为常见的是,从一种强大的潜在的焦虑中产生的安全感,往往不仅只是以一种方法来追求,而是以多种方法来追求,然而,这些方法相互之间并不相容。因此,神经症患者可能在同时被迫驱使去主宰他人而又需求每个人的关爱,既要服从他人的意志而又要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人身上,既想逃避他人而又渴望他人的关爱。正是这种极端的冲突,常常是神经症患者的动力中心。

最常见的两种相互冲突的企图是:追求关爱同时又追求权力。所以在下一章我将详细地讨论这一点。

正如我所描述的那样,神经症的结构总的说来并不与弗洛伊德的理论相反。主要说来,神经症是本能欲望与社会需求或者在“超越”中所表现出来的东西之间一种冲突的结果。但是我还是同意,个体欲望与社会压力之间的冲突是每种神经症不可或缺的条件,我不认为它是一个充分条件。个体欲望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冲突并不必然产生神经症,但可能会导致生活中的事实性局限,简言之,就是将欲望压抑下来,或者用更常见的词语来说就是:受到事实性的创伤。只有这种冲突产生了焦虑,而且如果这种要消除焦虑的企图导致了防御倾向。尽管这种倾向是被迫的,但仍然彼此不相容时,才产生神经症。

## 第六章 对关爱的病态需求

毫无疑问,这四种保护自我免受焦虑的方法在很多人的生活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有许多人的主要欲望是被爱或被支持,同时不遗余力地满足这种欲望;有些人的行为特征倾向于顺从、放弃、不维护自信心;有些人的欲望为追求成功或权力或占有所主使;而有些人的倾向则是离弃他人,不依赖他人。然而,这样就产生了问题:我宣称这些欲望代表了对某种基本焦虑的防止,这一宣称是否正确?它们难道不是在给定的人类可能性的正常范围内的多种欲望的表达吗?这种争辩的错误之处乃在于用一种非此即彼的形式提问题。事实上,这两种观点既不矛盾也不相互排斥。关爱的欲望、顺从的倾向、对影响力和成功的追求、逃避的倾向以各种混合的方式在我们身上出现,而不表现为神经症的迹象。

而且,在一定的文化中,这种倾向的一种或另一种形式是一种主要的态度,这是一种再度表明它们是人类正常潜力的可能性这样一个事实。关爱的态度、慈爱的态度、顺从他人欲望的态度在阿拉派西(Arapesh)文化中占主要的地位,正如玛格丽特·米德所描述的那样;以一种残忍的方式追求威望的欲望在瓜基乌托文化中是一种公认的模式,鲁思·本尼迪克特已经提出了这一点;逃避世界的倾向在佛教中是主要的信条。

我的概念并不否认这些欲望的基本特征,而是要坚持这样的

意见：它们都可以用来获得自尊以抗拒焦虑，而且，通过获得这种防卫性的功能，他们改变了他们的性质，使某些事情变得完全不同。我可以用一个类比来很好地解释这些不同。我可以爬上一棵树，因为我想检验一下我的体力、技巧并且想从高处看看风景；或者我可以爬上一棵树，因我在被一只野兽追赶着。在这两种情形中，我都在爬树，但是我爬树的动机完全不同。在第一种情形中，我的行为是为了愉悦；在第二种情形中，我为恐惧所驱使，出于安全的需求不得不爬树。第一种情形中，我可以爬树也可以不爬树，我是自由的；在第二种情形中，我因一种强烈的必然性而被迫爬树。在第一种情形中，我可以看看这棵树是否最适合我的目的；在另一种情形中，我无法选择，我必须爬上我视野中的第一棵树，而且它未必是一棵树：它可以是一根旗杆或是一座房屋，只要它能服务于我防护的目的就成。

驱动力的不同也导致了情感和行为的差异。如果我们是迫于满足直接的欲望，我们的态度就会有自发的和辨别力的性质。然而，如果我们为焦虑所驱使，我们的情感和行为就会是强迫的和不加区别的。当然有一种中间阶段。在本能的驱动下，例如饥饿和性欲，它主要地是受生理紧张所决定的，这种生理紧张来源于生理匮乏，它可能会积累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它的满足带有强迫性且混淆不清，这些性质正是焦虑所决定的驱动的特征。

而且，在所获得的满足中还有一种差别——用一般的语言来说就是快乐与自信之间的区别。<sup>①</sup>然而这种不同并不像初见的那

---

<sup>①</sup> H.S. 沙利文在“论社会科学探求中，病理学的意蕴和人际关系之研究”（载于《美国社会学学报》第四十三期，1937年版）已经指出：对满足和安全的追求乃是规范人生的基本原理。

样尖锐。满足性和饥饿的本能驱动是为了愉悦,但是,如果生理紧张被积累起来了,那么它所获得的满足就与解除焦虑所获得的满足十分相似了。在这两种情形中,都是要解除一种无可忍受的张力。就其紧张度而言,快乐和自信都是一样的强烈。性欲满足,虽然方式不同,但是它却像一个突然解除强烈焦虑的人的情感一样强烈;而且,一般说来,对安全的追求不仅可能会像本能追求一样强烈,而且可能会产生同样强烈的满足。

对安全的追求,就像前面一章讨论的一样,还包括了其他的次要性满足的来源。例如,被爱和被欣赏的情感,成功和有影响力的情感,可能会具有高度的满足感,但是它完全不同于获得安全感。而且,正如下文将要看到的,获得安全感的各种不同方法,可以使郁积的敌视得到相当的发泄,因此获得另一种紧张的解除。

我们已经看到,焦虑是某些欲望背后的驱动力量,并包含了用这种方法产生的最重要的驱力。我将进一步详细讨论事实上在神经症中举足轻重的这两种驱动力:对关爱的渴望与对权力和统治的渴望。

对关爱的渴望在神经症中是常见的现象,而且受过训练的观察者很容易认识到它,所以它被认为是现存焦虑及其大致强度的最可靠的标志之一。事实上,如果一个人对一个世界感到相当无助,认为这个世界充满了威胁和敌视,那么,对关爱的寻求将会是获得任何益处、帮助或称誉的最合理的事情,也是最直接的方法。

如果神经症患者的心理状况就是他内心中所想的東西,那么对于神经症患者来说是很容易获得关爱的。如果我可以文学表达出他经常模糊地感觉到的东西,那么,他的印象就有点像这样的情况:他所需求的是如此地少,只希望人们对他和善,给他劝告、同

情他是一个可怜的、无辜的、孤独的灵魂,是个渴望使他人快乐,不想伤害他人情感的人。这就是他的所见和所感。他并没有认识到他的敏感是他潜在的敌视,他的需求如何强烈地干扰了他自己与他人的关系;他也不能判断他给他人或他的行动给他人造成了什么样的印象。结果,他毫不理解为什么他的友谊、婚姻、爱情、工作关系常常不能使自己满意。他易于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人是错误的、他们不可理喻、不忠诚、卑鄙无耻,或者由于某些莫名其妙的原因,它缺乏使自己受人欢迎的天赋。所以,他不断地去追求爱的幻想。

如果读者回忆起我们在上文的讨论:焦虑是如何由压抑敌视所产生的,它又如何产生了敌视,换言之,焦虑和敌视如何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那么他就能够认识到神经症患者思维中的自我欺骗,从而认识到他之所以失败的原因。神经症患者本人由于认识不到这些情况,因此他们处在不能爱人而又迫切需求他人的爱这个两难的处境中。我们在此先谈谈这些问题中的一个问题——这些问题看起来简单实则极难回答——什么是爱?在我们的文化中爱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可能有时会听到这样的一个随手给爱下的一个定义:爱既是奉献又是给予。尽管这个说法包含着相当多的真理,但是对澄清我们所谈到的困难没有什么帮助。我们大多数人在某些时候都富有爱心,然而根本说来却无法去爱。值得考虑的乃是爱所由此产生的态度:它对他人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积极的态度呢还是由于,例如,害怕失去他人或者只是希望将他人置于自己的掌握之中?换言之,我们不能将任何表面的态度当作标准。

尽管弄清楚什么是爱这个问题极为困难,但是我们能够明确

地说出什么不是爱,或与爱毫不相关的因素是什么。我们可能对另一个人非常喜爱,然而有时候却会对他生气,不满足他的某些欲望,把他抛在一边。但是这种受制于一定范围的对愤怒或逃避的反应和对神经症患者的态度这二者之间有所不同。神经症患者总是不断地防卫他人,认为任何对第三者的兴趣都是对自己的忽视,并将任何要求都解释为一种强迫,或者将任何批评都解释为一种侮辱。这些都不是爱,它也不能与那些以爱的方式对任何性质或态度提供建设性的批评以便有可能加以矫正的行为同日而语;要求难以忍受的完美,以及要求有这样的一种敌视:“如果你不完美就请见鬼去吧!”这样的心态也不是爱,正如许多神经症患者所做的那样。

如果我们发现有人利用他人仅只作为达到某种目的的工具,也就是说仅只为或主要是为了实现某种需要,我们也不能将这种行为与我们的爱的观念相提并论。那些仅只为满足性欲、或婚姻或名誉的人,显然就属于上述之列。不过在这里我们常常易于将问题搞混,尤其是当需求只涉及心理性质时,一个人可能会欺骗自己相信,即便他人需要的只是他的盲目的称赞,他也会爱他人。然而在这种情形中,一旦他受到批评,因此不再有他之被爱的那种受到称赞的功能时,他人可能会突然抛弃他,甚至有可能起而反对他。

然而,在讨论什么是爱与什么不是爱之间的不同时,我们必须小心谨慎,不可落后退缩。尽管与利用被爱之人以便获得某种满足不可相提并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爱必须是完美的、完全利他的、具有牺牲精神的,那些不为自己需求任何事的爱也不是爱的情感。那些表现出这些信念的人都暴露出不愿说出自己的关爱的心

理,它所表现出的只是一种信念。诚然,我们要从我们所爱的人身上需求某种东西——我们需要满足、忠诚和帮助,必要时我们也需要献身。一般说来,表现出这种欲望甚至为这种欲望而奋斗是心理健康的一种表现。爱与神经症患者对爱的需求,这二者之间的不同之处乃在于这样的事实:在爱中,关爱的情感是首要的,而在神经症患者那里,首要的情感是对安全的需求,而对爱的幻想则是次要的。当然还有各种中间性情景。

如果一个人需求另一个人的爱只是为了防止焦虑,那么在他们的内心通常意识不到这一点。因为一般说来,他并不知道他充满了焦虑,不知道他因此而绝望地寻求各种关爱以获得安全,不受焦虑的折磨。他所感到的只是他所喜欢或信赖的人或者他所迷恋的人的存在。而他自认为是自发的爱很可能是对那些显现给他的仁慈的感激之反应,或者是对由某人或某种情景所激发的希望和关爱的一种反应。那些在其内心或明或暗地产生这种预期的人,将会不由自主地赋予重要性,而他的感情将会以爱的幻想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样的一种预期可以由这种简单的事实产生:他应该被一位有权力有影响的人所善待,或者为一位给人印象是比较安全、具有独立自主精神的人所善待。这种善待可以由性爱或性交所产生,尽管这种性爱与关爱毫不相干。这种善待可以受某些现存的关系所迷惑,这种关系暗含着一种帮助或情感支持的承诺,这些固定的关系包括:家庭、朋友、医生等。很多这样的关系都带有爱的伪装,换言之,都带有主观依恋的信任。事实上,这种爱只是个人为满足他自己的欲望而对他人的一种依附,它不是对真诚关爱的可靠感觉,当它的欲望没有实现时,反叛就会随时随地表现出来。对我们爱的观念来说最为本质的一个因素就是感情的可靠和稳

固。在这些例子中,都缺乏这一基本的因素。

不能去爱的最后一个特征我早已讲过了,但是我想再特别地强调一下:这就是对他人人格、特征、限制、需求、欲望、发展的忽视。这种忽视部分是由于促使神经症患者依恋他人的那种焦虑的结果。溺水的人抓住游来的人,通常并不考虑他人是否愿意或是否有能力救他。这种忽视部分也是对他人的基本敌视的表现,这种敌视的最普遍的内容是轻视和妒嫉。它可能会为那种不顾一切地去关心他人或甚至为了他人而牺牲自己的这种态度所掩蔽,但是通常这些努力不能防止产生某种不正常的反应。例如,一位妻子可能会主观地认为她对她的丈夫十分体贴爱护,但是,当她的丈夫沉迷于工作、利益和朋友之时;她就会产生怨恨、抱怨和压抑。一位过分关爱的母亲可能会相信,她为了孩子的幸福献出了一切,但是她恰恰忽视了孩子独立发展的需求。

那些将关爱的欲求作为防御的机制的神经症患者很少意识到自己缺乏爱的能力。大部分这样的人都会将他们对他人的需求错当成爱的倾向,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一般的人类,其态度莫不如此。他们有一种迫切的理由保持和维护这样的一种幻想。放弃这种错觉意味着揭示这样的一个两难处境:感到基本上敌视他人,然而却又等待着他人的关爱。我们不可能一方面鄙视他人、怀疑他人,摧毁他人的幸福或独立,同时又渴望他人的关爱、帮助和支持。为要达到这双重的目的——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人们就得保持敌视的秉性,并决不去意识这种秉性。换言之,爱的幻想,虽然是对介于真诚的喜爱与需求之间的可以理解的混淆,但是在使关爱的追求成为可能方面具有特定的作用。

还有另外的一种基本困难。这种困难是神经症患者在满足他

对关爱的渴望时所遇到的。在获得他所需的关爱方面,尽管他可能会成功,至少是暂时的成功,但是他却不能真正接受这种关爱。人们指望他如饥似渴地欢迎任何提供给他的关爱。但事实上是,他只是暂时接受这种关爱。每个医生都知道仁慈与关怀的结果,即使不对病人进行任何的治疗,而只是对病人进行医疗看护和彻底的检查,所有生理的和心理的困扰都会消失。一位情景神经症患者,即使是一位严重的神经症患者,当他感到有人在关爱他时,病情也会跟着痊愈。伊丽莎白·巴蕾特·白朗宁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甚至在人格神经症中,这种关照,无论是爱、兴趣还是医疗,都足以解除焦虑并因此促进痊愈。

任何一种关爱都会给神经症患者一种表面的安全感,或一种幸福感。然而,在其内心深处他可能对这种关爱感到不信任,并激起某种怀疑和恐惧。他不信任这种关爱,因为他坚定地认为没有人能够爱他。他的这种不可爱感常常是一种有意识的信念,任何关爱的实际经验都不能动摇他的这种信念。的确,人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它决不会在意识中打扰人,但是,即使它是人为的,它也像人们通常所意识到的那样,是一个不可动摇的信念。它也可以被一种“别理它!”这样的态度来掩盖,它通常以傲慢的形式表现出来,然后,它可能为挖掘它而制造障碍。不可爱这种信念与不能爱紧密联系在一起;事实上,这种信念是对不能爱的一种清醒的反思,一个真正能爱他人的人决不会怀疑他人也会爱他。

如果这种焦虑的确很深,那么,人们给予他的任何关爱他都看成是不信任。他可能马上认为,这种关爱别有用心。例如,在心理分析中,这些病人感到,分析医生之所以要帮助他,乃是出于他们自己的野心,或者,他们之所以对他作出赞赏和鼓励的评论,乃是

出于治疗的原因。我的一个病人正处在情感上的困扰之中,我当时提出到周末时我去看她,她却认为这是一种极大的侮辱。公开表示关爱也易于被看成是一种嘲笑。如果一位迷人的女孩公开对一位神经症患者表示关爱,他就会认为这是一种嘲笑,甚至认为这是一种别有用心的挑畔,因为他难以想象,这样一位迷人的姑娘会真的爱他。

对这种病人表示关爱不仅会使他们不信任,而且会使他们产生极大的焦虑。仿佛屈从于这样的关爱意味着陷入蜘蛛网中,或者,仿佛信任了一种关爱,就像生活在食人族中失去了保护。当神经症患者认识到某种真正的关爱是奉献给他的时候,他可能会有有一种恐怖的感觉。

最后,关爱的证实可能会产生一种依赖的恐惧。情感依赖,正如我们马上会看到的那样,对于那些没有他人的关爱就无法生活的人来说是一种真正的危险,而且,任何与他相似的东西都会激发他进行拼命的反抗。这种人必定会不惜一切地来避免对他人作出积极的情感反应,因为,这种反应立即会与依赖性的危险相结合。为了避免这一点,他必定会蒙骗自己反对这样的意识:他人是善良的、助人为乐的。他们想方设法地否认关爱,并在自己的情感中坚持认为:他人是邪恶的、无趣的、害人的。这种方式所产生的情景与这样的一种人相似:渴望食物却又不敢食用,因为他惟恐食物有毒。

总而言之,对一位为基本焦虑驱使因而寻求关爱作为保护的人来说,得到这种值得关爱的机会是非常少的。正是创造这种需求的情景干扰了他的满足。

## 第七章 病态关爱需求的 更进一步特征

我们大部分人都希望被人喜爱,愉悦地享受被爱的情感。如果没有人喜爱我们,我们会感到很苦恼。正如我们在上文中所讲的那样,对于儿童来说,被需要的感觉对于他的和谐发展来说极为重要。但是什么是神经症患者对关爱需求的特别特征?

我认为,武断地称这种需求为童稚的需求,不仅是误解了儿童,而且忘记了构成病态关爱需求的基本因素与童稚性完全无关。童稚的需求与病态需求只有一个共同的因素——他们的无助性,尽管在这两种情况中有不同的因素。除此之外,病态需求是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中成长的。再重复一次,这种环境就是焦虑,感到不可爱、不能信任任何关爱、敌视他人。

于是,在病态的关爱需求中,令我们吃惊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它的强迫性。无论在何时,当一个人受到强烈的焦虑驱使时,其结果必然是丧失自主性和灵活性。简言之,这就意味着,对于神经症患者来说,获得关爱不是一种奢侈,也不是额外力量和快乐的主要来源,而只是深切的必要性。其差别即在于“我希望被爱,我享受被爱”与“我不惜一切代价被爱”之间的不同;或者在于美食家与饕餮者之间的不同。美食家能品尝食物并区别其不同,饕餮者食之无味却为此不惜一切代价。

这一态度必然会导致过高地估价被爱的实际意义。事实上,

一般的人爱我们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重要的是让某些人喜欢我们——让那些我们关怀的人、那些我们必须与之同住和工作的人、那些我们希望给以好印象的人喜欢我们。除了这些人之外,我们是否受人喜爱毫无关系。<sup>①</sup>然而,神经症患者所感所为仿佛是他们存在、幸福和安全性完全依赖于他人之爱。

他们的欲望可能会不加区别地依附于任何人的身上,从理发师、宴会上碰到的陌生人到他们的朋友和同事,或所有的女人,或所有的男人,无一例外。所以,一声招呼、一个电话、一次邀请,其友好与否,都会改变他的心情甚至整个人生观。在这种联系中,我必须提醒一个问题,这就是:不能独立自处。这种不能从一种轻微的不安和烦躁到孤独的强烈恐惧,其程度各不相同。我并不是说那些做什么事都感到无聊的人,也不是对友伴易于厌倦的人,而是那些聪明能干、才华横溢的人,他们能独立享受很多事情。例如,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些人,当有人在周围时,他工作很卖力,如果他独自一人工作,他就会感到既不自在也不快乐。在这种对友伴的需求中,还可能有不同的因素,但一般的现象则是模糊焦虑的一种,一种对关爱的需求,或更确切地说,对某种人际关系的需求。这种人具有在宇宙中漂泊无依的感觉,任何一种人际关系对他来说都是一种安慰。正如在一次实验中,人们有时可能会观察到,这种不能独处是如何与焦虑的增加而增强的。有些病人也能独处,但只有当他们感到置身于保护的围墙之后——他用这

---

<sup>①</sup> 这样的结论可能不能令美国人满意。在美国,这样的一种文化因素进入了主流:为大众喜爱是竞争的主要目的之一,因此,为大众喜爱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在其他的国家并不具此意义。

种围墙包围着自己——时,他才能独处。但是一旦他们的保护机制通过分析得到有效的解决时,某些焦虑就会激发起来,他们就会突然发现不再能够单独自处。这是病人的情景暂时的阻滞不前,这在心理分析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

对关爱的病态需求可能会集中在单个人的身上——丈夫、妻子、医生、朋友。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那么那个人的感情、兴趣、友谊和存在对于病人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然而,这种重要性具有一种两难的特点。一方面,病人寻求他人的兴趣和存在,如果他人不在周围,他就会感到不被喜爱或受到了忽视;另一方面,当他与自己的偶像在一起时,他根本不快活。如果他意识到了这一矛盾,他通常会为此而烦恼。但是就我上述观点的基础而言,很显然,这种希望他人在场的愿望并不是真正的爱的表达,而只是对安全的需求,这种安全性是基于他人是可靠的这样一种事实之上的。当然,真正的爱和对可靠关爱的需求是相辅相成的,但是这两者并不互相吻合。

对爱的渴求可能局限于某一群人身上,也许是局限于具有共同兴趣、利益相同的人,如政治团体或宗教团体;或者,它可能局限于某一性别的人。如果对安全的需求局限于异性身上,情况表面看来可能是“正常的”,同时相关的人也会辩护说是“正常的”。例如,有些女人如果身旁没有男人围绕,她就感到悲伤和焦虑;她们就会开始一段新的恋爱,过不久又中断这种恋爱,又感到悲伤或焦虑,于是又开始新一轮恋爱,如此循环不止。这不是真诚地需要与男人保持关系,事实表明,这种关系是充满冲突的、令人不满足的。而且,这些女人对男人不加选择,她们只想男人靠近她们,而根本不爱男人。结果,她们连生理上的满足感都找不到。诚然,事实

上,整个现象极为复杂;我只是强调焦虑和对关爱的需求所起的作用。<sup>①</sup>

在男人身上人们也能找到类似的形式;他们也有被任何女人所爱的冲动,当与其他的男人在一起时,他们感到不自在。

如果对关爱的需求集中在同性身上,这种需求可能是潜在或明显的同性恋的决定性因素。如果与异性的交往因过多的焦虑而受阻,对爱的需求就会指向同性的身上,不用说,这种焦虑无需明显,它可能被一种对异性的厌恶或不感兴趣的情感所掩盖。

因为获得关爱对他来说极为重要,因此,自然而然地,神经症患者就会不惜任何代价来获得它,但是大多数人并没有认识到他们在这么做。他们付出代价的通常方式是一种屈服的态度,一种情感上的依恋。屈服态度的形式是:不敢反对和批评他人,只会奉献、赞赏和驯服。如果这种类型的人允许自己发表批评和贬损的评语,他就会感到焦虑,即使他的评语是无害的。这种屈服的态度有时走向了极端,以致神经症患者不仅消除了一切进攻的冲动,而且消除了一切自我判定的倾向,使自己被他人利用,作出一切牺牲,不管伤害如何大。例如,他的自我否定的态度可能表现为希望自己患有糖尿病,因为他希望获得关爱的人喜欢研究糖尿病,这意味着具有这种病就会引起对方的兴趣。

与这种屈服态度紧密相连、交织在一起的是情感依赖。这种情感依赖源于神经症患者依附于某些人的需求,因为这些人能够向他提供保护。这种依赖不仅会产生无休止的痛苦,甚至会造成

---

<sup>①</sup> 卡伦·荷妮:“对爱的过分估价,当今女性共同特性研究”,载于《心理分析季刊》(*Psychoanalytic Quarterly*)第三卷,1934年版,第605~638页。

全面的毁灭。例如,在有些人际关系中,一个人无助地依赖他人,即便他充分地意识到这种关系是不稳定的。他觉得,如果他得不到片言只语的安慰或一个微笑的鼓励,世界就仿佛会分崩离析似的,他可能在等待电话的同时感到焦虑的侵袭,如果别人不来看他,他就会感到极为凄凉,但是他却无法挣脱这些束缚。

通常,这种情感依赖的结构是比较复杂的。在人际关系中,如果一个人依赖于他人,那么他就会感到无穷的怨恨。依赖者怨恨自己的奴役,怨恨自己不得不向他人屈服,但是又惟恐失却他人,因此他又继续地依赖他人。由于认识不到是他的焦虑创造了这种情景,因此他就易于假定:他之屈服是由于他人的强迫而造成的。在这种基础上产生的怨恨不得不加以压抑,因为他极为需要他人的关爱,而他的压抑相应地又产生了新的焦虑,结果又产生了对安全的需求,从而又加强了对他人依附的冲动。所以在有些神经症患者身上,情感依赖产生了非常现实的、甚至是合情合理的恐惧,这就是:他的生活被摧毁了。当恐惧变得非常强大时,他们就会寻求自我保护,不接触他人,以反对这种依赖。

有时候,依赖的态度在同一个人身上会发生变化。在经受一个或多个痛苦的体验之后,他就会盲目地挣扎,抗拒任何与依赖性稍微有些相似的东西。例如,一个女孩谈过几次恋爱,但都是以绝望地依赖于某一特定的人而告终,最后形成了远离所有男人的态度,希望不付出任何情感就牢牢地把握住男人。

在分析中,这些过程在病人的态度上也是一目了然的。用时间来理解自己,乃是病人的利益,但是病人常常忽视了自己的利益,试图取悦于分析医生来赢得自己的利益或支持。即便有很好的借口来解释为什么他要很快治疗完毕——因为分析之故,他遭

受了很多痛苦,作出了很多的牺牲,或者,他没有时间来做治疗——这些因素有时候似乎变得毫不相干。病人有时候浪费时间,煞费口舌,只为了获得分析医生赞许的反应,或者他试图使每次治疗充满乐趣,愉悦分析医生,以赢得医生的赞誉。这种情况有时会走向极端,以致病人的联想或者梦境都受这种愉悦医生的愿望所控制。或者他可能痴恋着医生,相信,他只关心医生的爱情,并力图以自己诚挚的情感来打动医生的心。不加区别的因素也在这里一目了然,除非我们假定每个分析医生都是人类价值的典范,或者完美地符合每个病人的私人愿望。当然,分析医生很可能是一个每个病人都喜欢的人,但是即便如此,也不能解释分析医生要求病人的那种情感重要性的程度。

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移情”现象。然而,这一术语不太准确。因为移情指的是病人对分析医生的非理性的反应。而不是情感上的依恋。为什么这种依恋会发生在分析过程中,这个问题并不怎么重要,因为需求这种保护的病人会依恋任何医生、社会工作者、朋友、家庭成员。重要的是为什么依恋的程度这样强,发生的频率这样高,答案相当简单:分析尤其意味着解决那所建立起来的防止焦虑的自卫机制,并因此激发潜藏在防御围墙之后的焦虑。正是由于焦虑的增强,引得病人用某种方式依恋分析医生。

在这里,我们又发现一个与儿童的关爱需求的不同之处:儿童需要比成人更多的关爱和帮助,因为儿童比成人更无助,但是在儿童的态度中并不涉及强迫的因素。只有当儿童已经形成了焦虑态度时才会依恋母亲,绕膝不离。

病态的关爱需求的第二个特征也完全不同于儿童的需求,这个特征是:不满意感。的确,儿童会撒娇、需求过分的注意和无尽

的关爱,但是若情况是如此的话,这个儿童就是一位病态的儿童。一个健康的儿童,成长在温暖和可靠的环境中,或明确地感到他的所需,而不需要对关爱的事实作不断地证明,并且在他接受了所需的帮助时,他会感到心满意足。

神经症患者的不满足感会表现在一般人格的贪婪上,其具体表现为:贪吃、购物狂、逛商店狂以及缺乏耐心等。贪婪可能是由于长期的压抑而发生的突然爆发。例如,一个人平常买衣服时很有节制,但在焦虑状态时,一下子买回四件新外套,这种不满足感可能会像海绵吸水那样以比较温和的方式表现出来,有时又像章鱼捕食般以更为进攻的方式表现出来。

贪婪的态度以及它的各种不同方式和由此引发的禁忌,都可称之为“口欲”态度,<sup>①</sup>这一点在精神分析文献中已有很好的描述。虽然以这一名词为基础的理论假设很有价值,因为它能够将孤立的倾向统合成单纯的症状,这一假设的论点是:所有这些倾向都是源于口感和口欲,它们是不确定的。我们有效地观察到,贪婪常常表现在对食物的追求中,表现在吃相上,也表现在梦中,这些梦以更原始的方式表现了同样的倾向:如吃人肉的梦。然而这些现象并不证明我们在此原本就与口欲有关。因此,它看起来是一个更为可信的假设;一般说来,吃是满足贪婪的一个最便捷的方式,不管这贪欲的来源是什么,正如在梦中一样,吃是表达不满足感的最具体、最原始的象征。

---

<sup>①</sup> 卡尔·亚伯拉罕(Karl Abraham):“里比多的发展史”,载于《医疗心理分析的新工作》(*Neue Arbeiten zur aerztlichen Psychoanalyse*)第二册,1934年版。

“口欲”的态度具有里比多的特点这一假设也需要加以补充。无疑,贪婪的态度可能会出现在性欲的领域内,正如在梦中一样,实际生活中,对性欲的不满足感,也会将性交与吞咽或咀嚼相认同。但是它也出现在对金钱和衣物的贪婪无厌之中,或表现在对野心和名声的追求上,里比多的假设之所以言之成理,是因为贪婪在热情的强度上类似于性欲的渴求。然而,除非人们假定每种热情的渴求都是里比多的,否则依然有必要来证明:贪婪本身是性欲——前生殖器——的渴求。

贪婪的问题比较复杂,而且一直有待解决。正如强迫行为一样,贪婪也是由焦虑所引发的。焦虑是贪婪的前提这一事实是不言而喻的。举例言之,正如下面的例子,过度手淫或暴饮暴食即是证明,焦虑与贪婪之间的关系也可以由下面的事实表明:只要个人在某些方面感到有安全感,如感到被爱、有成功感、正在做建设性的工作等等,贪婪就会减少或者消失。例如,被爱的感觉会突然减少强迫希望购物的力量。一位成天以贪得无厌的心情期待着一日三餐的女孩,一旦开始设计服装——一件她十分乐意沉迷的事情,就会忘掉饥饿和进餐的时间。另一方面,当敌视和焦虑加强的时候,贪婪就会出现或者变得强烈起来;在一次讨厌的表演会之前,一个人可能会有要去购物的冲动,或者,在被冷落之后,有一种贪婪进食的压力。

然而有很多人虽然具有焦虑,但没有形成贪婪的习性。这一事实表明,与此相关的还有一些特殊的因素。在这些特殊的因素之中,唯一可以肯定的因素是:贪婪的人不相信自己具有创造他自己的任何东西的能力,所以,为了实现自己的需求,他不得不依靠外部世界;但是他们相信,没有任何人愿意满足他的需求。那些不

能满足关爱需求的神经症患者通常在物质方面也表现出同样的需求,诸如浪费时间和金钱,在具体情景中的实际建议,在困境中的实际帮助、礼物、信息、性满足等。在有些情况下,这种欲求必定会表现出要证明关爱的欲望;然而,在另外的一些情况下,这种解释并不可信。在后一种情况中,人们具有这样的印象:神经症患者只想要获得某些东西,不管它是不是关爱,如果他需求关爱的话,他对关爱的渴望只不过是追求某些可见的好处或利益的一种伪装而已。

这些观察表明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是不是对一般物质性的东西的贪婪是一个基本的现象,对关爱的需求是为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对这一问题没有一个普遍认同的答案。正如我们将在下文中看到的那样,渴望占有是对焦虑的一个基本的防御。但是经验也表明,在一些例子中,对关爱的需求——尽管这也是一个普遍的防御机制,可能会压抑得非常之深,以致难以浮出表面。那么这样一来贪婪物质性的东西就永久地或者暂时发生作用。

关于关爱的作用问题,大致可以分出三种神经症类型,在第一类中,神经症患者追求的无疑是关爱,不管这种关爱以什么形式出现,也不管他通过什么方法来获得。

第二种类型的人也寻求关爱,但是,如果他在某种关系中没有获得这种关爱——一般说来,他们肯定得不到这种关爱——他们不会立即向别人寻求关爱,而是远离人们。他们不再试图去接触他人,而是强迫自己去接受事物,去进食、购物或者阅读、聊天,去获得某种具体的东西。有时,这种变化会采取一些怪异的方式,就像有些人恋爱失败后开始强迫自己进食,以致在短时期内体重增加 20 至 30 磅;如果他开始新一轮恋爱,他的体重又会降下来;

如果这一轮恋爱又失败了,他的体重又会增加上去。有时,人们可以在病人身上看到同样的行为;在不满意医生的治疗之后,他们开始强迫自己进食,体重也迅速地增加,然而他们对此却几乎没有认识,但是,如果他对医生的治疗感到满意的话,他的体重又会迅速地降下来。这种对食物的贪婪也会压抑下去,那么它就会以胃口全失或某种消化不良的形式出现,这种类型的病人其私人关系比第一类人的更深。他们仍在寻求关爱,他们仍敢寻求关爱,但是任何不满意都会破坏他们与别人的关系。

第三种病人由于遭受的打击比较严重,也比较早,因此,他们的意识态度对任何的关爱都变得深深的怀疑。他们的焦虑是如此的深,因此,他们只满足于不受到任何积极的伤害。他们对关爱可能采取一种玩世不恭和嘲笑的态度。而宁愿实现那些可见的愿望:物质性的帮助、建议、性欲。只有当他们的焦虑得到释放以后,他们才能寻求关爱并欣赏关爱。

这三类病人的不同态度可以归纳为:对关爱的不满,对关爱的需求转变为一般的贪婪;对关爱没有明显的需求,而只是一般的贪婪。每一类都表明了焦虑和敌视心理的增加。

要返回到我们讨论的主要轨道上来,我们就得考虑,对关爱的不满所表现出来的特殊方式的问题。其主要表现在于妒嫉和对无条件之爱的需求。

正常人的妒嫉是对丧失某人之爱的危险的一种充分的反应。病态的妒嫉与正常人的妒嫉不同,他的反应大大超出了危险的程度。他的特点是,总是害怕失去对别人或别人的爱的占有;结果,别人感兴趣的任何其他事物对于他来说都是潜在的威胁。这种妒嫉可能出现在各种人际关系之中,出现在父母对想要交朋友的或

结婚的子女的态度上,或子女对父母的态度上,出现在婚姻伴侣之间,出现在任何具有恋爱关系的人之间。医生与病人之间的关系也不例外。在这种情况下它也显示出来,即心理分析医生去看别的病人时,它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哪怕连提一提其他的病人都不行。其格言是:“你必须专门爱我。”病人可能会说:“我认识到你善待我,然而,你也可能善待其他的人,因此,你对我的和善根本算不了一回事。”对任何必须与他人共享的关爱或兴趣,都会立即和全部地加以贬斥。

过分的妒嫉常常被认为是由童年时代对兄弟姐妹或对父母的一方产生妒嫉的经验决定的。即便是在健康的儿童中,兄弟之间的争斗也是常事,例如妒嫉新生的弟妹。只有当儿童感到他没有丧失父母的任何关爱或他从前所具有的注意时,这种妒嫉才会不留痕迹地消失掉。按照我的经验,正如上文所述,出现于儿童时的过分妒嫉,它之所以不能克服,是由于这些儿童具有与成年人相似的神经症情景。对关爱的不满是由一种基本焦虑产生的,它早已存在于儿童的内心。在心理分析文献中,婴儿与成人妒嫉反应之间的关系常常没有得到清楚的表述,因为成人的妒嫉常常被称之为婴儿妒嫉的“重复”。如果这一术语指的是成年妇女妒嫉她的丈夫,因为她同样妒嫉她的母亲,那么它就毫无根据了。我们在儿童对其父母或兄弟关系中发现的强烈的妒嫉不是后来成人妒嫉的最终原因,但是它们的来源是一样的。

对关爱的不满足感比妒嫉感要强烈,这一说法乃是表明对无条件之爱的追求。这种需求经常出现在意识心灵中的形式就是:“我要因我之所是而非我之所为而被爱。”到目前为止,我们可能会认为这种需求稀疏平常。的确,希望别人只是爱我们本身,是我们

每个人都有的愿望。然而,对无条件之爱的病态需求不同于正常人的需求,它无所不在,而且表现为一种不可能实现的一种极端的形式。它要求的是没有任何条件、没有任何保留的关爱。

首先,这种需求包括不考虑任何挑逗行为的被爱这样的一种愿望。这种愿望作为一种安全感是必需的,因为神经症患者在内心明白这样的事实,他充满了轻视和过分的要求,因此,他具有可理解的和适当的恐惧,即如果这种敌视变得非常明显的话,他人可能会疏远他,或恼怒他或报复他。这类病人表述的意见是:去爱一位可爱的人是十分容易的而且毫无意义,爱应该容忍对方有缺点。任何批评都被认为是爱的疏远。在心理分析过程中,怨恨可能是由这样的一种情景产生的:他可能必须改变他的人格中的某些东西——尽管改变人格是心理分析的目的——因为他感到,任何这样的暗示他都感到是对他的关爱需求的一种打击。

其次,对无条件之爱的病态需求包括:需求一种没有任何回报的被爱。这种需求是必须的,因为神经症患者感到,他不能感受任何温情,或他不能给予任何关爱。因此他也不愿意给予任何关爱。

第三,他的需求包括:为人所爱却从不为他人着想的愿望。这一愿望是必须的,因为,如果他人从这一情景中获得了任何利益和满足,神经症患者就会立即产生这样的怀疑:他人之所以喜欢他,只是为了利用他或从他那里获得满足感。在性关系中,这一类型的人将会吝惜他人从这种关系中得到的满足感,因为他会感到,他们之所以被爱只是因为这种满足感。在心理分析过程中,这些病人吝惜心理医生为帮助他而得到的满足感,他们要么贬低心理医生给予他们的帮助,要么对这些帮助不能表示任何感激之情,尽管他们在理智上认识到他们已经接受了医生的帮助。或者,他们易

于将病情的改善归功于另外的因素,比如,归功于服药,或归功于朋友的建议。当然,他们还吝惜应付给医生的费用。尽管在理智上,他们认识到这些费用是用来补偿时间、精力和知识的,但是,在情感上,他们会认为,如果付费,就证明了心理医生对他们不感兴趣。这类病人很可能也怯于赠物,因为赠送他人礼物使他们不能确信,他人是爱他还是爱礼物。

最后,对无条件之爱的需求还包括:不惜一切牺牲赢得被爱的愿望。只有当他人为病人牺牲了一切时,病人才真正感到他真的被他人所爱。这些牺牲包括金钱或时间,但是也可能包括信念和个人的正直和诚实。例如,这种需求包括这样的预期:即便是蒙受灾难,他人也应该站在自己的一边。有些母亲相当天真地认为期望从子女那里获得盲目的奉献和牺牲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她们“在痛苦中生出了他们”。另外的一些母亲压抑了这种无条件之爱的愿望,所以她们能够给予子女大量积极的帮助和支持;但是,这样的母亲从子女关系中得不到任何满足感,因为,正如上面已经提到过的那些例子那样,孩子之所以爱她,只是因为他们从她那里得到了这么多的爱,所以,她们在内心里吝惜她们给予子女们的爱。

这种对无条件之爱的追求,其内涵上包括对他人的无理及残忍的忽视摒弃,最为清楚地显现出对关爱的病态需求中潜藏的敌视。

正常的吸血鬼式的人是有意识地决定利用他人,直到极限。与这种正常的吸血鬼式的人相反,神经症患者通常完全没有意识到他到底在做什么。由于一种严格的策略上的原因,他不得不使自己的需求处在意识之外。没有人主动而坦率地说,“我要你牺牲你自己,而不要指望你能从我这里获得任何回报。”他强迫地将自

己的需求放在某种理所当然的基础上,诸如:他生病了,所以,需要大家为他做出牺牲。另外一种不能认识到他的这种需求的强有力的理由是,这些需求一旦建立起来,就难以放弃,而认识到他们是不合理的,就是放弃这些需求的第一步。它们的根系除了深深地扎入上面所提到的基础上之外,还深深地植根于神经症患者深刻的信念:他不能靠自己的能力生活;他所需求的都必需交付给他,他生活的一切责任都依赖于他人,而不是自己。所以放弃他的无条件之爱的需求的前提是改变他对生活的整个态度。

神经症患者对关爱需求的全部特征都有这样一种共同的事实:神经症患者自己的冲突倾向使他不能获得他所需求的关爱。那么,如果他的需求得到了部分的实现,又作何反应呢?或者,一旦他的需求遭到完全的拒绝,他又作何反应呢?

## 第八章 寻求关爱的方法和 对拒绝的敏感性

在考虑这样的一些神经症患者急切地需求关爱,而对于他们来说,要获得这种关爱又是如何的困难这样的问题时,人们不妨假定,在一种温和气质的情感气氛中,这些病人将会很好地接受关爱。但是,这样一来,另外一种复杂性又产生了:与此同时,对于任何拒绝或冷落,他们感到痛苦的敏感,不论这种拒绝或冷落是如何地轻微。而一种温和的气氛,尽管一方面可以使人得到安全感,但是另一方面也是一种冷落。

要描写他们对这种拒绝的敏感程度,这是十分困难的。一次约会的变更,一番等候,没有得到及时的反应,对他们的意见表示不同意,他们都感到受到了冷落。这种冷落不仅使他们返回到基本的焦虑,而且他们将此视同于侮辱。我将在下文解释为什么他们会感到这如同于侮辱。因为冷落就具有侮辱的因素,它会引起强烈的愤恨,这种愤恨可能会爆发出来。例如,一个女孩,她的爱猫由于没有对她的关怀产生反应,就会愤怒异常地将猫甩到墙上。如果他们必须等候,他们就会将这件事解释成故意轻视他们,所以没有必要按时接待他们,而这又会激发起他们敌视的爆发,并且会导致他们隐匿一切情感,以至于他们变得冷漠、麻木不仁,即使在几分钟前,他们一直渴望受到接见。

感到冷落与感到受到侮辱之间的关系常常处于无意识状态。

由于受到的冷落非常之轻,以至于逃过了意识的觉察,所以,这种情况更易于发生。所以,一个人会感到受到了侮辱,或变得轻视一切并充满报复的欲望,或感到精疲力竭,或受到压抑,或感到头疼,而完全不知道其原因是什么。然而,这种敌视反应不仅遭到拒绝时会出现,或感到拒绝时会出现,而且,当他预期会遭到拒绝时也会出现。例如,一个人可能会愤怒地问一个问题,因为,在他的心中,他已经预期到,这个问题会遭受拒绝。他可能不送花给他的女朋友,因为他预期到,她会在这礼物中感到他别有用心。由于同样的原因,他可能会极为害怕表达任何积极的情感,如喜爱之情,一份感激,一次称赞,因此在自己和他人看来,他比真实的情况更为冷漠,更为铁石心肠。或者,他会嘲讽妇女,对预期的冷漠采取报复手段。

对拒绝的担心,如果发展得比较厉害,会导致一个人避免使自己暴露给任何要拒绝的可能性面前。这种逃避从在买香烟时不要火柴到不去寻找工作。那些担心任何可能拒绝的人,会逃避追求他或她所喜欢的女人或男人,只要他们不能绝对确定他们不会遇到拒绝。这样的人通常因邀请女孩跳舞而生气,因为他们担心女孩可能只是出于礼貌才接受他的邀请;而他们认为女孩在这方面要好得多,因为她们不需要采取主动。

换言之,对冷落的恐惧可能会导致一系列的禁止。这种禁止可归入胆小的范畴。这种胆小是一种防御机制,以使自己不遭受冷落。自己不可爱,这样的一种信念常被用作同样的防御机制。就好像这类人对自己说:“无论如何,他人是不爱我的,所以,我最好呆在一个角落里,并因此保护自己免受任何可能的拒绝。”所以,对冷落的恐惧是需求关爱的重大阻碍,因为,它阻止病人让他人感

到或知道他想获得他人的某些注意。而且,由冷落情感所激发的敌视,会激发焦虑甚至加强焦虑。这是造成“恶性循环”的重要因素。它使人难以逃避。

这种恶性循环是由对关爱的病态需求的各种不同的涵义形成的。它大致可以分为下面几种:焦虑;对关爱的过分需求,包括对独一无二的和无条件之爱的需求;如果这些需求没有实现的话,他们就感到受到了冷落;带着强烈的敌视来回敬这种冷落;需要压抑这些敌视,因为害怕失去关爱;一种扩散式愤怒的紧张状态;增长的焦虑;对安全感的迫切需求……所以,用来抵制焦虑的方法再度产生新的敌视和新的焦虑。

这种恶性循环的形成不仅在上文所讨论的情况下是典型的,一般说来,它是神经症的最重要的过程。除了它的安全性外,任何保护机制都有创造新的焦虑的性质。一个人可能会饮酒作乐以逃避他的焦虑,然而又害怕饮酒会有损身体。或者他可能用手淫来减轻自己的焦虑,然而又担心手淫会使自己得病。或者他可能对焦虑进行某些治疗,然而很快又会害怕这种治疗会伤害他。这种恶性循环是严重的神经症之所以变得更为恶化的主要原因,即使外部的条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揭示这种恶性循环及其涵义,是心理分析者的重要任务。神经症患者自己是掌握不了这项任务的。他只注意到他的结果,感到自己陷入了无助的处境。这种陷入无助的处境的感觉乃是他对自己不能突破的困扰的反应。任何似乎会引他脱身出险的路都会再度引他陷入新的危险之中。

人们可能会问:尽管神经症患者充满了内在的困扰,但是,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使他们获得他们想要的关爱?事实上,有两个难题必须解决:首先,如何获得必要的关爱;其次,如何使这种关爱

的需求对他本人和他人而言都是合理的。我们可以大致列举几种不同的获得关爱的方法：贿赂，乞求怜悯，寻求公正，最后是威胁。诚然，这种分类正如心理分析上列举各种因素一样，不是严格的范畴上的分类，而只不过是一般倾向的指示而已。这些不同的方法并不互相排斥。根据不同的情景，根据整个的特征结构，以及根据敌视的程度之不同，这些方法可以同时使用或交互使用。事实上，上文所列举的四种方法依其次序表明了敌视的增加程度。

当一个神经症患者试图通过贿赂获得关爱时，他的格言可以描述为：“我深深地爱你，所以，你也相应地应该深深地爱我，为了我的爱，你要放弃其他的一切。”事实上，在我们的文化中，这种策略较常被女人使用，而男人不常使用，这是由于女人生存的处境使然。几个世纪以来，爱不仅是女人在生命中的特定领域，而且事实上是女人获得她们所想得到的东西的惟一的或主要的途径。男人是带着这样的信念成长的：如果他想安身立命，那么他就必须在生活中有所成就，女人认识到，通过爱，并且只能通过爱，她们才能获得幸福安全和声誉。文化地位的不同对男人和女人的心理发展具有极重大的影响。在现在这本书中讨论这种影响，时机尚未成熟。但是这种影响的结果之一就是，在神经症上，女人比男人更经常地使用爱来作为一种策略。同时，这种对爱的主观信念使得她的要求更加合情合理。

这种类型的人处在一种特殊的危险之中，这就是，在他们的爱的关系中，陷入了一种痛苦的依赖里。例如，假定一个病态的需求关爱的女人，依附于具有同样类型神经症的男人，然而，当女人渴求男人的时候，该男人会抽身而退；女人对这种拒绝的反应是强烈的敌视，她压抑着会失去他的恐惧。如果女人也后退了，男人又会

开始再度追求她。那么她不仅会压抑住敌视,而且会以强烈的献身来掩饰这种敌视。当她再度被拒绝时,她又会有同样的反应,最后爱愈加强烈。所以,她逐渐形成这样的信念,她被一种不可克服的“高度激情”所占有。

另一种可以称之为贿赂形式的方法乃是通过理解他人,在心理或事业发展上帮助他人,解决他人的困难等等方式来赢得他人的关爱。男人和女人都会用到这样的方法。

获得关爱的第二种方法是:乞求怜悯。神经症患者会张扬自己的痛苦或无助借以引起他人的注意,他们的格言是:“你应该爱我,因为我遭受了痛苦而且无依无助。”同时,这种痛苦可以用作理所当然地获取过分需求的权利。

有时候,这样的乞求相当公开,一个病人可能会指出,他是最病重的病人,因此具有最大的权利以获得心理分析医生的注意,他可能会嘲笑其他的病人具有一副健康的外表。而且他也憎恨其他的病人比他更能成功地运用这种策略。

在乞求怜悯时,他们或多或少地混合了敌视心理。神经症患者可能只乞求我们善良的本性,或者他可以用极端的手法来寻求好处,例如,通过使自己陷入一种灾难性的情景之中而迫使我们对他援助。在社会或医疗工作上与神经症患者打交道的每个人都知道这种策略的重要性。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讲述自己的困难的病人与用戏剧的方式陈示自己的痛苦以激起他人的怜悯的病人之间有重大的不同。我们在各个年龄段的儿童身上可以发现相同的倾向,他们也具有相同的多样性。儿童有时为了某些痛苦需求安抚,或者通过潜意识地发展一种令父母可怕的情景来引起父母的注意,如食欲不振,小便不通等。

使用乞求怜悯这一方法以这样的一种信念作为前提：我无法以其他方式获得爱。这种信念可能会合理化为对关爱的普遍不信任，或者它采取这样的一种信念方法：在特殊的情景下，关爱不能以其他方式获得，惟有乞求怜悯。

获得关爱的第三种方法——寻求公正，其格言可以描述为：“这是我为你所做的，你为我做了些什么？”在我们的文化中，母亲们常常指出，她们为子女殚精竭虑，因此她们应该得到不懈的奉献。在爱的关系中，屈服于追求的事实，也可以用作要求的基础。这类人常常会过分热心地为他人做事，在内心中他们充满这样的期待：他们会得到他们所期望的回报，如果他人不能同样心甘情愿地为他们做事，他们就感到极其失望。在这里，我并不是指那些有意识地算计的人，而是那些完全不知道他在期待可能的回报的那些人。他们的强迫性慷慨或许可以更确切地描述为一种神奇的姿态。他们为他人所做的一切都希望得到他人的回报。正是这种痛心的失望情绪表明，事实上是希望得到回报的心理在起作用。有时候他们在心里记着一本账，在这本账中，他们为自己记下了他为人所做的不寻常的牺牲，事实上，这些牺牲毫无用处，例如他为人而彻夜不眠等。同时他又减少甚至忽略他人为他所做的一切，所以，他们如此地歪曲情景，因而感到他们有权获得特殊的关注。这一态度又给神经症患者本人造成后患，因为他会非常害怕欠人恩情。由于他本能地以己之心度他人之腹，所以他担心，一旦他从他人那里得到了好处，他人就会利用他。

这种寻求公正的心理也可以作为神经症患者一旦有机会就会愿意帮助他人的思想基础。他会指出，设身处地地想，他会如何地去爱他人或为他人作出自我牺牲。他感到他的要求是合理的，因

为事实上,他对别人的需求并不比自己的多。在事实上,这种合理化的心理比神经症患者自己认识到的更为复杂。他自己所具有的性质主要是他在潜意识中向自己夸大了这种他需求他人的行为。然而,这并不完全是欺骗,因为事实上他的确有一些自我牺牲的倾向,这种倾向产生于这样的来源:他缺乏自我确认,他自甘失败,他有希望他人迷恋他那样的迷恋别人的冲动。

当他受到伤害时,他要求对此伤害进行补偿。当他的需求放在这种基础之上时,在寻求公正的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敌视表现得最为明显。他的格言是:“你使我受苦,或你使我受到了损失,所以你有义务帮助我、照顾我、支持我。”这种战术与创伤性神经症患者所采用的战术相类似。我个人没有创伤性神经症患者的经验,但是我怀疑那些创伤性神经症患者是否也属于这一范畴,并且使用这种伤害作为需求的基础,任意地索取回报。

我将举出几个例子来表明神经症患者是如何产生罪责的情感或义务的情感,以便使他自己的需求看起来公正。一位妻子因丈夫不忠而生病。她没有表示任何责备,也许没有在意识上感到要责备他,但是她的病毫无疑问是一种活生生的责备,目的是使她的丈夫产生罪责的情感,并且使他心甘情愿地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她的身上。

这类病人的另一种病态是,一位患有强迫症和歇斯底里症的妇女,有时坚持要帮她的妹妹们做家务。一两天之后,她在潜意识中就强烈地憎恨这一事实。她们接受了她的帮助,于是随着病情的加重她不得不躺倒在床,因而迫使她的姐妹们不仅要单独处理家务,而且还得分心来照顾她。而且,她的病情之恶化表示了一种责难,并导致她从他人那里得到补偿的要求。当她的一个姐妹批

评她时,她当场晕倒了,以此表明她的怨恨并强求同情怜悯。

我的一个病人,在她接受心理分析治疗之后的一段时间内,病情变得越来越恶化,并因此形成幻想,认为心理分析医生要使她精神崩溃,以便掠夺她的财产。因此,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使我有义务来照顾她。这种反应在药物治疗中是常见的,而且常常伴随着对医生的公开威胁。轻度病患者,如下面的情况也常常出现:当心理分析医生休假时,病人的情况变得严重,她或明或暗地断定,她的病情恶化是心理分析医生的过错,所以她可以要求医生对她进行特殊的关注。这种例子在日常生活中也易于见到。

正如上面这些例子所表明的那样,这种神经症患者宁愿付出痛苦的代价——甚至是加重痛苦——因为,用这种方法,他们能够表达谴责和需求,而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这么做,并因此而能够保持他自己的公正感。

当一个人使用威胁作为策略以获取关爱时,他可能威胁伤害他自己或伤害他人。他会威胁采取一些破坏的行动,如毁坏一个人的声誉,或者伤害某人或伤害自己。威胁要自杀,或者甚至是试图自杀也是常见的例子。我的一个病人运用这种威胁方法获得了两个成功的丈夫。当第一个男人给出信号要打退堂鼓时,她在该城最热闹的地方当众跳进了河里;当第二个男人不太愿意结婚时,她在一次确信能够发现的时刻打开煤气自杀,她最明确的目的就是要表明,缺少了那个男人她就无法活下去。

由于神经症患者希望通过他的威胁获得对他的需求之顺从,只有当他具有达到这一目的的希望时,他才不会将这些威胁付诸事实。如果他丧失了这种希望,他就会在绝望和报复的压力下将其付诸事实。

## 第九章 病态关爱需求中的性欲作用

对关爱的病态需求常常表现为性迷恋或对性满足的不满意的饥渴。鉴于这一事实,我们必须提出这样的问题:对关爱的病态要求的整个现象是否是由性生活的不满足而促成的?是否所有的对关爱、对接触、对欣赏、对支持的渴望都不是由对安全感的需求所促成的,而是由于不满足的里比多所促成的?

弗洛伊德倾向于以这种方式对待这个问题。他已经看到,很多神经症患者渴望与他人接触,并易于依附他们。他将这一态度描述为源于不满足的里比多。然而,这一概念是基于某种前提之上的。它假定,所有这些本身并不是性欲的现象,诸如希望得到忠告、赞许或支持等都是性欲的表现,这些性欲或被压抑或被“升华”。而且,它还假定,柔情蜜意是性冲动的一种禁止的或“升华”的表现。

这种假设是不可证实的。在关爱的情感、柔情的表达与性欲之间的联系并不像我们有时所假设的那样紧密。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告诉我们,个体之爱是文化发展的结果。布里法特(Briffault)<sup>①</sup>认为,性欲与残忍有紧密的关系,而与柔情无关,尽管他的

---

<sup>①</sup> 罗伯特·布里法特(Robert Briffault):《母亲们》(*The Mothers*),伦敦和纽约,1927年版。

这一结论不太令人信服。然而,从在我们的文化所作的观察中,我们知道,没有关爱和柔情也存在着性欲,没有性欲,关爱和柔情也能存在。例如,没有证据表明母子之间的柔情具有性欲的特性。所有我们能够观察到的情况——作为弗洛伊德发现的结果——乃是性欲的成分可能存在。我们在柔情与性欲之间可以看到很多联系,柔情可能是性欲的先驱;人们只有意识到柔情时才具有性欲;性欲可以激起或转化为柔情。性欲与柔情之间的这种转化明确地表明了它们之间的秘密关系,然而,看起来还是谨慎一点为好,并且假定这两种不同的感觉,虽然可能会吻合,却能互相转化或彼此代替。

而且,如果我们接受弗洛伊德的假设:不满足的里比多是寻求关爱的驱力,那么,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什么我们在那些从生理的角度看性生活极为满足的人,为什么同样地渴求关爱以及上文所描述的所有复杂现象——占有欲、无条件之爱,感到不被人爱等。然而,毫无疑问,这些情况的确存在,因此不可避免地得出这样的结论:不满足的里比多并不能解释这些情况和现象,这些情况的原因在性欲的领域之外。<sup>①</sup>

最后,如果对关爱的病态需求只不过是性欲现象,我们就无法理解相关的诸多问题,诸如占有欲、无条件之爱、被拒绝的感觉等。的确,这些不同的问题已经得到了认识,并得到了详细的描述:例如,妒嫉可以追溯到兄弟之间的争斗或俄狄浦斯情结;无条件之爱

---

① 具有性满足的能力,但是在情感领域里具有明确的困扰,这样的一些例子对于某些心理分析者来说一直是挠头的事情,但是,它们不符合里比多理论这一事实并不能排除它们的存在。

可以追溯到口腔性欲；占有欲被解释为肛欲，等等。但是，人们并没有认识到，在现实中，上几章所描述的态度和反应的全部范围是同一的，它们是整个结构中的组成部分。由于认识不到焦虑是关爱需求背后的动力，所以我们难以理解这种需求加强或减少的前提条件。

运用弗洛伊德天才的自由联想法，在心理分析过程中，可以精确地观察到焦虑与关爱需求之间的关系，尤其是通过注意病人对关爱需求的变动更是如此。在一段时间的建设性合作工作之后，病人可能会突然改变他的行为，并且要求增加心理分析的时间，或者渴望与心理分析家的友谊，或者盲目地称赞他，或者变得极端妒嫉，具有占有欲，对心理分析家将他“只是当作一个病人”极为敏感。与此同时，他的焦虑在增强，或者以梦的形式显示出，或者情绪冲动，或者通过生理症状表现出来，诸如腹泻或尿频，病人认识不到具有焦虑性，或者，他对心理分析家的严重依赖是由于焦虑引起的。如果心理分析家认识到这种联系，并且向病人指出这种联系，他们双方都会共同认识到，在病人突然迷恋心理分析家之前，就会接触到那激起病人焦虑不安的问题，例如，他会感到心理医生将它解释为一个不公平的责备或者解释为一种侮辱。

这种连续的反应看起来像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出现了，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激发病人对心理分析家产生强烈的敌视；病人开始仇视心理分析家，以致梦见心理分析家死了；他立即压抑住他的敌视冲动，变得害怕起来，并且出于安全的需要他开始依附心理分析家；当这些反应全部经历过后，敌视、焦虑以及由此增加的对关爱的需求隐身不见了。作为焦虑的结果，对关爱的强烈需求是有规律出现的，人们可以很可靠地将它看做是一个预警信号，它表明，

某些焦虑又浮现出来并在寻求安全感,上文描述的过程并不局限于心理分析的过程。同样地这种反应也发生在人际关系中。例如,在婚姻中,丈夫可能强迫性地依附他的妻子,妒嫉她、占有她,理想化她、赞美她,尽管在内心深处他恨她、怕她。

我们可以合情合理地将掩盖于潜藏的憎恨之上的过度忠诚称之为一种“过度补偿性作用”,假如人们认识到这一术语只不过是粗略的描述而没有深及过程的动力学的话。

如果因为上面所提出的一切原因,我们拒绝接受关爱需求的性欲原因论,那么就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对关爱的病态需求有时候与一种性欲愿望相伴随,或者共同出现,这只是一个偶然的現象吗?或者产生这样的问题:是否存在着某种条件,在这种条件下对关爱的需求是以性欲的方式感到或表达出来的,这只是个偶然的現象吗?

从某种程度上讲,关爱需求的性欲表达依赖于外在的环境是否有利。从另外的程度上讲,它依赖于不同的文化、精力和性欲秉性。最后,它依赖于该人的性欲生活是否满足,因为,如果不满足,它会比那些具有满足的性生活的人更能以性的方式反应出来。

尽管所有这些因素都不言而喻,并且对神经症患者的反应有决定性的影响,但它们还不足以解释基本的个体差别。在有些表现为具有关爱病态要求的人那里,这些反应在每个人身上的反应都不相同。所以我们发现,有些人在与他人的接触中,总是立即地,几乎是强迫性地或强或弱地带有一种性欲的色彩,而在另外的一些人身上性亢奋或性活动保持在正常的情感和行为的范围之内。

属于前一个集群的人是将性关系转向他人的那些男人和女人

们。更为深入地了解一下他们的反应,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感到不安全,没有保护,当他们没有性关系或者当他们没有马上看到具有性关系的机会时,他们就表现得相当失常。属于这一集群,然而却有更多的禁止机制的,还有这样的一些人,这些人在实际的行为上具有很少的性关系,但是无论对方是否特别地吸引他们,他们总是在自己与他人之间创造一种性爱的气氛。最后,属于这一集群的还有第三类人,这些人在性上具有更多的禁忌,但是这些人容易达到性兴奋,并强迫性地将任何异性看做是潜在的性伴侣。在这一类人中,强迫性的手淫可能——不是必然——代替性关系。

在这一集群的人中,关于他们所获得的生理满足具有很大的差异。这一集群的人所共同具有的,除了他们性需求的强迫性外,就是不加区分地选择性伴侣。他们具有这样的一些共同特征,在上文我们在一般性地考察具有病态的关爱需求的人时已经讨论过这些特征。除此之外,人们会非常震惊,在他们随意的性关系——无论是实际上的还是想象的——与他们与他人的情感上的强烈困扰之间具有极大的差异。这种困扰比那些受基本焦虑困扰的一般人更为彻底。这些人不仅不相信关爱,而且在事实上变得深为忧烦——或者,在男人的案例中变得阳痿——如果向他们提供性爱的话。他们可能意识到了他们的防御态度,或者他们易于责骂他们的性伴侣。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相信,他们从来没有遇过一个可爱的意中人。

对于他们来说,性关系不仅是特别性紧张的发泄,而且是人际交往的惟一途径。如果一个人发展了这样的信念,对于他来说,获得关爱在实际上是毫无问题的,那么身体接触可能成为情感关爱的替代品。在这种情况下,性即使不是惟一的,也是主要的达到与

他人接触的桥梁,所以受到了他们非同寻常的重视。

在某些人身上,这种不加分别地讨论伴侣可以在选择可能伴侣的性别上表现出来;他们会积极地寻求与同性的关系;或者被动地屈服于性需求,而不管这种性需求是从异性那里得到的还是从同性那里得到的。在此,我们对第一种类型不感兴趣,因为尽管在他们那里性欲也是用之于建立人际关系,除此之外,他们很难获得人际关系,但是,他们的主要动机并不是在于获得对关爱的需求,而是在于一种征服的冲动,或者更确切地说,在于使他人屈服的冲动。这种冲动很可能具有如此的强迫性,以致性的区分相对说来变得不那么重要了。男人和女人他们都要征服,无论是在性方面还是其他的方面。但是第二类人,他们愿意屈服于同性或异性的性爱追求,是由于受到对方关爱的不断需求的驱动,尤其是他们担心如果拒绝性要求,或者如果敢于反抗加诸他身上的任何需求——不管这需求是否合理,他们就会丧失他人的关爱。他们不想失去他人,因为与他人的交往是十分迫切的需求。

以他们天生具有两性本能为基础来解释这种不加区分地选择性关系的现象,在我看来,并不具建设性的意义。在这些例子中,没有迹象表明他们真的倾向于同性。一旦自我确认代替了焦虑,他们的同性恋倾向就会消失,同样地,他们不加区分地选择异性伴侣的倾向也会消失。

天生具有两性态度这样的观点对于同性恋问题也能进行某种程度的解释。事实上,在上文所说的“两性”类型的人与真正的同性恋类型的人之间有许多中间性的阶段。在后者的历史中,有些确定的因素来解释这样的事实:他不把异性当作自己的性伴侣。当然,同性恋的问题极为复杂,我们难以从一种单一的观点来理解

它。我们最多能够说的是,我从未见过这样的同性恋者,在他的身上,不具有我们上面所提到的“两性”人中所包含的因素。

过去的几年里,一些心理分析家指出,由于性亢奋和性满足被当作消除焦虑和解除心理紧张的方法,因此会加强性的需求。这种机械主义的解释可能是正确的。然而,我相信,还有些心理方面的过程,它使焦虑转化为增强的性欲需求,而且,我也相信,这些过程是可以认识的。这种信念是建立在心理分析观察的基础上的,而且建立在对这些病人的历史研究,以及对他们性欲领域之外的性格特征研究上的。

这种类型的病人在分析伊始可能会对心理分析家变得极为迷恋,并且迫切地需求心理分析家给予某些爱的回报。或者他们可能在分析期间保持相当冷淡的态度,把他们对性接近的需求转移到某些外在的作为替代的人身上,这种人,正如事实所证明的那样,与心理分析家在外表上有些相似,或者因为两人在梦境中是同一的。最后,这种与心理分析家建立性接触的个人需求可能会在分析期间毫无例外地出现在梦中,或者出现在性亢奋中。病人对这些性欲的毫无疑义的信号感到非常惊异,因为他们既没有感到为心理分析家所吸引,而且无论如何也不爱心理分析家。事实上,心理分析家所产生的性吸引根本没有起到可见的作用,这些病人的性热情也不比他人的迫切或不可控制,他们的焦虑既不比别的病人大,也不比别的病人小。他们的特征乃是在内心不相信任何真诚的关爱。他们彻底地信奉,心理分析家对他们感兴趣只是出于其他的动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在心理分析家的内心是非常鄙视他们的,如果有可能的话,心理分析家会伤害他们,而不会保护他们。

由于神经症患者对轻视具有过敏的反应,所以在每次的心理分析过程中都会出现恼怒和怀疑。但是,在那些特别强烈的性需求病人中,这些反应形成了一种永久的和固执的态度。他们使得心理分析看起来在分析者与病人之间有一堵看不见、透不过的墙,如果面对的是他们自己的一个困难的问题,他们的第一冲动就是想放弃、中断心理分析。他们呈现给分析者的印象乃与他们在一生中所曾表现过的完全一样。其不同只是在心理分析之前,他们能够避免去了解自己的人际关系在实际上是如何脆弱和错综复杂,而他们易于满足性欲这一事实,更易于混淆情景,导致他们相信他们易于建立性接触意味着他们普遍具有良好的人际关系。

我上文所提到的这些态度是有规则地在一起被发现,所以无论是什么时候,一个病人开始他的心理分析都会表现出与心理分析家之间的性欲望、性幻想和性梦境,此时,我就预备在他的人际关系中寻找其特殊的深层次的困扰。按照对这一点的所有观察,心理分析家的性别相对说来并不怎么重要。一位曾同一位男心理分析家和一位女心理分析家有过成功合作的病人,对两者都有相同的反应。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把表面现象当作在梦中或其他的情景中所表现出来的同性恋愿望,那我们就犯了极大的错误。

所以,一般说来,正如“所有发亮的东西并不都是黄金”一样,“所有看起来像性欲的东西并不都是性欲”。大部分表现为性欲的东西在现实中与性欲的关系不大,而是对安全欲望的表达。如果不考虑这一点,就会过分估计性欲的作用。

那些由于没有认识到焦虑的强度,而加强性需求的人,总是天真地将其性欲需求的强度归之于其内在的秉性,或者归之于他没

有传统的禁忌。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也与那些过分估计睡眠的需要、想象他们的心理结构需要十个小时或更多而事实上他们对睡眠的过分需求完全可能是由于各种情感的压抑决定的那些人一样犯了同样的错误。那些强迫性的饮食也是同样的道理。饮食、睡眠、性欲,所有这些重要的需求。它们的强度之不同不仅与人的生理构造有关,而且与其他的许多条件有关,诸如气候、其他心理是否满足、外在的刺激是否存在、工作紧张的程度、现存的生理状况等等。但是,所有这些需求可能被那些无意识的因素加强。

性欲与关爱需求之间的关系很好地说明了性禁忌的问题。性禁忌如何能够很好地忍受,这与文化和个人之不同而大相迥异。在个人方面,它可能是由于不同的心理和生理因素。然而,我们易于理解,那些需要性欲来作为平息焦虑的方法的人尤其不能够忍受任何性禁忌,即便是短时间的性禁忌。

这些考虑使我们要对性欲在我们的文化中所扮演的作用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反思。我们倾向于带着某种骄傲和满足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自由的性态度。的确,自维多利亚时代以来,我们的性态度变得越来越开明。我们的性关系有了更大的自由度,我们有更大的能力来寻求性满足。这后一点对于女性来说尤为如此:性冷漠不再被认为是女性的正常状况,而普遍地被认为是一种缺憾。然而,尽管情况发生了变化,人们态度之开明还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大,因为,今天大多数的性生活都是心理紧张的发泄,而不是真正的性驱动,因此,它更多地是一种镇静剂而不是真正的性快乐和性幸福。

这种文化境况也反映在心理分析思想中。弗洛伊德的一个巨大贡献就是,他给予性欲以应有的重要性。然而,详细说来,很多

现象被作为性的东西而接受下来,而事实它们是病态状况的表现。主要地说来,是对关爱的病态需求的表达。例如,对心理分析家的性欲望,通常被解释为对父母的性固定的重复,然而,它们往往根本不是真正的性欲望,而是为了平息焦虑而进行的某种安全性的接触。病人常常把自由联想或梦境与下述意象相联结,诸如:希望躺在母亲的怀抱,或者返回到子宫中,这些希望表示了对父亲或母亲的“移情作用”。然而,我们决不要忘记,这种明显的移情作用只是表示关爱和庇护欲望的一种形式。

即使对心理分析家的欲望被理解为对父母的同样欲望的直接重复,这也没有证据表明,婴儿期对父母的眷恋本身就是一种真正的性欲的眷恋。大量的证据表明,在成年人中,神经症具有爱欲和妒嫉的特征,弗洛伊德将这种特征描述为俄狄浦斯情结,这些特征可能存在于儿童期,但是其频率没有弗洛伊德所设想的那样高,正如我已经提到过的那样,我相信,俄狄浦斯情结并不是一种主要的过程,而是许多不同过程的结果。它可能是一种不太复杂的儿童反应,是由于父母给予的与性欲相关的抚爱而激发的,是由于儿童目睹了性爱的场面而激发的,是由于双亲中的一方将孩子当作奉献的目的而引起的。另一方面,它可能是一种非常复杂的过程的结果。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在这些家庭环境中提供了俄狄浦斯情结生长的肥沃土壤,儿童通常产生恐惧和敌视的情绪,他们的压抑导致了他们发展成为焦虑。在我看来,情况看起来很可能是这样的:在这些例子中,俄狄浦斯情结是由于儿童为寻求安全感而依附父母中的一方而产生的。事实上,正如弗洛伊德所描述的那样,一个完全成型的俄狄浦斯情结表明了所有的倾向,诸如对无条件之爱的过分需求、妒嫉、占有欲、因拒绝而仇视——这些都是病

态需求关爱的特征。在这些例子中,俄狄浦斯情结不是神经症的根源,但是,它本身是一种神经症的形式。

## 第十章 对权力、声望 及财富的追求

对关爱的追求,在我们的文化中,是获得安全感以抗拒焦虑所时常运用的一种方法。对权力、声望及财富的追求是人们时常运用的另外一些方法。

可能应该解释一下我为什么要把权力、声望和财富作为一个单一问题的方方面面来加以讨论。具体说来,神经症患者的主要倾向是追求这些目标的一个或另一个与否,这一点对人格而言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神经症患者追求安全感时,哪一个目标是主要的目标,不仅因个人的天赋和心理结构之不同而不同,而且因外部环境的不同而大异其趣。如果我将它们作为一个统一的问题来处理,那只是因为它们都具有某些共同的特性,这些特性不同于对关爱的需求。赢得关爱意味着通过加强与他人的接触而获得安全感,而追求权力、声望和财富则意味着通过疏离与他人的接触,加强自身的地位来获得安全感。

诚然,寻求主宰,赢得声望,获得财富其本身并不是病态的倾向,正如寻求关爱本身不是病态的一样。为了理解在这些方面病态追求的特征,应该将它们与正常的追求相比较。例如,对权力的感受。在正常人那里可能是出于自己的较强的力量。无论是一种生理的力量还是一种心理的力量,或成熟与智慧的力量。或者,他追求权力与某种特殊的原因有关:家庭、政治或专业集团、祖国、一

种宗教或科学的理念。然而,病态地追求权力则是出于焦虑、仇视和自卑感。从范畴上来描述,正常人追求权力是出于力量,病态地追求权力则是由于软弱。

这里也涉及到文化的因素。个人的权力、声望和财富在每种文化中都不起作用。例如,在伯布罗印第安人那里,追求声望是绝不能鼓励的,而在个人的财富方面,也仅有微小的差别。所以这种追求也不重要。在这种文化中,要追求任何统治支配作为获得安全感的方法是没有意义的。我们文化中的那些神经症患者选择这种方法是由于这样的事实:在我们的社会结构中,权力、声望和财富能够给人更大的安全感。

在探究产生追求这些目的的环境时,下面这一事实变得非常明显:这种追求,通常只有当它证明不可能通过关爱来找到潜存在焦虑底下的安全感时才能形成。我将举一个例子来表明,这种追求如何能够形成,当关爱需求受到阻扰时,它会以野心的形式表现出来。

一个女孩很强烈地依附比她大4岁的哥哥。他们曾沉溺于或多或少地具有性爱特征的爱抚中,但是当这女孩8岁时,她的哥哥突然拒绝了她,指出他们现在已经长大了,不能再玩这类的游戏。在这次的经验之后,不久,这个女孩在学校里突然发展起强烈的野心。当然这是由于她寻求关爱的失败所引起的,而且,当这个女孩没有很多的人可以依附时,这种失败就变得更为痛苦。他们的父亲对子女漠不关心,他们的母亲毫无疑问更喜欢男孩。然而,这不仅使她感到失望,而且是对她的自尊心的一种沉重的打击。她没有认识到,她哥哥态度的转变乃是由于他已经接近青春期了。所以,她感到羞辱,由于她的自信心一向就建立在不安全的基础上,

所以,她的感受就愈为强烈。首先,她的母亲不要她,因为她的母亲是个漂亮的女人受到每个人的赞赏,所以她就感到自己无足轻重;此外,她的哥哥不仅得到了母亲的偏爱,而且也具有她一样的自信。她双亲的婚姻不幸福,她的母亲与她的哥哥讨论他们的一切困扰,所以,这个女孩感到完全地被抛弃了。她付出更大的努力来获得她所需求的关爱。她在经历了与她哥哥的那段痛苦的经历后不久,立即爱上了在一次旅游中遇到的一个男孩,她为此感到十分兴奋,并开始将这个男孩想得天花乱坠。当那男孩离开她以后,她因压抑表现为一种新的失望。

这样的一种情景经常发生,父母和家庭医生将她的情景归咎于她在学校太过优秀。他们将她从学校接回来,并送到避暑胜地度假,然后让她留了一级。此时,她9岁,她的野心表现得更为强烈。在班级上,她非要拿第一名不可。与此同时,她与以前能非常友好相处的那些女孩之间的人际关系变得极为冷淡。

这一例子说明了产生一种神经症野心的那些混合因素:开始时,由于她感到不被别人需求而感到没有安全感,由此她产生了相当大的敌视心理,这种敌视心理她又不能表达出来,因为她的母亲,家庭中的主要人物,需要盲目的赞美;这种被压抑的仇视产生了大量的焦虑;她的自尊心没有机会得到发展,在很多场合,她感到受到了侮辱,而且她因与哥哥的经历而感到羞耻;试图追求关爱以获得安全感的努力也宣告失败。

病态地追求权力、声望和财富不仅是用来作为反对焦虑的保护所,而且用来作为被压抑的敌视得以发泄的渠道。首先,我想讨论每个追求是如何提供反对焦虑的特殊保护所的,然后再讨论解除敌视的特殊方式。

首先,追求权力被用来作为防止无助的保护机制,这一点,正如我们在上文中看到的那样,是焦虑的基本特征之一。神经症患者会为任何无助或软弱的现象感到痛苦,所以他逃避任何正常人完全能够接受的情景,诸如接受指导、劝告或帮助、对他人或环境的依赖、忍让或赞同他人等等。这种对无助的抗议并不会立刻就强烈地产生,而是逐渐产生的;在实际生活中,神经症患者对禁忌的阻力感受越大,他就越不能进行自我判断。在实际生活中他感到越软弱,他就感到越焦虑,不得不逃避一切外表上看来与软弱有某些相似的东西。

其次,对权力的病态追求可以用作防止危险感或被轻视感的庇护所。神经症患者对力量有一种固定的、非理性的理想,这一理想使他相信,他应当能够把握任何环境,不论环境如何艰难,他都应该立即把握它。这种理想与骄傲联系在一起,结果,神经症患者不仅认为软弱是一种危险,而且是一种不光彩的事情。他将人分为“强健的”和“软弱的”两种类型,赞赏前者而鄙视后者。他对软弱的观念也往往十分极端。他对那些同意他或者服从他的愿望的人,对那些充满禁忌不能控制自己情绪以致总是愁眉苦脸的人或多或少都有些轻视,他自己若有同样的特性,他也感到同样地鄙视。如果他不得不认识到他本身具有焦虑和禁忌的心理,他就感到极为耻辱,他会鄙视自己有神经症,并焦虑不安地将这一事实隐藏起来。他也鄙视他自己不能单独地处理它。

对于这些人来说,缺乏权力是最可怕的或者说是最应受到鄙视的,追求权力的特殊形式因人们对可怕的程度不同而有所不同。我将提到一些这种特别常见的追求表现。

这种追求的表现之一就是,神经症患者渴望控制自己的同时

控制他人。他不想那些不是由他所创造或得到他支持的任何事物发生。这种对控制的追求可能会采取情有可原的形式,有意识也允许他人有充分的自由,但是他坚持要知道他人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如果他人对他保守秘密,他就感到恼怒。这种控制的倾向可能会被压抑下来,其压抑的程度可能会如此之深,以至于不仅他自己,而且与他有关的那些人都可能深信他是宽宏大量给予他人以最大的自由。如果一个人将他的控制欲压抑得太过彻底,那么,每当他人与其朋友有约会,或者没有预料地返回家时,他就会变得非常消沉,或者头痛,或者胃部不适。由于他不知道这种困扰的原因,他可能会将这些不适归咎于天气状况、错误地节食或与此无关的一些情景。作为这种奇怪的情况出现的大部分病况是由控制处境的隐秘愿望决定的。

这种类型的人在任何时候都易于要求正确无误,一旦出错,他就感到极为恼怒,即便是在无关紧要的细节方面出现纰漏也是如此。他们比任何人都更熟悉每一件事情,这种态度有时会显得令人尴尬而引人注目。有些严肃而可靠的人,当他面对一个他们无法回答的问题时,可能会不懂装懂,或者编造答案,即便没有人会注意他在这一特殊情况下的无知。有时候,这种强调需要事先知道将要发生的一切,能预期并预言每一种可能性。这种态度使他对那些涉及到无法控制的因素的情景不感兴趣。不能有任何危险性发生。这种对自我控制的强调表现为对任何事情都无动于衷的态度上。如果一个女性神经症患者感到一个男人具有吸引力,如果这个男人坠入了她的爱河,那么,这个女性神经症患者就会突然改变态度轻视他。这类神经症患者发现,在自由联想时,他们无法使自己畅快自在,因为这样就意味着他们失去了控制,使得他们自

已进入一种不可预知的领域。

在他们追求权力时,还有另外一种态度可以表明这种神经症患者的特征,这就是,他们渴望我行我素。如果他人没有做他期望他人所做的那些事情,或者不按他预定的时间来完成,他一定会经常不断地恼怒异常。这种没有耐心的态度与追求权力这一方面具有紧密的联系。任何延迟、任何被迫的等候,即使是等候交通红绿灯,都会使他恼怒异常。通常,神经症患者本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或者至少没有意识到它的程度。事实上,他也不乐意认识到这一点,也不想改变它,因为恼怒具有重要的防护功能。他也不希望他人认识它。因为,如果他人认识到了这一点,就会有丧失他人关爱的危险。

对于恋爱关系来说,这种缺乏意识具有重要的内涵。如果情人或丈夫不按照她的预期来生活,如果他迟到了而又不打电话,自动出城了,那么病态的女人就会感到他不爱她。她不认为这是他的感受,是她对别人不屈从她的愿望而表现的纯粹恼怒的反应,这一点,她常常也不说出来,相反,她将这一情景解释为她不受欢迎的证明。这种谬误在我们的文化中确实是常见的事,我们的文化中的这种谬误是不受欢迎感的主要来源,这种不受欢迎感常常是神经症的一种关键因素。一般说来,这种谬误是从父母那里学来的。一位专断的母亲对子女的不顺从感到非常愤恨,她坚信并声称子女不爱她。在这种基础上常常产生奇怪的矛盾,而使任何关爱的关系遭受严重的挫折。病态的女孩不喜欢“软弱”的男人,因为她鄙视任何软弱;但是她们又不能跟“强壮的”男人打交道,因为她们希望她的伴侣总是向她屈服。因此,她们内心寻求的是英雄,是极为强壮的男人,同时他们又极为软弱,能够毫不犹豫地向她们

的愿望屈服。

追求权力的另一种态度乃是绝不屈服。赞同他人的意见或者接受一个建议,即使是他们认为正确的建议,他们都感到是一种示弱,他要如此做的念头都会激发他反叛。那些认为这一种态度非常重要的人,会倾向于畏缩或向后退隐,因为害怕屈从,因而强迫性地采取相反的立场。这种态度的一般表现乃是,神经症患者内心坚持认为,这个世界本身会适应他,而不是他本人去适应这个世界。心理分析治疗的基本困难之一就是来源于此。对于病人的分析而言,最后的目的是为了获得病人的病史或对病症进行洞察,而是要用这种洞察来改变病人的态度,尽管病人认识到这一改变对他自己有益,但是这类病人害怕这一改变的前景,因为这就意味着他最终屈服了。这种不能也包含爱情关系的方面。爱情,不管它还有多少含义,最终都是屈服,既屈服于她自己的情感,又屈服于她的爱人。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她越是不能屈服,她的爱情关系就越不能满意。这一因素可能是性冷淡的原因之一,因为性高潮的前提条件就是能够完全地屈服。

我们在上文已经看到的对权力的追求对爱情关系的影响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病态需求关爱的很多内涵。不考虑追求权力所起的作用,有关关爱追求的很多态度就不能得到完整的理解。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对权力的追求是逃避无助和无足轻重的避难所,这后一功能与声望的追求有关。

属于这一类的神经症患者形成了这样的一种强烈需求,那就是迫切地给他人以印象,以赢得称赞和尊重。他幻想给他人以美德或智慧或某些杰出的成就的印象;他极为奢侈地、引人注目地挥霍金钱;他将必须有能力谈论最新的书籍和戏剧,认识一些杰出的

人物；他将不会有任何人作为朋友、丈夫、妻子、雇员，如果这些人不称赞他的话。他的整个自尊都是建立在赞扬的基础之上的。如果得不到称赞，他就变得畏首畏尾。由于他过分地敏感，又由于他总是感到受到侮辱，因此生活是一种永恒的苦难。他常常意识不到受到了侮辱，因为，这种认识使他感到痛苦；但是，无论他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总是以愤怒来反应任何这样的感受，而且因其所感受的痛苦之程度不同而不同。因此，这样的一种态度导致他不断地产生新的焦虑和新的敌视。

为了描述起见，我们称这种人为自恋者。然而，如果动态地对这种人进行研究，这一名称就会引起误导。因此，尽管他总是沉溺于炫耀自我，他如此做的目的主要地并不是为了自爱，而是为了保护自己免受轻视和侮辱之感，或者用正面的话来说，是为了恢复崩溃了的自尊。

他与他人的关系越疏远，他对声望的追求越朝向内心；因此它看起来就需要在自我的眼中显得更为永无过错，永远优秀。每一种过失，无论是清楚地认识到还是隐隐地感觉到，都被认为是一种侮辱。

在我们的文化中，保护自己免受无助、轻视和侮辱也可以通过追求财富来达到目的，因为财富不仅给人以权力而且给人以声望。这种对财富的非理性的追求，在我们的文化中非常流行，因此只有将我们的文化与其他的文化加以比较，我们才能认识到它不是一般的人类本能，无论它是以一种贪得无厌的本能的形式表现出来，还是以一种生物驱力的升华形式表现出来。甚至在我们的文化中，一旦决定它的焦虑消失了或清除了，这种对财富的强迫性追求也会消失。

财富所要防护的特殊恐惧,乃是恐惧贫困、困苦、对他人的依赖。害怕贫困可能是一条鞭子,它驱动一个人去不断地工作,并且从不错过一次赚钱的机会。这种追求的防御性特征表现在他不能用钱来赢得自己的快乐。对财富的追求不一定只是指向金钱或者物质性的东西,也可能表现为对他人的占有态度以防护自己丧失关爱。这种占有性的现象人们比较熟悉,尤其是在婚姻中表现出来,法律提供了这种占有的合法性基础,而它的特征与我们在讨论追求权力时的特征所描述的一样,因此我们在此将不给出专门的例子。

正如我在上文中所说的那样,我所描述的三种驱力不仅用来作为反对焦虑、寻求安全的手段,而且用来作为缓解敌视的手段。根据驱力所占的地位,这种敌视以主宰的趋向、受侮辱的倾向或剥夺他人的倾向的形式表现出来。

对权力病态追求的主要特征并不一定就明显地表现为对他人的敌视。它也许以社会价值或人文主义的形式的伪装面目表现出来。例如,以给出建议的态度、喜欢打抱不平的态度、喜欢做出头鸟等方式表现出来。但是,如果敌视被掩盖在这种态度之下,其他的人——子女、婚姻伴侣、雇员——都会感到它,其反应要么是顺从,要么是反抗。神经症患者自己并没有意识到相关的敌视。即使当事情没有按照他的方式进行,使他恼怒异常时,他仍然坚信,从本质上讲,他是一个温和的人,他之所以恼怒,只是因为人们如此不可教,以致反对他。然而,事实上,所发生的事情是,神经症患者的敌视被压抑成文明的形式,当他不顺当时就会爆发出来。他偶然的恼怒,也许不会使他人感到是一种反对,人们只认为他是表达不同的意见或没有听从他的建议。然而,这些琐事也会产生很

大的怨怒,人们可以将统治的态度视为一种安全阀,通过这种安全阀,大量的敌视意识可以以一种不具破坏性的方式发泄出来。由于它本身是敌视的微弱表现,它提供了检查纯粹破坏性冲动的手段。

由反抗所引起的恼怒可以压抑下来,而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被压抑的敌视可以导致新的焦虑。这一点可以在压抑和疲劳中表现出来。由于引起这些反应的时机是如此的微不足道,以至于人们几乎对此不加注意,而且,由于神经症患者没有注意到他自己的反应,这种压抑和焦虑的状态看起来似乎没有任何外在的刺激。只有敏锐的观察才能逐渐揭示出刺激事件与随后的反应之间的联系。

由强迫性的统治所产生的更进一步特性,乃在于个人不能具有任何平等的关系。他必须独领风骚,否则就感到失败、不能独立和无助。他异常独裁,因此,任何他无法加以完全控制的事物,他都感到是失败。如果他的恼怒被压抑了,这种压抑就会产生沮丧,提不起精神,疲倦不堪。然而,他所感到无助的东西,可能是一种获得统治的奇妙的方法,或者是对不能独领风骚所表现出来的敌视。举一个例子,一位妇女与她的丈夫在异国的街道上散步。走到某一点的时候,她事先研究地图,并且在前面带路。但是,当她走到她没有事先在地图上研究的地方或街道时,她就自然而然地感到不安全。于是她只好让与她一起散步的丈夫做散步的向导。尽管在此以前她一直感到快乐和积极主动,此时她却突然感到精疲力竭,甚至不能再向前走一步。我们大家都知道婚姻伴侣、兄弟、朋友之间的关系,而神经症患者在这些关系中的行动就好像是个奴隶驱策人一样,他用自己的无助作为鞭子,强迫他人屈从自己

的意志,以便获得长久的关注和帮助。正是这些情境的特点,神经症患者不会去努力行事,而是不断地进行新的抱怨和新的需求,或者情况更坏,他不断地谴责他人忽视和滥用了自己。

在心理分析过程中也可以观察到同样的行为。这种病人竭力要求帮助,然而,他们不仅不听从任何建议,而且在没有得到帮助时大发脾气。如果他们接受了他人的帮助,而这种帮助必须了解他的某些特性,那么,他们立即就会退回到他们先前的烦恼之中,仿佛人们对他什么也没有做,他们会设法将心理分析学家努力得出的见解消除掉。然后,病人又强迫心理分析医生重新努力分析,而这种努力注定又得失败。

病人从这种情景可以得到双重的满足:通过表现自己的无助,他在迫使神经症患者屈从他的服务方面取得了短暂的胜利。与此同时,这种策略还在分析的过程中探出无助的情感,因而,由于他自己置身病中而不能在建设性方面表现自己的主宰,所以他发现他有能力来摧毁这种主宰。不用说,通过这种方法获得的满足感完全是无意识的,而他为了获得这种满足感所使用的技巧也是无意识地加以应用的。病人自己所能知道的只是他迫切需要帮助,而又得不到这种帮助。所以在病人的眼里看来,他的所作所为,他自己不仅感到是完全合情合理的,而且他感到,他有权利对心理分析学家生气。与此同时,他又忍不住记住这样的事实,他在玩一种暗中为害的游戏,因而自然而然地,他会担心被发现并受到报复。所以,在防卫的过程中,他感到有必要加强自己的地位,于是他开始颠倒是非。这并不是说他在暗中进行一种破坏性的进攻,而是说心理分析学家正在忽视、欺骗,并且滥用他。然而,只有在他真正感到自己受到了伤害时,这种地位才能以一种信念的方式加以

设定和维持。在这种情景中,他不仅对他没有受到粗暴的对待这一点的认识不感兴趣,相反,他对保护他自己的信念这一点有强烈的兴趣,他坚持认为,他常常成了他人的牺牲品,从而得出这样的印象,他想要人粗暴地对待他。在现实中,他也像我们一样一点不想要人虐待他,但是他的被虐信念获得了太过重要的功能,很难轻易地放弃。

在这种要主宰一切的态度中,包含了很多敌视心理,以致又产生了新的焦虑。这可能产生了很多禁忌作用,以致不能下命令,不能作决定,不能表达确切的意见,结果病人常常出现不适当的抱怨,这反过来又导致他把他的禁止作用错当成内心的温柔。

在那些把追求声望当作最重要的目的的人身上,其内心的敌视通常采取希望侮辱他人的形式。这一欲望在这些人身上占有永恒的地位。他自己的自尊心曾经受到过侮辱,因而一直具有报复心理。通常他们在儿童时代就经历过侮辱体验,这些经验可能与他们成长的社会环境有关,比如说,属于少数人的群体,或者个人贫穷、而有些富贵的亲戚;或者与他们个人的情景有关,比如说,因为其他的孩子而使自己没有享受到同等的爱,被他人唾弃,被父母当作玩物来对待,有时被宠坏了,有时又遭受羞辱嘲笑。这种经验由于过于痛苦,常常被忘掉了,但是如果有关侮辱的问题表现出来时,他们又会在意识中复现。然而,在成年的神经症患者中,能够观察到的不是这些儿童期的直接结果,而只是这些间接结果,这种结果由于转化成“恶性循环”而被加强成为一种被侮辱感;一种侮辱他人的欲望;由于担心报复,因此对侮辱极为敏感;对侮辱他人具有强烈的欲望。

通常这种侮辱的倾向被深深地压抑下来,因为神经症患者从他自己的敏感性中知道,当他受到侮辱时他是如何地痛苦和报复心切,所以,他本能地害怕在他人那里得到同样的反应。然而,这些倾向中的某些倾向可能会表现出来,而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漫不经心地忽视他人,诸如让他人等候;漫不经心地将他人置于尴尬的境地,让他人感到无依无助。即使神经症患者完全没有意识到侮辱他人的欲望,或者没有意识到他已经这样做了,他与他人的关系仍然会充满了混杂不清的焦虑,它以一种不断的预期斥责和侮辱自己的方式表现出来,我将在下文讨论失败的恐惧时回到这种恐惧态度上来。对侮辱的敏感导致了許多禁忌作用,这种禁忌常常以需求逃避可能侮辱他人的任何事物的形式表现出来;举例言之,这样的一种神经症患者,很可能没有批评他人的能力、拒绝他人提议的能力、开除一位雇员的能力,结果,他常常显得多虑或过分礼貌。

最后,侮辱的倾向可能隐藏在赞誉的倾向背后。由于引起侮辱和获得赞誉是完全对立的,因此,后者乃是根除或掩盖前者倾向的最好方法。这也是为什么这两种极端的倾向可以经常在同一个人身上发现的原因。这两种态度的分布方法有很多种,分布的原因因具体的人而各不相同。它们可能分别出现在生活的不同阶段,一般轻视的时期,继之是英雄崇拜的时期;他们很可能称赞男人而轻视女人,或者完全相反;或者有可能盲目地称赞一两个人而轻视世界上其他的人。在心理分析的过程中,人们可能观察到这样的两种态度在现实中共同存在:一位病人在同一时间里既盲目地赞誉心理医生又盲目地轻视心理医生,要么压抑其中的一种情感,或者在两者之间摇摆不定。

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敌视通常采用剥夺他人的形式表现出来。欺骗、偷盗、剥削或扰乱他人的欲望本身并不是病态的。它可能在文化上模式化了,或者是由现实的情景激发的,或者被正常地认为是一种占便宜的问题。然而,在神经症患者那里,这些倾向充满了情绪因素。即使他从他人那里获得的正面利益是微不足道的,或者是无关紧要的。如果他成功了,他也会感到兴奋异常或充满了胜利感,例如,为了讨价还价,他会花费与他所得到的东西完全不成比例的时间和精力。他对成功的满足有两个来源:其一,他感到自己比别人更聪明;其二,感到他已经伤害了他人。

剥削他人的倾向具有很多的形式。如果他没有得到不必要的治疗,或者少于他所能付的报酬,神经症患者就会对医生感到怨恨。如果他的雇员不愿意无偿地超时工作,他就会对他们生气。在与朋友和孩子的关系上,这种剥削的倾向常常借他们对他有义务的借口来使它成为合情合理的。父母可能会以此为基础要求子女作出牺牲,而在现实中摧毁子女的生活,即使这一倾向不是以摧毁的形式表现出来。任何依照自己的这种信念——孩子的存在就是要给她满足——而行动的母亲,都必然会在情感上剥削她的孩子。这种类型的神经症患者也会力图从他人那里剥夺事物,剥夺应付给他人的钱、应告诉他人的信息、他人所期待的性满足感等等。抢劫倾向的存在可以通过不断地做偷窃之梦的形式表现出来,或者他可能有有意识的偷窃冲动,但是他压抑了,而他也可能在某一时期是一个偷窃狂。

一般来说,这种类型的人常常意识不到他是在有目的地剥削他人。他要这样做的欲望与他的焦虑相关,只有有人期望他完成什么事时,这种焦虑才会产生禁忌作用,例如,他忘记了购买别人

希望他能购买的生日礼物,或者如果一个女人向他以身相许时,他变得性无能。然而,这种焦虑并不总是导致实际的禁忌,而是以潜在地害怕他在剥削或剥夺他人的形式表现出来。事实上他们有的确在剥削他人,尽管在意识上,他们会愤怒地否认这种意图。神经症患者甚至对他的行为具有这种恐惧感,虽然在实际上他的行为并不具有这些倾向,与此同时,他又意识不到,在其他的行为中,他的确在剥削或剥夺他人。

这些剥削他人的倾向伴有一种不痛快的妒嫉的情绪态度,假使别人占了一些我们希望自己也能占的便宜,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也会心中酸溜溜的。然而,一般的人心中所想的只是自己也能占些这样的便宜;对神经症患者而言,即使他不要这些东西,他的心中也会感到不痛快。这种类型的母亲常常对子女的快乐感到不痛快,因而告诫他们:“乐极生悲”。

神经症患者通过把妒嫉放在合情合理的基础上来掩饰自己妒嫉态度的丑恶面。别人的利益,不论是牵涉到一件玩具娃娃,一个女孩,一份轻闲或一份工作,都显得十分荣耀、值得爱慕,以致使他认为自己的妒嫉完全合情合理。这种合情合理可能只是借助于对事实的漫不经心的歪曲:过分低估自己的所有,而幻想他人的利益才是真正可爱的。这种自我欺骗是如此之深,以至于他坚信,他自己正处在可怜的状态中,因为他不能拥有别人所拥有的利益,别人超越了他,而他则完全忘记了:在其他的方面,他又不想与他人交换自己的利益。他为这一歪曲所付的代价是,不能够享受和品味他应得的幸福。然而,这种不能使他过分地害怕他人的妒嫉,他并不心甘情愿地使自己满足自己的所有,就像许多正常人那样,在很好的理由下保护自己,不使自己妒嫉,因此,他们错误地看待自己

的处境。他在这方面工作非常彻底,以致剥夺了自己的一切快乐。所以,他欺骗自己的目的:他要拥有一切事物。但是,由于他的破坏快乐的心境并导致焦虑,最终落得个两手空空。

很明显,这种剥夺和剥削的倾向,正如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其他所有焦虑的倾向一样,不仅来源于不成熟的人际关系,而且更进一步导致了人际关系的障碍。尤其是,如果这种倾向正如大部分的情况一样或多或少是潜意识的,那么,它必然会在自我意识中浮现,或者甚至在他人的面前感到怯懦。对于那些他并不期望从他那里得到什么的人,他的行动和感觉自由自在,自然大方,但是,一旦有可能从他人那里得到任何利益时,他的自我意识就又浮现出来。这些利益可能是能把握到的东西,诸如一种信息或一种劝告,它有可能是些不能把握的利益,诸如,仅仅只是些将来利益的可能性。在性欲和其他的关系方向都是如此。这种类型的神经症患者与他所不关心的男人既坦率,又自然,但是,对他所要喜欢的男人则既扭捏不安,又拘束不自在,因为,对她来说,得到他的关爱如同从他那里得到某种物质的东西。

这类人可能具有无与伦比的赚钱能力,因而,将他们的冲动引导到有益的渠道。更为常见的是,在赚钱方面,他们具有许多的禁止作用,所以,他们可能不好意思要报酬,或者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不要报酬,所以显得比他在实际生活中要慷慨大方得多。然后,他们很可能对他的不够的报酬感到不满意,但是常常又不知道不满意的原因。如果神经症患者的禁止作用变得非常之强大,充满整个的人格方面,那么,其结果是无法立定脚跟独立自处,而不得不依赖他人的支持。于是,他会过一种寄生虫式的生活,满足于他的剥削倾向。这种寄生虫式的态度不一定以“这个世界欠我一生”这

样一种粗略方式表现出来,而是以一种精细的方式表现出来,希望他人给自己一些好处,替他做先行官,给他的工作出主意,总而言之,希望他人对他的生活负责。一般说来,其结果是对人生的一种奇特的态度:他没有明确的概念这是他自己的生活,不明白对于他来说要从人生中得到些东西,要享受人生。但是,他所过的日子仿佛是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与他本人无关,善与恶来自外界,跟他没有一点关系,他有权利从他人那里得到好处,为一切坏事而责备他人,因为在这种环境下,通常坏事比好事多,因此对世界的日益增加的苦恼就变得不可避免了。这种寄生虫式的态度也能从对关爱的病态需求方面找到,特别是当对关爱的需求表现为对物质利益的需求时尤其如此。

神经症患者的剥夺或剥削倾向的另一个必然结果就是,他对被他人欺骗或剥削的焦虑。他可能生活在一种永无止境的担忧中,他担心有些人会利用他,从他那里偷走钱财或思想,对于他所遇到的每一个人,他的反应是,担心这个人会从他那里要走某些东西。如果他真的被欺骗过,例如,如果一位出租车司机没有走最近的路,或者如果一位侍者多收了他的钱,他所发泄的愤怒可能会大大超过应有的程度。这种以己之心度他人之腹的心理价值是非常明显的。不正视自己的问题,而直接地去声讨他人,这就是他的最大快乐。更有甚者,歇斯底里的人常常会把责任当作怯懦的工具,或者迫使他人感到罪大恶极,因而使他自己受到利用。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在小说中的主人公多斯华滋夫人(Mrs. Dodsworth)身上,精彩地描述了这种策略。

对权力、声望和财富的病态追求的主要目的和功能可以大致地图示如下:

| 目的      | 防止      | 敌视出现的形式 |
|---------|---------|---------|
| 权力····· | 无助····· | 支配倾向    |
| 声望····· | 侮辱····· | 侮辱倾向    |
| 财富····· | 贫困····· | 剥削倾向    |

这是阿德勒的主要功劳,他看到并强调了这些追求的重要性,以及它们在神经症患者的表现及伪装中所起的作用。然而,阿德勒假设这些追求乃是人性的最主要的倾向,其本身无需任何解释;<sup>①</sup> 他将神经症患者的这些强力作用归结为自卑感和生理上的不适。

弗洛伊德也看到了这些追求的许多意蕴,但是他并不认为他们是同一类的。他认为,对声望的追求是自恋倾向的表现。起初,他将对权力、财富以及与之相关的敌视心理归结为“肛门——虐待阶段”的衍生物。后来,他认识到这种敌视不能归结为性欲基础,而主张它们是“死亡本能”的表现,因而仍然坚信他的生物学上的取向,阿德勒和弗洛伊德都没有认识到焦虑产生这些追求的作用,也没有看到它们所表现的文化意蕴。

---

<sup>①</sup> 在尼采的《趋于强力的意志》(*Der Wille zur Macht*)一书中,对强力的需求作了同样一边倒的评价。

## 第十一章 病态的竞争

在不同的文化中,获取权力、声望和财富的方式也各不相同。它们可能是由继承权而得到的,或者来自他个人所拥有的他的文化团体的某种特质,诸如勇气、智慧、能治疗疾病的能力,或者能与超自然的力量交往的能力、精神上的不稳定性,等等。他们也可以通过异常的或者成功的行动来获得,根据目前所占有的特性来达到,或者通过优越有利的环境来得到。在我们的文化中,地位与财富的继承的确起了重大的作用。然而,如果权力、声望和财富要通过个人的努力来获得的话,他就得被迫进入与他人进行竞争性的斗争。从其经济核心里,竞争放射到所有的活动,并渗透到爱情、社会关系和游戏之中。所以,竞争对于我们文化中的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问题。因此,发现它在病态的冲突中占有永恒的中心位置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在我们的文化中,病态竞争与正常竞争具有三个方面的不同。首先,神经症患者不断地将他自己与其他的人进行对比衡量,即使是在根本无须如此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尽管在所有的竞争性情景中,超越他人是最根本性的东西,但是,神经症患者却把自己与那些根本不会成为潜在的竞争对手的人和那些根本不打算与他并驾齐驱的人进行对比衡量。他总是不加区别地将那些谁最聪明、谁更具吸引力、谁更受大众的欢迎这样的问题应用到每一个人的身

---

上。他对人生的感受可以拿赛马中的骑师来比较,对于这些人来说,只有一件事情,这就是,他是否能跑在别人的前头。这种态度必然导致对任何因素的真正兴趣的丧失或损害。真正重要的并不是他正在做的事情的内容,而是由此行为所能获得成功给人留下的印象、声望等有多少的问题。神经症患者可能会意识到这种与他人对比衡量的态度,或者,他可能自动地这样做了,而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这样做。他很少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对于他所起的作用。

正常的竞争与病态的竞争的第二个不同之处在于:神经症患者的野心不只是一定要取得比别人更大的成就,或者获得比他人更大的成功,而是要独领风骚或者鹤立鸡群。他可能会认为,在比较上,他的目标总是超人一等的。他可能完全意识到他正在受无尽的野心的驱使。然而,更为常见的是,他要么完全压抑他的野心,要么部分地掩饰他的野心。举例言之,在后一种情况下,他可能会相信,他不在乎成功与否,而只是在乎他所为之奋斗的事业;或者他可能相信,他不要成为舞台上的主角,而只是想跑龙套;或者他可能会承认他曾经有过野心,在他的生命的某个阶段——在孩提时代他曾幻想成为耶稣基督,或者拿破仑第二,或者从战争中拯救世界,作为一个姑娘,她想嫁给威尔士王子——但是,他会宣称,从那时起,他的野心就完全平息下来了。他甚至可能会抱怨,他的野心消逝得太多,因此应该再恢复他过去的一些野心。如果他已经完全压抑了他的野心,他可能相信,野心从来就与他无缘。只有当这少许的局面被心理分析医生剥落开来的时候,他才会同意自己以前有过夸大性质的幻想,或者在思想中曾飞掠过独领风骚、聪明绝顶或魅力无穷的念头,或者以前感到十分震惊,当有他

在场时,居然有任何女人会爱上别的男人,而不爱他,甚至在回忆时怨恨他。然而,在大多数的情况下,由于忽视了野心在他的反应中所起的强大的作用,他不会将任何特别重要的意义归咎于这些念头。

这样的野心有时会集中在一个特殊的目标:聪明,或吸引人,或者取得某种成就,或者道德高尚。然而,有时候,野心也不集中在一个确定的目标上,而分布在该人的所有行为中。他不得不在他所接触到的所有领域中都是顶尖高手。他可能同时既要成为一个伟大的发明家,又要成为一个杰出的医生,一个无与伦比的音乐家。一个女人可能会既要在她工作的领域出类拔萃,又要是一个贤妻良母,一个衣着人时的妇人。这种类型的青少年可能会发现自己不能选择或从事任何一种职业,因为选择一个意味着放弃另一个,或者至少要放弃自己的部分兴趣和活动。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要同时精通建筑学、外科医术和小提琴,这的确是困难重重。这样的青少年可能会带着过分的期望和幻想来开始他的工作;像伦布朗那样绘画,像莎士比亚那样写戏剧,开始在实验室工作时,就能马上算出血球的正确数字来。由于他过分的野心导致他过度的期望,因此难以达到他的目的,因而易于泄气、失望,并且很快放弃他的努力,并开始别的事情。很多很有天分的人在整個一生中就这样分散了他的精力。他们的确具有在很多不同领域取得成就的某些潜能,但是由于对各种领域具有兴趣和野心,他们最终不能坚持某一目标;最终他们一事无成,让大好的天赋付诸东流。

无论他是否意识到这种野心,他们对任何挫折总是十分敏感。即使是一份成功,他也感到是一份失望,因为没有达到他所期望的高度。例如,一些科学性论文或书籍的成功仍然是一次失望,因为

他并没有一鸣惊人,而只是产生有限的兴趣。这一类型的人在完成一项艰难的实验之后,也不会满意他的成功,他会说,他人也会通过这样的实验。这种坚持失望的倾向,乃是为什么这样的人不能享受成功的原因之一。其他的原因我们将在后文讨论,自然,他们对任何批评都极为敏感。许多人一生只出第一本书和第一张图片,因为即使受到温和的批评,他也感到极为沮丧。许多潜在的神经症患者,往往在受到更优秀的人批评后,或者遭到失败时,病症就显现出来。虽然这种批评或失败本身并不严重,或根本与其产生的心理困扰不成比例。

正常的竞争不同于病态的竞争的第三个不同之处在于,在神经症患者的野心中含有敌视,他的态度是:“我是最漂亮的、最能干的、最成功的。”敌视内在于每一种强烈的竞争之中,因为一个竞争者的胜利就是另一个竞争者的失败。事实上,在个体主义的文化中具有许多的破坏性的竞争,以至于作为一种独立的因素,人们不太愿意称之为病态的特征。它几乎是一种文化的模式。然而,在病态的人那里,这种破坏的方面多于建设的方面:对于他来说,更为重要的是看到他人的失败而不是看到自己的成功。更确切地说,具有病态野心的人的行动仿佛是这样的,对于他来说,更为重要的是打败他人,而不是自己的成功。在现实中,他自己的成功对于他来说是最重要的。但是由于他对成功具有强烈的禁忌——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看到——对他惟一开放的路径乃是,或者至少感到是超越他人:拉下他人,把别人拉到自己同等的位置;或者比自己更低下。

在我们文化的竞争性斗争中,试图伤害竞争者以加强自己的地位或荣光或压制潜在的对手,常常被认为是可取的手段。然而,

神经症患者却受一种盲目的、不分青红皂白的、强迫性的冲动所驱使而伤害他人。即使他认识到他人对他没有任何实际的危害,或者即使他们的失败与他自己的利益没有根本性的冲突,但是他却仍然要这么做,他的情感可以描述为一种能用语言表达清楚的信念:“只有一个人才能成功。”这是表达“只有我才会成功”这一观念的另外一种方式。在他这一破坏性的冲动之后,可能是大量的情绪紧张。例如,一个人正在写剧本,当他看到他的一位朋友也在写剧本时,他可能陷入盲目的愤怒之中。

这种打败或挫败他人努力的冲动在很多关系中都可以看到。一个具有极端野心的儿童,可能充满了击败他的父母以他的名义所作的一切努力的愿望。如果父母逼迫他走向行为良好和社会成功,他可能会发展为一种在社会上丢脸的行为。如果父母将他的努力集中在智力发展上,他就会对学习形成一些强烈的禁止作用,而使自己看起来像是一个白痴。我认识两位年轻的父母,他们带着孩子来看我,他们怀疑他们的孩子弱智,尽管后来这两个孩子被证明很有能力,极为聪明。他们受着击败父母这一欲望的驱使,对心理分析医生,他们表现出同样的行为。其中有一个孩子有时假装不理解我在说些什么,所以,在判断他们的智力时,我不敢确定,直到我认识到,她在用反抗父母和老师的同样的把戏来和我捉迷藏。这两个孩子都有极强烈的野心,但是刚开始治疗时,她们的野心完全掩盖在破坏性的冲动之后。

同样的态度可能会出现在课堂上或出现在任何治疗过程中。上课和治疗时,这种人的兴趣在于从他人那里获取利益。然而,对于这种类型的神经症患者来说,或者更确切地说,对于他内心的竞争心理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击败老师和医生的努力,阻碍他们可能

获得的成功。如果他能够以只是证明他自己根本不会取得任何的成功这一点来达到他自己的目的,那么他就会付出甚至是装病装傻这样的代价,以此向他人表明,他自己不好。无须奇怪,这种过程是无意识地起作用的。在他有意识的心中,这样的一个人可能会相信,事实上是老师和医生无能,或者对他来说不是适当的人选。

所以这样的一种病人极为担心,心理分析医生将会在他这里获得成功。他不遗余力地要击败心理分析医生的努力,尽管在这样做的时候会击败他自己的目的。他不仅误导医生或者不顾医生取得重要的信息,而且会停留在原来的病态状态,或者戏剧性地变得更坏,只要他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他不告诉心理分析医生他的病情已取得重大的改善,即使他告诉医生,他的病情取得了进步,那也是不情愿的,或者以抱怨的方式,或者他将他的改善或进步归因于对某种外在因素的洞察,诸如气候的改变,他服用了阿斯匹林,或者读了一些书。他不跟随心理分析医生的任何引导,因此试图证明心理分析医生是完全错误的。或者他将心理分析医生的建议当作他自己的发现,而这些建议是最初他曾粗暴地加以拒绝的。这后一种行为在日常的事务中我们也常常能够观察到,他构成了潜意识的剽窃行为的动力学,许多争取优先权的战争都有这样的一些心理学的基础。这样的病人不能忍受这样的想法:是别人,而不是他具有一种新思想。他会坚决贬低任何不是出于他自己的建议。例如,如果一场电影或一本书是出于一位与他同时进行竞争的人的推荐,他会讨厌或拒绝这场电影或这本书。

在心理分析的过程中,如果心理分析医生使他逐渐意识到他的所有这些反应,神经症患者可能会在一次良好的分析解释后大

发脾气,有一种砸毁医生办公桌上的东西的冲动,或者对心理医生进行侮辱性的评论,或者,在某些问题得到澄清以后,他会立即指出尚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即使他的病情大大地改善了,并且理智地认识到这一事实,他也会压抑他的感激之情。涉及不感激之现象的还有其他的诸多因素,诸如对欠人恩情的恐惧,但是,它里面的一个重要因素常常是,这会使神经症患者感到,必须给人回报,这对他而言乃是一种侮辱。

与击败他人的冲动相联系的是大量的焦虑,因为神经症患者不由自主地认为他人在被击败之后会像他一样感到伤痛并充满报复的心理。因此他对伤害他人感到焦虑,并将他的打败别人的倾向的程度保持在意识之外,坚信并坚持认为事实上他们是罪有应得的。

如果神经症患者具有强烈的贬低他人的态度,他就难以形成任何积极的意见,采取任何积极的立场,作出任何建设性的决定。一项关于某人或某事的积极的意见可能会被他的极为轻视的否定评价所打消:这种意见任何人都估计得出,因为要激起他的贬斥冲动是极容易的。

与对权力、声望和财富的病态追求相关的所有这些破坏性的冲动都进入了竞争性的斗争。在我们的文化中发生的一般性竞争性的斗争中,甚至正常的人也会显示出这些倾向,但是在神经症患者那里,这样一种冲动于他本身变得非常重要,他无视这些冲动会给他带来的任何不利和痛苦。对于他而言,侮辱、剥削或欺骗他人的能力是优越的胜利感,但是如果他失败了,他就成了一个失败者。如果神经症患者不能利用他人,他就表现得极为愤怒,这种愤怒就是由于失败感所引起的。

在任何社会里如果充满了这种个体竞争精神,它就必然会损害两性之间的关系,除非男人与女人的生活领域是完全隔离开的。然而,病态的竞争甚至比一般的病态行为产生更大的祸害。因为它具有破坏的特性。

在爱情关系中,击败、征服和侮辱伴侣的病态倾向起了巨大的作用。性关系变成了征服和贬低伴侣的方法,或者是被性伴侣征服和贬低的方法,这种特点与他们的性质大异其趣。弗洛伊德在男人的爱情关系中描述了一种分裂的情景,病态竞争者常常具有这样的情景:男人只会对比他的标准低的女性感到性欲的吸引力,而对他所深爱的和钦佩的女人既没有性的欲望,也没有性欲的能力,对这种人而言,性交与侮辱的倾向不可避免地混合在一起,所以他立即对他所爱的人或能爱的人压抑了性欲。这种态度常常可追溯到他的母亲那里,他感到被母亲侮辱,并且希望以侮辱她作为回报,但是由于恐惧,他将这种冲动隐藏在过分的奉献之后——这种奉献是这样的一种情景,人们常常称之为固定作用。在他往后的过程中,他发现可以将女人分为下述两种类型来解决这个问题,他对他所热爱的女人的敌视,以一种在实际生活中挫败她们的方式表现出来。

如果这种男人与一位地位与他平等,或地位比他高,或社交上比他更具吸引力的女人建立了爱情关系,那么,他在内心里就会常常为这个女人感到羞耻,而不是以她为荣。他可能会为这种反应感到极为迷惑不解,因为在他的意识思维里,女人不能通过与他发生性关系而丧失其价值。他所不知道的是,他通过性交贬低女人的冲动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在情感上,她使他不屑一顾。因此对她感到羞耻是合乎逻辑的反应。一个女人也会同样非理性地对她

的爱人感到可耻,并明目张胆地表现出来,不想与他见面,或者对他的良好品质视而不见,从来不欣赏他。心理分析揭示出,她也有同样的无意识的倾向要贬低她的伴侣。<sup>①</sup>通常,她对女人也有这样的倾向,但是,由于个人的原因,这些倾向更多地集中在与她有关系的男人的身上。这种个人的原因很可能有很多种:对受偏爱的兄弟的怨恨,对软弱的父亲的鄙视,相信自己没有魅力并预期男人会拒绝她。同时,她也会对女人抱有很大的恐惧而不想对她们表现出侮辱的倾向。

与男人一样,女人可能完全意识到一心一意地想征服和侮辱异性。女孩与男孩开始谈恋爱时,明确地带有要主宰男孩的动机。一旦男孩对关爱有所反应时,她就会吸引他并控制他。然而,通常,侮辱的欲望并没有受到充分的意识。在这种情况下,可能表现出很多间接的方式。例如,公开地强迫性地嘲笑男人对她的追求,或者采取冷漠的形式,通过这种形式,她向男人表明,他不能给她满足感,因此而成功地侮辱了他,如果他对被女人侮辱有一种病态的恐惧时则尤为如此。相反的情况——常常在同一个人身上可以看到——乃是感到通过性关系而被人利用、贬低和侮辱。在维多利亚时代,正是文化模式使女人感到性关系是一种侮辱,这种感觉在性关系合法的并固定不变的情况下才稍有减轻。在最近的30年,这种影响变得越来越弱,但是它仍然足够强大到解释这样的事

---

<sup>①</sup> 多里安·费根鲍姆(Dorian Feigenbaum)在一篇论文中已经记录了这样的一个病例,该文将发表在《心理分析季刊》(*Psychoanalytic Quarterly*)上,题目为“病态的羞耻”(“Morbid Shame”)。然而,他的解释与我的不同,在作总结时,他将羞耻归因为阳具妒嫉。大多数心理分析文献都将之称为女人的阉割倾向,并归因于阳具妒嫉,我认为,这是侮辱男人欲望的结果。

实：女人比男人更经常地感到性关系伤害了她们的自尊。这一感觉同样导致了性冷淡或远离男人，鄙视与男人接触的愿望。女人可能会通过性受虐狂的幻想或性变态来从这种变态中获得附属性的满足，但是由于她对侮辱的预期，所以对男人形成了极为敌视的态度。

一位对自己的男子汉气概深感不安的男人，很容易怀疑，他之所以被女人接受只是因为女人需要性满足，即使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她真的爱他！因为他感到被利用了，因此他形成了怨恨的态度。或者男人可能会感到没有从女人那里得到反应是一种难以忍受的侮辱。因而对她寻求满足更为焦虑担忧。在他自己的眼里，这种强烈的关心表现为一种对他人的体贴。然而，另一方面，他可能粗鲁而不体贴，所以表现为，他对女人性满足的关心只是保护他免受侮辱感的庇护所。

掩饰这种贬低或击败的欲望主要有两种方法：其一是用赞赏的态度来掩饰它们；其二是用怀疑主义的态度来对它们理智化。当然，怀疑主义可能是对现存的理智性的不同意见的真正表达。只有这种真正的怀疑可以明确地排除时，我们才能合情合理地去看一看其深藏的动机。这些动机可能贴近表面，因此只要简单地问一问其怀疑的合理性就可以使他焦虑。我的一个病人每次与我会面分析时，总是粗鲁地贬低我，尽管他没有意识到他正在这么做。后来当我仅仅问一问他是否在某些事情上真的相信他对我的怀疑时，他的反应进入了一种深深的焦虑。

当贬低或击败的动机被一种赞赏的态度掩饰时，心理分析的过程就更为复杂。那些在内心中想伤害和侮辱女人的男人可能在他有意识的思想中将女人捧得高高在上。那些在无意识中总是试

图击败和侮辱男人的女人,可能会对男人产生英雄崇拜。在神经症患者的这种英雄崇拜中,正如正常人的英雄崇拜一样,可能具有真正的价值感和伟大感,但是神经症患者态度的特殊之处乃在于这样的事实,它是两种倾向的妥协:对成功的盲目崇拜,而不管它的价值是什么,因为在这方面他自己的愿望正是要做英雄,以及伪装起对成功的人士的破坏性的欲望。

某些典型的婚姻冲突也要在这一基础上加以理解。在我们的文化中,这种冲突更为常见的是有关女人的,因为对于男人而言,有更多的外界因素刺激他成功,并且有更多的能力来达到成功。假设一位充满英雄崇拜类型的女人嫁给了一位男人,因为他现存的或潜在的成功吸引着她。因为在我们的文化中,妻子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丈夫的成功,这可以给予她某些满足,只要这成功能继续下去。但是,她又处在冲突的情景中:她因为丈夫的成功而爱丈夫,与此同时又因为丈夫的成功而恨丈夫;她想要摧毁丈夫的成功,但心理上又禁止这样做,因为另一方面,她想要参与成功来设身处地地享受它。这样的妻子可能会通过穷奢极欲威胁丈夫的财富安全,通过精疲力尽的争吵而摧毁丈夫的平静心境,通过暗中的贬低态度来压制丈夫的自信心,以此来摧毁丈夫的成功。或者她无休无止地逼迫丈夫去获得一个又一个的成功,而不顾丈夫自己的利益,以此来满足她破坏的欲望。遇到任何失败的苗头时,这种怨恨可能变得更为明显,尽管在成功的过程中,她在各个方面表现为是一个可爱的妻子,但是,现在她转而反对丈夫,而不是帮助丈夫和鼓励丈夫。因为,只要她能参与丈夫的成功她就会压抑自己的报复,而一旦丈夫有任何失败的迹象时,这种报复就会浮现出来。所有这些破坏活动都会在爱情和赞赏的面具下进行。

我可以举出另一个熟悉的例子来表明爱情是如何用来补偿源于野心的击败动机的。一位妇女总是充满自信,能力很强又事事成功。结婚以后,她不仅放弃了她自己的工作,而且形成了依赖的态度,并且看起来彻底地放弃了她的野心——确切地说,“变成了真正的女人”。她的丈夫十分失望,因为他原指望找到一个好的伴侣,可是现在找到的是不与他合作,而是一味把自己放得比他更低的妻子。一个女人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对自己的潜力具有一种病态性的担忧,她隐隐觉得,嫁给一位成功的男人或者至少是一位具有成功能力的男人,比起实现自己充满野心的目标来更为安全,甚至更为保险。如果只是如此,这情况尚不产生更进一步的困扰,而可能会产生令人满意的结果。但是,这位病态的妇女在内心里却反对放弃她自己的野心,对丈夫充满了敌视,并且按照病态的“不是全要就是全不要”的原则,陷入了虚无的感觉中,并最终变成了一位庸人。

正如我在上文所说的那样,这种类型的反应之所以常常出现在女人身上而不是在男人的身上,原因可以在我们的文化情景中找到,这就是,人们总是把成功说成是男人的领域。这种类型的反应,并不是女人所固有的特点,这一点可以从下面的事实得到证明。如果情况倒转过来,这就是说,如果女人碰巧比男人更为坚强,更为聪明,更为成功的话,男人也会有同样的反应。因为我们的文化相信,男人在一切方面都比女人优越——除了爱情以外,如果男人具有这种态度就不会通过赞赏来加以伪饰;他常常相当明确地表现出来,对女人的利益和工作直接加以妨害。

这种竞争精神不仅影响到男女之间的现存关系,而且甚至影响到伴侣的选择。在这个方面,我们在神经症患者身上所看到的

现象只是在一种竞争文化中正常人常常所表现的行为现象的放大,在正常人那里,对伴侣的选择常常受对声望和财富的追求所决定,这就是说,受性欲之外的因素所决定。在神经症患者那里,这种决定可能无所不在,一方面,因为他对控制、对声望、对支持的追求比起一般人而言,更具有强迫性,更加没有灵活性;另一方面,因为他与他人的个人关系,包括与异性的关系太过歪曲了,因而使他不能作适当的选择。

破坏性的竞争可能在两个方面进一步产生同性恋的倾向:首先它提供一种冲动,使他从异性那里抽身而退,避免与同性进行性欲的竞争;其次,它所引起的焦虑吁求安全感,正如我在上文中指出的那样,对安全性关爱的需求常常是纠缠同性伴侣的原因。如果病人和心理分析医生是同性的话,在心理分析的过程中,我们也常常观察得到破坏性竞争、焦虑和同性恋冲动之间的关系。这样的病人可能会经历这样的一个阶段,他夸大自己取得的成就而贬低心理分析医生。开始的时候,他以伪装的形式来进行这一点,而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做什么。后来,他认识到他自己的态度,不过他仍然不能从他的感觉中摆脱出来,而他也没有意识到这种情感是如何强有力地推动着他。再后来,当他逐渐开始感到他对心理分析医生的敌视所产生的影响,与此同时通过焦虑的梦、心悸、坐立不安等行为开始逐渐感到心烦意乱,他突然做了一个梦,他梦见心理医生拥抱他,并意识到自己的幻想,希望与心理医生建立某种紧密的关系,从而表现出平息焦虑的需求。在病人最终感到能够面对他的竞争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之前,这一连串的反复可能会重复数次。

所以,简而言之,赞赏或爱情可以通过下列方式来补偿他对击

败的追求：不去意识破坏性的冲动；通过在自己与竞争者之间创造一种不可逾越的鸿沟来彻底地消灭竞争性；设身处地地享受成功或者参与成功；讨好竞争对手以便打消竞争对手对自己的报复。

尽管关于病态的竞争对性关系的影响所作的这种评论还远不能穷尽一切，但是它们可以足够表明病态的竞争是如何导致对两性之间关系的损害的。这一点更为重要，因为在我们的文化中，决定两性良好关系可能性的竞争因素也是焦虑的来源，因此使关系和谐是最为重要的事。

## 第十二章 逃避竞争

由于其破坏性的特征,神经症患者的竞争性产生了强烈的焦虑,结果导致了一种对竞争的逃避。现在的问题是,这种焦虑是从何时产生的?

我们可以毫无困难地了解其中的一个来源是担心无休止地追求野心会遭到报复。踩着他人往上爬,当他人已经或将要获得成功时就侮辱他,打击他的那些人,必定具有这样的恐惧:他人一定具有与他一样强烈的击败他的野心。但是这种报复性的恐惧,尽管会在每一个以他人为代价获得成功的人身上蠢蠢欲动,却不是神经症患者增加焦虑、不去竞争的全部原因。

经验表明,单是禁忌性恐惧并不一定导致禁忌作用。相反,它可能只会导致冷酷地算计他人的想象的和真正的妒嫉,他人的竞争或缺点、或试图扩大他人的权力,以便保护自己免受失败。这样的一个人成功人士只有一个目的:追求权力和财富。如果将这种人格结构与明显地具有神经症的那些人的人格结构加以比较的话,就只有一种明显的不同,即无休止地追逐成功而不关心他人的关爱。他既不想从他人那里要什么,也不指望他人给他什么,既不助人也不宽容。他认为,单纯地依靠自己的力量和努力就能达到他所想要达到的目的。当然,他会利用人,他之所以关心他人的意见只是因为这些意见对于达到自己的目的是有用的。为关爱而关爱

对于他来说根本没有什么意义。他的欲望和他的保护措施沿着一条直线行进：权力、声望、财富。甚至由于内心的冲突而追求这种行为的人也不会形成通常的那些病态特征，如果他的内心不干扰他的追求的话。恐惧只能促使他加强努力去追求更多的成功和增加更多的不信任。

然而，病态的人追求两种不可比较的道路：积极地追求“舍我其谁”的主宰；与此同时过分的奢望每一个人的爱戴。处在野心和关爱之间的这些情景是神经症的中心冲突之一。为什么神经症患者会害怕他自己的野心和需求？为什么他甚至不想去认识它们？为什么他要对自己的野心和需求进行检讨或者从它们那里彻底地退缩回来？其主要的原因在于，他们害怕丧失关爱。换言之，神经症患者之所以检查他的竞争性不是因为他用特别严格的“超我需求”来阻止他的竞争性，而是因为他发现他自己处在两种平行的强迫性需求的两难困境之间，这两种平行的强迫性需求是他的野心与他对关爱的需求。

这种两难困境在实际生活中是无法解决的。一个人不能既骑在别人的头上同时又指望别人爱他。然而，在神经症患者那里，这种压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他想努力地去解决它。一般说来，他试图用两种方法来解决问题：其一是，使他对主宰的追求和对不能实现目标的悲哀变得合情合理；其二是检讨自己的野心。我们可以简单地讨论一下他力图使自己的进攻性需求合情合理的努力，因为他也具有我们上文已经讨论过的有关获得关爱并使其合理化的相联系的同样的特征。这里与上文所说的一样，这种合理化作为一种策略是极为重要的：他力图使这种需求变得无可争辩，使它们不至于阻碍他人热爱自己的道路。如果他贬低他人，以便他在—

种竞争性的战斗中侮辱他人,打击他人,他就会深深地相信,他完全是客观的。如果他要利用他人,他就会相信并力图使他人相信,他急切地需要他人的帮助。

正是这种对合理化的要求而不是别的东西使得一种精致的潜在的不诚实的因素充满了他的整个人格,即使这个人基本说来是诚实的。这一点也可以用来解释在神经症患者身上具有一种常见的性格倾向:无根据的自认公正合理。这种倾向有时非常明显,有时潜藏在谦恭顺从或甚至是自我反责的态度背后。这种自认公正合理的态度常常与一种自恋的态度混合在一起。事实上,它与任何种类的自恋没有关系;它甚至不包括任何自满或欺骗的因素,因为,与表面现象相反,他从来不是真的相信自己是公正正确的,而只是不断地在急切地需求表现合情合理。换言之,它是由于需要急切地解决某种问题而必然产生的一种防卫态度,而这些问题,总而言之,是由焦虑产生的。

对这种合理需求的观察可能是导致弗洛伊德提出特别严格的“超我”需求这一概念的因素之一,这种超我需求乃是神经症患者对他的破坏性批评之反应所产生的。这种合理性的需求还有另外的一个方面,这一方面对这一解释具有特别的建设性。除了不可避免地对付他人作为一种策略手段之外,合理性在很多神经症患者那里也是他们满足下述事情所需要的手段:即使自己看自己也表现得无可责备。在讨论到病态的负罪感的作用时,我再回过头来讨论这个问题。

涉及到病态竞争的焦虑的直接结果就是,既害怕失败又害怕成功。害怕失败是害怕受侮辱的部分表现。任何失败都会变成灾难。一位女孩子希望在学校学得一些知识,但是最终却一无所知,

此时她不仅感到极为羞耻,而且感到班上其他的女孩将会鄙视她并转而反对她。这种感觉给她造成了越来越大的心理压力,因为她常常将一些偶发的现象当作失败,事实上这些偶发的现象根本没有失败的含义,或者还只是露出一些失败的苗头——诸如在学校没有得到最高的分数,或者在考试的某些方面失败了,或者举办一次集会没有获得完满的成功,或者在交谈中没有显出自己的聪明才智,总而言之都是不如过分期望的那些事。任何冷落,正如我们在上文看到的那样,神经症患者都会报之以强烈的敌视。同样,对于这些冷落,神经症患者感到是一种失败,并因此作为一种侮辱。

神经症患者的恐惧可能会因为他了解到他人知道他的过分野心而嘲笑其失败这一点而更为强烈。比失败本身更令他害怕的乃是在他以任何方式显示出他正在竞争,他要获的成功并努力想要去得到这份成功之后却失败了这样的一种情况。他感到,单纯的失败可以加以遗忘,甚至可以产生同情而不是敌视,但是一旦他对成功感兴趣时,那么他就会感到被一大群要迫害他的敌人所包围,这些敌人正等待在任何软弱或失败的迹象表现出来时打败他。

这种态度因恐惧的内容不同而不同。如果他的重点在于对失败本身的恐惧,他就会加倍地努力,甚或不顾一切地努力以避免失败。在测验他的力量和能力的紧要关头,诸如考试或在公众面前露面,这种微妙的焦虑就会浮现出来。然而,如果他强调的是担心他人认识到他的野心这一方面,那么所导致的结果就完全相反。他所感到的焦虑将会促使他看起来对任何事情不感兴趣,导致他不作任何的努力,这两种现象的对立是相当值得注意的,因为它表明这两种紧密相连的恐惧是如何产生两种完全不同的性格类型

的。属于第一类的人会废寝忘食地学习以备考试,第二类人则会很少去学习并且可能明显地沉溺于社会活动或自己的癖好之中,从而向世人表明,他对考试没有任何兴趣。

通常,神经症患者没有意识到他的焦虑,而只是意识到焦虑的结果。例如,他可能不能集中精力工作。或者他可能具有多疑性的恐惧,诸如害怕由于身体上的过分劳累而引起心脏病,或者由于心力交瘁而引起精神崩溃,或者在任何努力之后变得精疲力竭——当一种活动包含焦虑时,就可能产生精疲力竭之感——并且运用这种精疲力竭来证明,所有的努力都有害于健康,因而必须加以避免。

在他逃避任何努力时,神经症患者可能会在各种不同的娱乐活动中自寻失败,从玩单人游戏到集会,莫不如此,或者他采取一种看起来懒散或怠惰的态度。一个病态的女人可能衣着不整,宁愿给人不修边幅的印象,而不愿意精心地打扮,因为她感到精心打扮只会暴露她的可笑之处。一个女孩本来是相当漂亮的,但她却相信她只不过相貌平常,不敢在公共场合涂脂抹粉,因为她认为人们会这样想:“这个丑小鸭是多么的可笑啊,还想努力将自己打扮成白天鹅!”

所以,一般说来,神经症患者会认为比较安全的做法是不去做他想做的事情。他的格言是:呆在角落上表现得最平常,不要引人注目。正如韦布伦(Veblen)所强调的那样,引人注目——引人注目地闲散,引人注目的消费——在竞争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逃避竞争不得不强调它的对立面,即逃避引人注目。这意味着坚持习惯的标准,远离聚光灯,不要与众不同。

如果这种逃避倾向是一种主要的特征,那么它就不会进行任

何冒险。不用说,这种态度使生命变得乏味无趣,并且阻滞自己潜在能力的发挥。因为,除非环境非常有利,对幸福的追求,要取得任何成就,就必须冒险,必须努力奋斗。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讨论了神经症患者对可能失败的恐惧。然而,这种恐惧只是病态竞争的焦虑所表现出来的特征之一。焦虑还以恐惧成功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很多神经症患者那里,对他人敌视的焦虑是如此的巨大,以至于他们恐惧成功,即使他们感到一定能获得成功,也免不了这样的恐惧。

这种对成功的恐惧源自对他人妒嫉的恐惧,以及对丧失他人关爱的恐惧。有时候,这种恐惧是有意识的恐惧。我的病人中有一位具有天赋的作家,她彻底地放弃了她的写作,因为她的母亲开始写作,并且证明是成功的。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后,她又迟疑地、恐惧地开始写作,她不是害怕写得太糟,而是担心写得太多,这位妇女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根本不能做任何的事情,其主要的原因是,她过分地担心他人会妒嫉她的每一件事情;因此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讨好他人这件事情上。这种恐惧也可能只表现为一种仅仅是模糊的恐惧:如果她获得了成功就会失去朋友。

然而,在这种恐惧中,正如在其他的许多恐惧中一样,神经症患者更经常感觉到的不是他的恐惧,而只是由此产生的禁忌。例如,当这个人打网球时,临近胜利之际,他就会感到某种东西在阻止他,使他不能获得胜利。或者,他可能会忘记赴一次决定其前途的约会。如果他对某次讨论或在一次谈话中有某种高见,他可能用一种很低的声音讲出来,或者以浓缩简单的方式表达出来,不能给他人以任何印象。或者他让他人将他完成的工作拿去邀功请赏。他可能观察到,与一些人在一起时他谈锋甚健,而与另一些人

在一起时,他又显得愚蠢无比。与一些人在一起时,他可以熟练地操作机械工具,而与另一些人在一起时,他看起来像一个初学者。尽管他对这种不一致的事态感到迷惑,他也不能改变它。只有当他洞察到他的逃避的倾向时,他才会发现,当他与一位不如他聪明的人交谈时,他强迫性地表现得好像自己比这人更不聪明;或者,当他与一位音乐家一起进行演奏时,他不得不演奏得更差,因为他担心他会伤害和侮辱他人。

最后,如果他取得了成功,他也不能享受它,而且不会感觉到这是他自己的经历。他会将其归因于某种偶然的环境,或者归因于某种无足轻重的刺激或来自外界的帮助。然而,在一次成功之后,他可能感到压抑,这一方面是由于这种恐惧,另一方面是由于由这一事实产生的他自己未曾觉察到的不满;实际的成功总是不如他内心中奢望的成功那样大。

所以,神经症患者的冲突情景源于一种事事争第一的热切而强迫的愿望,同时,一当他取得好的开头或取得任何的进步时,同样具有一种巨大的强迫性来阻扰他。如果他做成了某件事,下次他就不得不将这件事做坏。一堂好课之后是一堂坏课;在治疗中取得进步之后,马上又变得恶化起来;给人一次好印象之后紧接着是一次坏印象。这种连续性一再地重复,并且使他感到,他正在毫无希望地抗拒自己的奇怪的行为表现。他就像传说中的潘纳乐普一样,在晚上拆散自己在白天织好的东西。

因此禁忌作用在路上的每一步中都会起作用:神经症患者可能会如此彻底地压抑自己的具有野心的欲望,以至于甚至不能努力做完一件工作;他可能想做一些事情,但是他不能集中精力来完成它;他可以做好一件工作,但是一旦具有成功的迹象,他就畏缩

不前；最后，他可能取得巨大的成功，但是他不能欣赏它，甚至不能感受它。

逃避竞争的这诸多方式中，最重要的也许是神经症患者在自己的想象中创造了一段与他的真正的竞争者或假想的竞争者之间的距离，而使任何竞争变得荒谬，从而在意识中消除竞争。这种距离可以通过将他人放得高高在上而不可企及这种方式来达到，或者使自己处在所有人的底下，从而使任何的竞争思想或努力看起来都是不可能的、荒谬可笑的。后一过程就是下文将要讨论的“贬斥作用”。

贬斥自己可能是一种有意识的作用，仅仅是为了在实践中的一种权宜之计。假如一位伟大画家的门徒画了一幅好画，但由于害怕他的老师的妒嫉，他可能会贬低自己的工作，以便平息老师的妒嫉。然而神经症患者对于贬低他自己这一倾向只有模糊的概念。如果他做好了一件工作，他就会坚定地相信，他人一定会比自己做得更好，或者他的成功只是一种偶然，再也不能做得这样好。或者即便他能做得这样好，他也要找出一些瑕疵，诸如工作做得太慢，从而使用这种方法来贬斥自己的整个成就。一个科学家可能会感到没有注意到他自己领域的问题，以至于他的朋友不得不告诉他，他已经写过这方面的论文。当被问到愚蠢或一个不可回答的问题时，他易于形成感到自己愚不可及的反应；当他读到一本他隐隐约约感到不同意的书时，他就会倾向于不是以批评的方式来思考它，而是认为它是如此的愚蠢，以至于不能理解它。他可能怀有这样的信念，即设法保持一种批评和客观的态度来对待自己。

在他的表面价值中，这种人不仅具有自卑感，他还坚持他自己的正确性。尽管他对这种自卑感有所怨言，遭受着这种自卑感引

起的种种痛苦,但是他决不接受任何的证据来否认这些自卑感。如果人们认为他是一个十分能干的工人,他就会坚持认为他被人们过高地估计了或者他的虚张声势吓唬住了他人。我在前面提到的那位女孩,在她的哥哥面前受到侮辱之后,在学校里发展了极为强烈的野心,在她的班上总是拿第一,每个人都认为她是一个聪明的学生,但是在她自己的心中,她一直坚信她愚蠢无比。尽管在照镜子和在受到男人的注意时,足以使一个女人相信,她是具有吸引力的,但她可能还会固执地坚信,她对男人没有任何的吸引力。一个人可能会直到40岁时仍然相信,太过年轻,不能发表意见或做一个领头人,到40岁以后,他的情感又会转变为他太过年老,不能发表意见或做一个领头人。一位知名的学者受到他人的尊敬时总是感到奇怪,在他自己的情感里,他总是坚持认为,自己是个无足轻重的庸才。恭维被他鄙视为空洞的马屁,或者被他认为是动机不纯,甚至会引起他的恼怒。

这些观察——这种观察几乎可以无限制地进行——表明,自卑感——它可能是我们时代的最为常见的邪恶——具有一种重要的功能,而且由于这种原因,它受到了人们的坚持和辩护。透明度价值包含了这样的事实,通过在他人心目中贬低自己并因此把自己置于他人之下,阻碍自己的野心,来平息与竞争相关的焦虑。<sup>①</sup>

---

① 在《虹》一书中(第254页),D. H. 劳伦斯(D. H. Lawrence)令人惊奇地描述了这种反应。“这种残暴而丑恶的奇怪感总是催逼着她,想要攫取她,这种对暴民妒嫉力量的感觉在等候着她,谁是个例外的人(重点号是作者自己加的)形成了她生活的最深影响之一。不论她在哪里,在学校,在朋友之中,在街上,在火车上,她总是本能地贬低自己,使自己显得弱小,装得比她自己本来的情况要差得多,担心被她那对公众的仇恨,即普通的自我看到、扑向、攻击她那被隐藏的自我。”

顺便说一句,决不可忽视自卑感在实际生活中可能会削弱某人的地位,因为自我贬斥导致对自信心的损害。一定程度的自信心是取得任何成就的先决条件,不论它是按照标准菜谱制作沙拉、推销货物、为某一见解辩护、或者给一位有潜力的亲戚良好的印象。

一个具有强烈贬低自我倾向的人,可能会梦到他的对手的优秀,或者梦见自己处在不利的地位。因为不可怀疑,他潜意识地希望战胜他的对手,这样的一些梦可能看起来与弗洛伊德的论点相反,弗洛伊德认为,梦再现了愿望的实现。然而,我们不能过分拘泥地对待弗洛伊德的观点。如果直接的愿望的实现关涉到太多的焦虑,那么,平息这些焦虑比起直接实现其愿望来更为重要。所以,当一个担心自己野心的人梦见自己被打败了时,那么,他的梦并不是失望愿望的表现,而毋宁是用失败来减少罪感。我的一个病人计划在她治病期间作一次讲演,处心积虑地想打败我。她曾做过这样的梦:我正在作一次成功的讲演,而她则坐在听众席上,谦卑地仰慕我。此外,一位野心勃勃的老师梦见他的学生是自己的老师,而他则完全做不出指定的作业。

自我贬斥充当检查野心的作用。其检查之程度也可以由这样的事实来表明:被贬斥的能力通常是个人最迫切地渴望超越的能力。如果他的野心是智力方向的,智力就是他的工具,并因此受到贬斥。如果他的野心是性欲方面的,他的外表和魅力就是他的工具,并因此受到贬斥。这种关系非常常见,人们可以通过自我贬斥的焦点来猜测他的最大的野心是什么。

到目前为止,自卑感与任何实际的自卑没有任何的关系,而只是作为逃避竞争倾向的一种作用而加以讨论的。那么,它们真的与存在的缺点无关吗?真的与真正的瑕疵之认识无关吗?它们事

实上是真实的和想象的缺陷之共同结果：自卑感是激发贬斥倾向这一焦虑与对存在的缺点之认识二者的混合。正如我多次强调的那样，我们最终不能愚弄我们自己，尽管我可能成功地将某些冲动关在我们的意识之外。我们一直在讨论的性格神经症患者其内心深处认识到，他具有反社会的倾向，他必须加以掩饰。认识到他的态度缺乏真诚，认识到他的伪装不同于外表之下的潜流。他对这些矛盾心态的刻骨铭心是他的自卑感的重要原因，即使他从来没有认识到这些自卑感的重要来源，因为它们来自压抑的冲动。由于不能认识它们的来源，所以他自己为这些自卑感寻找理由，而这些理由不是真实的，而只是一种理性的。

为什么他的自卑感是存在的缺陷之直接表达，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在他的野心的基础上，他已经建立起了他自己的价值和重要性的理想的概念。他不由自主地将自己的真实成就与有天才或完人的概念相比较，在他的比较中，他的真实行为或他的真实能力出现了自卑。

这些逃避倾向的整个结果就是，神经症患者变成了真正的失败者，或者至少他无法达到根据他的机会和能力所应该达到的那种结果。与他一起开始的那些人走在了他的前面，有了较好的职业，更大的成功。这种滞后不仅指的是外在的成功。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越来越感到他的潜力与他的成就之间的差距。他敏锐地感到，他的天赋，不管这种天赋是什么，都被浪费掉了，他在人格的发展方面受到了阻碍，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并没有走向成熟。<sup>①</sup> 而

---

<sup>①</sup> C.G. 荣格(Jung)已经清楚地阐述了40岁左右的那些人的问题，他们的人格发展受到了阻碍。但是他没有认识到导致这些情景的条件，所以没有找到任何满意的解决方法。

对所认识到的差距,他的反应是模糊的不满,这种不满不是自虐狂,而是真实的,适当的。

正如我们已经指出来的那样,潜力与成就之间的差距可能是外在环境造成的,但是神经症患者发展的这些差距,具有决不言败的神经症特点,其根源在于内在的冲突。他在现实中的失败与由此产生的潜力与成就之间的差距不可避免地给他的现存的自卑感造成巨大的压力。所以,他不仅相信自己自卑,而且实际上比他可能的情况更加自卑,由于他把自卑感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所以这种自卑感的影响更大。

与此同时,我们已经提到的志大才疏之间那些差距也变得极为无法忍受,从内心中要求得到弥补,这种弥补是由幻想来提供的。神经症患者越来越以夸大的观念来替代可达到的目标。这些幻想给予他的价值是非常明显的;它们掩盖了他的一事无成的那种无法忍受的感觉;这些幻想让他不进入竞争,并因此不冒失败和成功的危险而使自己感到自己的重要性;它们允许他建立自大的妄想,这种自大的妄想远远超过任何可以实现的目标。正是这种自大妄想的牛角尖式的价值,使它们充满危险,对于神经症患者而言,因为钻牛角尖比起走大路来具有更为明确的便利条件。

这些病态的盲目自大观念应该与正常人的自大观念和精神分裂症的自大观念区分开来。即使是正常人有时也会认为自己非常之优秀,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非常之重要,沉溺于他的要想做的事情的幻想之中。但是这些幻想和观念是些装饰性的东西,他并没有将其看得很重。具有这种自大狂的精神分裂者则又处在另一个极端。他坚信他是天才,是日本的天皇、是拿破仑、是耶稣基督,而放弃任何现实性的证据,而现实的证据是否认他的信念的;他完全

不能理解他人的提醒：他实际上是一个可怜的看门人，或疗养院的一个病人，或受人轻视嘲笑的对象。如果他知道有人这样描述他，他就会作出只是有利于他的自大观念的决定，并且相信，他人根本不了解情况，或者他人之所以有意轻视他，只是为了伤害他。

而病态的人则处在正常人和精神分裂症患者这两个极端的中间。如果他意识到他的被夸大的自我估价，对此，他的有意识的反应完全不同于健康人的反应。如果在梦中他以贵族的身份出现，那么，他会发现这些梦非常可笑。尽管他在意识中鄙视那些自大的幻想，认为它们不是现实的，但是这些幻想对他来说具有情感上的现实价值，这些价值与对精神分裂者的价值是一样的重要。在这两种情况之中，其理由是一样的：它们具有重要的功能。虽然其基础不如精神分裂者稳固，但是它们都是他的自信心赖以依存的支柱，所以，他不得不紧紧地依赖它们。

这种功能中的危险在这种情景中表现出来，在这种情景中，自尊心受到了某种打击。由于自尊心受到了打击，因而他的价值支柱摇摇欲坠，他自己也就垮了，并且再也不能从崩溃中恢复过来。例如，一位姑娘有很好的理由相信，一个男人爱上了她，同时也认识到这个男人正在犹豫是否娶她。在一次谈话中，他告诉她，他自觉太年轻，太没经验，不想结婚，因此他认为，在被婚姻束缚之前先认识其他的一些女孩子，是比较明智的想法。她被一下子击倒了，难以从这一打击中恢复过来，开始变得压抑，觉得工作没有安全感，对失败形成了巨大的恐惧，接下来便是对任何事情畏葸不前，不敢见人，也不想做工作。这种恐惧压垮了她，即便是些鼓励性的事情，诸如后来那位男人又下决心要娶她，她的能力得到了好评，获得了一份好工作，等等，都不能使她树立自信。

与精神分裂症相反,神经症患者不可避免地会把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不合乎他意识上的幻想的成千上万的事情,痛苦地记录在心中。结果在自我评价时,他不住地在伟大和渺小之间摇摆不定。在每一分钟,他都会从一个极端转到另一个极端。在他感到他的出类拔萃的价值的同时,他可能会吃惊地发现每个人开始认真地对待他了。或者在他感到倒霉和受压迫的时候,他感到很愤怒,别人居然认为他需要帮助,他的敏感性可以与一个全身感到疼痛因而畏缩于哪怕是轻微的触摸的人相比较。他易于感到受伤害、被鄙视、被忽视、被轻视。一旦他感到了这些情况,他的反应是强烈的报复性憎恨。

在这里,我们又看到“恶性循环”在起作用。当自大的观点有明确的安全价值,提供某种支持时,即使只是以想象的方式,他们不仅更增加了逃避的倾向,而且通过敏感性这一中介作用产生出更大的愤怒,从而产生更大的焦虑。诚然,这是严重的神经症具有的现象,但是,在较轻微的神经症患者那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较不严重的情况,此时甚至是当事人本人都没有认识到这种现象。然而,另一方面,一旦神经症患者能够做建设性的工作时,就能开始一种良性的循环。通过这种方式,他的自信心得到了增强,因而不必有自大的思想。

神经症患者缺乏成功——在任何方面落后于他人,不管是职业、婚姻、安全感还是幸福——都使他妒嫉他人,并因此加强他从其他的来源发展出来的吝惜妒嫉。导致他压抑其妒嫉的态度,可能有几种因素,这些因素诸如性格中内在的贵族气质、深深地相信他没有权利向他人要求任何事情,或者只是没有认识到他现存的不快活等。但是,他越是压抑,他也就越拒绝他人,有时因此产生

几乎是迫害形式的恐惧；他人妒嫉他的每一件事情。这种焦虑非常之大，如果他遇到一些好事情，诸如一份新的工作、恭维的话、幸运的收获或交上了桃花运等，也使他感到不自在。因此，它们可能大大地加强他逃避的倾向，不去占有任何事情，不到任何地方去。

撇开其细节不谈，从病态地追求权力、声望、财富中发展出来的这种恶性循环的主要线索大致可以表述如下：焦虑、敌视、损害自信心；追求权力及相关的东西；强化敌视和焦虑；逃避竞争的倾向（伴随有自我贬斥的倾向）；失败及潜能与成就之间的差距；强化的优越感（伴随吝惜妒嫉心理）；强化的自大观念（伴随有对妒嫉的恐惧）；强化的敌视和焦虑，如此反复循环。

然而，为了全面地理解妒嫉在神经症中的作用，我们不得不从更加全面的观点来思考它。神经症患者，不管他是否在意识中感到这一点，他不仅是个非常不幸的人，而且他看不到任何逃避不幸的机会。局外人描述成产生于试图获得安全感的恶性循环的东西，神经症患者则感到他被绝望地网住了。正如我的一个病人描述的那样，他感到被抓进了一个具有很多门的阁楼之中，他所打开的每一扇门都通向黑暗。而且在所有的时间里，他都知道他人正在外面的阳光下散步。我认为不认识神经症患者所具有的麻痹性的绝望就不能理解任何严重的神经症。有些神经症患者将他们恶化的情形以很明显的形式描述出来，但是另外的一些人为听之任之的心情或乐观的外表所掩盖。因此很难看到在所有的奇怪的虚荣、需求、敌视之后，有一个正在遭受痛苦、总是排斥在美好生活之外、即便得到了他所想要的一切也不能享受它的人。当一个人认识到所有这些绝望时，就不难理解，他所表现出来的极端进攻性甚至是卑贱性，是不能由特殊的情况来解释的。一个被关在幸福的

每个可能性的门外的人,如果他不对他不能融入的世界表示强烈的憎恨的话,那么他就必定是个名副其实的天使。

现在,再回到妒嫉的问题。这种不断发展的绝望就是妒嫉由此滋生的温床。它并不是对某些特殊事物的妒嫉,而是尼采所描述的“生命的妒嫉”,那些感到更为安全、更为平静、更为幸福、更为率直、更为自信的人都具有的一般的妒嫉。

如果一个人产生了绝望的情绪,不管他意识到这一点与否,他总会力图解释它。他没有看到它——正如心理分析观察者所做的那样——是一种势不可挡的过程的结果,反之,他认为这是由他人或自己引起的。他经常怨天尤人,尽管他通常强调的只是一个人或另一个人。当他谴责他人时,一种控诉的态度就会产生,这种态度,可能是针对一般命运的,针对环境的,或针对特殊个人的:父母、老师、丈夫、医生。正如我们经常指出的那样,对他人的病态需求可以从这种观点得到较好的理解。就好像病人的思想沿着这样的一条思路:“因为你要对我遭受的痛苦负全部的责任,所以你的责任就是要帮助我,我有权从你那里期待一切。”如果他从自己本身来寻求罪责的来源,那么他感到,他是罪有应得。

谈到神经症患者谴责他人的倾向,可能会产生这样的一种误解。听起来他的控诉仿佛是不合情理的。事实上,他有充分的理由感到谴责,因为他的确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尤其是在儿童时代。但是,在他的控诉中也有一些病态的因素:他常常对一些积极的目标进行有建设性的努力,而且通常是盲目的和不加区别的。例如他们可能是针对要帮助他的那些人的,与此同时,对那些真正伤害他的人,他可能完全不能感到并表达他的控诉。

## 第十三章 病态的罪责感

从神经症的表面现象来看,罪责感仿佛起了极为重大的作用。在某些神经症中,这些感觉被公开和大量地表现出来;在另外的一些神经症中,这些感觉更为伪装,但是,它们的存在通过行为、态度和思维的反应方式表现出来。首先,我将以概述的方式讨论罪责感的不同表现形式。

正如我在上一章中所提到的,病态的人常常易于用下述理由解释他遭受的苦痛:他认为,他是罪有应得。这种感觉可能极为模糊不清,或者,它会执着于被社会禁忌的那些思想和行为上,例如手淫、乱伦欲望、希望亲属死亡的欲望。这种人往往稍有这样的念头即有罪责感,如果有人要求去看他,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期望别人对他的所作所为进行谴责。如果朋友有时不来拜访或者不给他写信,他就会问自己是否冒犯了他们。如果事情搞糟了,他就会认为这是他的过错。即使他人明显地做错了事,明确地对他不好,他仍然设法为此谴责他自己。如果有任何利益的冲突或任何争论,他就易于盲目认为,他人是对的。

在这些潜在的、随时等待着在任何情况下窜出表面的罪责感与那些被解释成无意识的明显地处在压抑条件下的罪责感之间,只存在着微小的差别。后者采取的是自责的形式,常常是幻想的,或至少是极为夸大的。同时,神经症患者孜孜不倦地使自己在自

己和他人的眼中看起来是合情合理的,尤其是当这种努力的强大的策略上的价值没有得到清楚的认识时,这表明了他具有那种自由漂浮和罪责感的存在,而这种罪责感不得不保持在停止状态。

这种混合的罪责感的存在通过神经症患者萦绕心怀地对被发现的恐惧和对被责备的恐惧而进一步表现出来。在他与心理分析医生进行讨论时,他的行为就好像是犯罪者与法官之间的关系一样,所以,在心理分析中,对于他来说很难与心理医生进行合作。心理医生对他的每一种解释,他都当成是责难。例如,如果心理医生向他指明,在某种防御性的态度之后,隐藏着一种焦虑,他的回答是:“我知道我是个懦夫。”如果心理医生解释说,他之所以不敢接近他人,是因为他担心被他人拒绝,他会因此而责怪自己,而他的解释是:他试图使生活变得轻松自在。强迫性地追求完美,因逃避任何责难而变得越来越严重。

最后,如果有不利的情況出现,例如丧失财产或出了车祸,他就会感到明显的轻松自在,甚至会丧失某些神经症的症状。对这一反应的观察,以及有时候他仿佛故意地安排或激发某些不快的事情发生这一事实,如果不对此进行有心的揣测、分析,那么就可能得出这样的假设:神经症患者具有强烈的犯罪感,因而形成了惩罚的需求,以便摆脱这些罪责感。

因此,看起来有大量的证据表明,在神经症患者那里,不仅存在着特别敏锐的罪责感,而且对他的人格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但是尽管有这样明显的证据,我们还必须追问,神经症患者意识上的罪恶感是否是真诚的?而那种暗示潜意识罪恶感之症状性的态度是否不可以用另外的分析来说明;有很多的因素使我们产生这样的怀疑。

像自卑感一样,罪责感也不是根本不受人欢迎的,神经症患者并不急于要摆脱它。事实上,他坚持自己的罪责感,并坚定地拒绝任何要解脱他罪责的任何努力。这种态度本身就足以表明。正如在自卑感中一样,在他坚持罪责感的幕后,必定有一种很重要作用的倾向。

而且我们也应该记住另外的一种因素,要真诚地感到后悔,或对某些事情感到耻辱是非常痛苦的,而且更为痛苦的是要把这种情感向他人表达出来;事实上是神经症患者而不是正常人拒绝这样做,因为他害怕遭到拒绝。然而我们称之为罪责感的东西,他却十分乐意表达出来。

此外,自我控诉心理常常被解释成神经症患者潜在地具有罪责感的表现。事实上自我控诉心理的特征完全是非理性的因素。不仅在他的特定的自我控诉中,而且在他的不配任何仁慈、称誉、成功的混杂感觉中,他也可能走向非理性的极端,从强烈的夸张到纯粹的幻想。

另外一种因素表明,自我控诉不必是真正的罪责感的表达,这一事实说明,在无意识中,神经症患者本人根本不相信他是一钱不值的。即使看起来他沉浸在罪责感中,如果他人表现出把他的罪责当真的倾向,他就会变得非常忿恨。

对后一情形的观察导致了最后的因素,弗洛伊德在讨论忧郁症患者的自我控诉时就指出:<sup>①</sup> 神经症患者表现出来的是罪责

---

<sup>①</sup> 弗洛伊德:“悲痛与忧郁症”,载《文集》第四卷,第152~170页,精神分析出版社。卡尔·亚伯拉罕:《里比多发展史初探》(*Versuch einer Entwicklungsgeschichte der Libido*),精神分析出版社。

感,但是却没有由此产生的谦卑,二者之间呈现出明显的矛盾。在神经症患者宣称自己一文不值的同时,他又强烈地要求他人的关心和称誉,而且表现出明显的不愿接受任何微小的批评。这些矛盾现象可能会显而易见,正如一个妇女的情形那样,她对报纸上报道的每一宗犯罪都感到模糊的罪责感,为家庭里的每个人的死亡而谴责自己,但是,当她的妹妹只是温和地责备她要求过多的关心照顾时,她却大发雷霆,甚至晕倒在地。但是,这种矛盾并不总是引人注目的;它更多的是潜存在心里而不是表现在外。神经症患者可能会将他们的自我控告的态度误以为是一种对自己的健康批评的态度。他对批评的敏感会为一件错误信念的帷幕所掩盖,即使这种批评是友好的或者说是建设性的;但是这种信念只是一种帷幕,与事实相矛盾。甚至明显的友好建议也会引起他的恼怒,因为任何建议都隐含着批评他不是十全十美的。

所以,如果仔细地考察和真正的测验一下自责感的话,很明显,大多数看起来是罪责感的东西,都是焦虑的表现或者说是反抗焦虑的表现。这一点也部分地适用于正常人。在我们的文化中,恐惧上帝比恐惧人被认为更为高贵,或者,用非宗教的术语来说,因为良心而逃避某些事情比起因为恐惧被人抓住而避免做某些坏事情要高贵得多。很多人假装对妻子忠诚,事实上是因为他的良心害怕他的妻子。由于大量的病态焦虑,神经症患者比起正常人来更倾向于掩饰自己对罪责感的焦虑。与正常人不同的是,他不只是害怕可能发生的结果,而且与现实极不相符地预期这种结果。这种预期的性质依情况的不同而不同。他可能具有即将受惩罚、受报复、遭抛弃的夸大思想,或者他的恐惧只是模糊的。但是,不管他的恐惧性质是什么,它们都集中在同一点上。我们也许大致

可以将这一点描述成对受人厌恶的恐惧,或者如果这种恐惧厌恶扩张成为信念,那我们就将其描述为对被发现的恐惧。

恐惧厌恶是神经症中最常见的现象。几乎每个神经症患者,即使外表看起来他极为自信,而且对他人的意见漠不关心,也都是极为担心或者说高度敏感被人厌恶、批评、责备、发现。正如我已经提到的那样,这种恐惧厌恶通常被理解成潜在的罪责感。换言之,它通常被认为是这种罪责感的结果。如果对此作批评性的观察,我们就发现,这个结论是有问题的。在心理分析中,病人常常发现,极难谈论某些确切的困难体验或思想——例如,有关死亡的愿望、手淫、乱伦的愿望——因为他对此感到太多的罪责,或者更确切地说,因为他相信,他感到有罪。当他具备足够的信心来谈论这些事情并认识到,这些事情并不会讨人厌时,他的“罪责感”就消失了。他感到罪责,因为,作为他焦虑的结果,甚至比他人更看重公众的意见,并因此天真地把它们看成是他自己的判断。而且,他对讨人厌的一般敏感性也基本未变,即使在他讲出促使罪责感产生的那些经历之后,亦应如此,这些观察表明这样的结果,罪责感不是恐惧厌恶的原因,而是它的结果。

由于恐惧厌恶在形成罪责感和理解罪责感方面极为重要,所以,我在这里想讨论一下它的一些内涵。

不符实际的恐惧厌恶可能会盲目地扩张到所有的人,或者它只是扩张到朋友——尽管通常神经症患者不能清楚地区分朋友和敌人。开始时,它只涉及到外部世界,而且,无论程度大小,它总是与他人的反对有关,但是它也可能内在化。这种内在化越强烈,外界的反对就变得越不重要,而自己的反对就变得重要起来。

对反对的恐惧可以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有时候,它以不断

地恐惧他人生气的形式表现出来,例如:神经症患者可能害怕拒绝一次邀请,害怕反对一项意见,害怕表达任何愿望,害怕没有遵守既定的规则,害怕以任何方式引人注目。他也可以表现为不断地恐惧人们对他的发现;甚至当他感到他受人欢迎时,他也倾向于退避三舍,以免以后被他人发现真相。其结果是,他极不愿意他人知道任何他自己的私事,或者对有关自己的、没有任何伤害性的问题大发无名之火,因为他感到这样的问题试图窥探他自己的隐私。

恐惧反对是使心理医生的分析过程受到阻碍,并使病人感到痛苦的主要因素之一。尽管每个人的分析与他人不同。但所有的人都有共同的特点:尽管病人希望医生的帮助,希望他的理解,但是,与此同时他又抗拒医生,认为医生是最危险的闯入者。正是这种恐惧导致了病人的行为看起来像是站在法官面前的一个犯人,而且真的像犯人一样,在内心中暗暗地决定否认和误导医生的观察。

这一态度可能会出现在梦境中,梦见自己被迫忏悔,而且对此的反应是恼怒异常。我的一位病人,在一次接近于揭示他的某些被压抑的倾向时,有一天做了一个梦,这个梦在这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他想象他见到了一个男孩,这个男孩有时住在梦幻岛上,具有寻找庇护所的习惯。在这个岛上,男孩成了群体的一员,这个岛的法律禁止任何人向外界泄露这个岛的存在,并且对任何可能的入侵者皆处以死刑。有一个人是这个男孩所深爱的,这个人以一种伪装的形式向心理分析医生再现了他偶然发现的通往这条梦幻之岛的路径。按照法律,这个人应该被处死。然而,只要他宣誓他从此决不返回这个岛上,那么这个男孩就可以救他。病人的这个梦是对这样一种冲突的一种艺术性表现:在心理分析的自始至终

以一种形式或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的冲突,即既喜欢医生又憎恨医生的冲突,因为医生要闯入他隐藏的思想和情感,也是病人既要保护内心的秘密又要必须放弃这一保护之间冲动的斗争。

如果恐惧反对不是由罪责感产生的,那么人们可能就会问,神经症患者为什么要如此关心被他人发现和受他人反对呢?

导致恐惧反对的主要因素乃是存在于神经症患者显示给世界和他本人的假面具与潜藏在这种假面具之后的所有压抑的倾向之间的巨大差距。尽管他由于丧失了真正的自我,由于必须保持一切伪装而遭受了痛苦——这种痛苦比他所了解到的更为巨大——但是他仍然不顾一切地维护这些伪装,因为它们代表了那保护他以免焦虑不安的堡垒。如果我们认识到,正是这些他不得不隐藏的事情形成了他恐惧反对的基础,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某些“罪责感”的消失不能使他摆脱他的恐惧。因为尚有许多东西需要改变。大致说来,要改变的是他人格的整个不诚实,而不是他人格的那些病态的部分。正是不诚实导致了他的恐惧反对,正是在这种不诚实中,他恐惧暴露自我。

至于他的那些秘密的全部内容,他首先要掩饰被攻击所掩饰的那些内容。攻击这一名词不仅用来包括他的敌视反应——愤怒、报复、妒嫉、侮辱的欲望,等等——而且包括他对他人的内心需求。由于我已经详细讨论了这些现象,所以,在这里我不妨简单地说,他不愿意独立自主,他不愿靠自己的努力获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相反,他内心坚持依赖别人的生活,而不管这种依赖是以主宰的方式、剥削的方式还是关爱,“爱情”或是屈从的方式。一旦触及他的敌视反应或他的需求,就会形成焦虑,这不是因为他感到罪责,而是因为他看到,他所需要的获得支持的机会受到了威胁。

其次,他要隐藏他所感到的软弱、不安全感和无助感,他的缺乏自信以及他的焦虑。因此之故,他建立了强力的面具。但是,他对安全性的特殊需求越是集中在对他人的控制上,那么他的自豪感也就越紧密地与强力这种概念联系在一起,也就越彻底地鄙视他自己。他不仅感到,软弱是危险的,而且认为他是可耻的,不论这软弱来自他自己还是来自他人,他将一切不完美的事情都归之于软弱,不论是他不能操持家务、不能克服他自身的障碍、需要他人的帮助,甚或焦虑萦怀,都是软弱的表现。由于他从根本上鄙视他自身的任何软弱,由于他不由自主地相信,如果他人发现了他的软弱,也会同样鄙视他,所以,他竭尽全力地隐藏这些软弱,但是他总是害怕他人迟早会发现这些软弱,所以,他继续焦虑。

所以,这种罪恶感以及与这种罪责感相伴随的自我控告不仅是恐惧反对的结果——而不是恐惧反对的原因,而且也是防止这种恐惧的防御机制,它们完成了恢复自信和掩盖真正的问题的双重目的。关于后一个目的,他们要么是通过将人们的注意力从他所要掩盖的东西那里引开来完成的,要么是通过极度夸张而使它们看起来显得不真实来完成的。

下面我举两个例子,以便我们可以举一反三。有一天,一位病人严厉地谴责自己不知感激,给心理分析医生增加了麻烦,没有充分地感激心理分析医生治疗他而取酬极少。但是在会诊结束之后,他发现他忘了他原本打算今天付的钱。这只是他希望不劳而获的诸多证据中的一种。他在这里的大量而又一般化的自我控告,正如在别处一样具有使真正问题隐晦的功能。

一位成熟而聪明的女人由于曾经像小孩子一样大发脾气而感到罪责,尽管在理智上她知道这是由于她的父母的不可理喻的行

为所引起的,而且尽管她与此同时还能自我理解,知道不可责备父母。然而,她在这方面的罪责感却日复一日地严重起来,因而倾向于把她与男人的性关系的失败作为敌视父母的惩罚。通过自己当前不能与男人发生性关系来谴责自己的幼稚的愤怒,从而掩饰了真正起作用的因素,诸如她自己对男人的敌视和因恐惧拒绝而逃避隐遁自我的心理。

这种自我控告不仅是对恐惧反对的防护,而且通过相反的安全性主张促使他恢复信心。如果不涉及到外人,神经症患者就会加强自尊来恢复信心,因为这些自我控告表明他具有敏锐的道德判断,能为自身的过错而谴责自己,而这些过错就连他人也没有注意到,因而最终这些自我控告能使他感到他是一个真正优秀的人。而且这种自我控告使他得以解脱,因为它们从不涉及他自己真正不满的问题,从而为他自己的解脱留下了一个秘密的后门,这使他看起来的确不是一个坏人。

在我们进一步讨论自我控告倾向的功能之前,我们必须考虑其他的避免反对的方式。与自我控告完全相反,但同时又能实现同样的目的的一种防御机制就是,通过使自己总是正确或总是完美,从而使任何批评对他都无懈可击,以此来阻止任何批评。这种防御机制渗透到一切行为,即便他真的犯了一个大错,他都会以律师的那种聪明机智的思想诡辩术来使自己的行为合情合理。这种态度有时会走向极端,使他在无足轻重或琐碎的小事上都要求十全十美。例如,永远能正确地预知天气,因为,对于这种人来说,任何细节上的错误都会为错误打开方便之门。这种类型的人通常不能忍受些微小的不同意见,必须保持情感上的平衡,因为在他的思维中,即便是微小的不同意见,也等同于批评。这种倾向导致了最

大程度的虚假适应。这一情况可以在那些尽管自己有严重的神经症,却设法在自己的眼中,有时甚至是他周围的人眼中保持“正常人的”形象,仿佛很能适应环境。在这种神经症患者中,我们可以毫无错误地预言他具有极度的恐惧被发现和被反对的心理。

神经症患者防止反对的第三种方法便是,逃避无知、疾病或无助的情景之中。我在一位法国女孩的身上碰巧发现了这样的一个典型的病例。这个女孩是我在德国治疗的。这个女孩就是我在上文提到过的由于怀疑她心智不全被送到我这里来的那个女孩。在心理分析的头几个星期,我也怀疑她智力不够;她好像不理解我说的一切,尽管她完全听得懂我说的德语。我试图用简单的德语说一些同样的事情,但仍然徒劳无用。最后有两种因素澄清了这个局面。她做了一个梦,在梦中,我的诊室看起来像一座监狱,或者是一位内科医生的诊室,那位医生正在检查她的身体。这两种观念暴露了她对被发现的焦虑,她之所以做后一个梦,是因为她害怕检查身体。另一个揭示这种情景的因素是她意识到生活中的一次偶然事件,在按法律要求出示护照的时候,她忘了出示她的护照。当她最后走到海关官员的面前时她装作不懂德语,希望以这种方式来逃避惩罚。她当时大笑着告诉我这件事。后来她认识到,她出于同样的动机,在用同样的伎俩对付我。从这时起,她证明自己是极聪明的女孩。她一直将自己躲在无知和愚蠢的后面,以逃避被谴责和被惩罚的危险。

一般说来,那些不负责任、贪玩的儿童爱使用这样的伎俩,因为他们不希望别人过分认真的对待他们。有些神经症患者一生都在采用这种态度。即使他的行为不是孩子气的,在他的情感中也不想太过认真。这种态度的功能在心理分析中可以观察到。病人

在接近不得不认识他自己的攻击倾向时可能会突然感到无助,其行动突然像儿童一样,除了保护和关爱之外不需求任何事情。或者他们做一些梦,在梦中他们发现自己弱小无助,躺在妈妈的子宫或怀里。

如果在特定的环境中无助不起作用或者没法加以运用,那么疾病也能起同样的作用。这种疾病用来逃避众所周知的困难。然而,与此同时,它给病人充当的是屏幕作用,从而使自己不去认识正是恐惧造成他逃避应付自己应该应付的情景。有一位神经症患者与他的上司有矛盾,可能会突患消化不良来逃避;此时之所以诉诸于无能,乃在于这一事实,它创造了一种无法行动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它是一种托词,因而使他不认识自己的怯懦。<sup>①</sup>

防御反对的最后一个,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防御机制就是:有一种被牺牲的感觉。通过被利用感,神经症患者排除了责备自己占人便宜的那种倾向;通过惨遭忽视感,他排除了责备自己的占有欲的倾向;通过对他人的无助感掩藏起战胜他人的倾向。神经症患者经常使用并且固执地保持这种被牺牲感的策略,因为事实上这是防御机制的最有效的方法。它不仅能使神经症患者抵御谴责,与此同时还能使神经症患者怨天尤人。

---

① 弗兰茨·亚历山大(Franz Alexander)在《整个人格的心理分析》(*Psychoanalysis of the Total Personality*)中解释说,这种愿望是对惩罚和攻击上司本能的需求,病人将会很高兴接受这种解释,因为通过这种方式心理医生帮助他有效地避免面对这样的事实:他有必要树立信心,他恐惧树立信心,他为这种恐惧而生自己的气。医生允许病人将自己想象成一个高尚的人从而受到有反对上司的那些不良欲望的强烈困扰,这样通过给他们提供高尚的道德标准来加强已有的受虐狂的欲望。

现在再回过头来讨论自我控告的态度。除了保护自己不受对反对的恐惧的影响,并产生积极的自信之外,自我控告态度的另外一个功能就是:使神经症患者避免发现改变的必要性,并且在事实上代替了改变。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如此。但是,对于神经症患者来说,他的任务具有双重难度,不仅因为他难以认识改变的必要性,而且因为他的很多态度被焦虑必然化了。结果,他对不得不改变的前景怕得要死,从而不敢认识这种改变的必然性。逃避这种认识的方法之一就是,要在内心中相信,通过自我控告,他可以“挺过去”。这种过程通常在日常生活中观察得到。如果一个人后悔做了某件事,或者如果他后悔没有做成某件事,并且因此要做好某事,或者要改变引起失败的态度,他就不会使自己陷入自卑感中。如果他的确这样做了,就表明他逃避了要进行改变的这一艰巨任务。责怪自己比改变自己要容易得多。

顺便说一下,神经症患者无视改变的必然性的另一种方法就是,将他现存的问题理智化,那些想要这样做的病人在获取心理学知识的过程中找到了智力上的极大满足。这种心理学知识包括有关自身的知识,但是也只是仅此而已。这种理智化的态度后来被用作一种保护机制,防止他对任何事物动情,从而防止他认识到他不得不进行改变。这就好像他们看着自己说:多么有趣啊!

自我控告也可以用来排除怨天尤人的危险,因为,自己承担罪责看起来是一种更为安全的方法。不怨天尤人,而是自己承担责任,加强谴责自我的倾向,在神经症患者那里具有重要的作用,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进行重点讨论。

一般说来,这种禁止作用源远流长,一位在充满恐惧和憎恨的环境中成长的儿童,会限制自己自发的自尊心,对他周围的环境具

有深深的谴责情感。然而,他不仅不能表达这些情感,而且,如果他非常怯懦的话,他甚至不敢在他的意识情感中觉知它们。究其根源,部分地是因为他们害怕惩罚,部分地是因为他害怕丧失他所要求的关爱。这种幼稚的反应在现实中具有固定的基础,因为,造成这种气氛的父母就受不得任何批评,这些父母就有病态的过敏症。然而,之所以有这样病态的父母,是因为有一种文化因素在作祟。<sup>①</sup> 在我们的文化中,父母的地位是以权威力量为基础的,这种权威的力量总是要求进行强迫的服从。在很多情况下,仁慈主宰着家庭中的一切关系,无需父母来强调他们的权威力量。然而,只要这种文化态度存在,就会在仁慈的家庭关系中投上一层阴影,即使这种文化只是一种背景。

当家庭关系建立在权威的基础上时,就会禁止对父母进行任何的批评,因为任何批评都会损害父母的威信。这种禁止可能是公开的,禁令通过一些惩罚来加强。或者采取一些更为有效的策略,禁止的机制更为隐秘,并通过道德的基础来加强。于是,孩子的批评不仅受到父母个人的敏感性的检查,而且受到在我们社会里流行的这样一种态度的检查,即批评父母是有罪的。孩子由于受到这一文化态度的影响,而接受了不批评父母的这样一种心理。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胆子稍大的孩子可能会表示反抗,但是,相应地他会有罪责感。一些胆小的孩子不敢表示任何怨恨,甚至日益认为父母不可能有错。但是他感到一定有某人有错,并因此得出结论,既然父母无错,那一定是自己有错。不用说,这不是一种理

---

<sup>①</sup> 这一点以及其他的段落请参见弗罗姆的研究,载于《权威与家庭》(*Autoritaet und Familie*),马克斯·霍克海默尔(Max Horkheimer)主编。

智的过程,而是一种情感的过程。它不是由思维决定的,而是由恐惧决定的。

儿童通过这种方式感到罪责,或者更确切地说,他形成了在自身之内寻求和发现过错的倾向,他不是双方在寻求平衡,客观地审视整个的情势。他的自责不是使他感到罪责,而是使他感到自卑。在罪责与自卑之间,只有微小的差别,孰强孰弱则完全依赖于他周围习以为常的道德侧重哪一个方面。有一个人总是屈服于她的妹妹,并且,由于恐惧而屈从于这种不公平的待遇,压抑住她真正感到的责难,她可能会告诉自己这种不公平的对待是有理由的,因为她比她的妹妹卑下(没有她漂亮、没有她聪明),或者她可能认为,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她是一个坏女孩。然而,在这两种情形中,她只是进行自责,而没有认识到这是错误的。

这种反应并不一定持久不变;如果这种自卑不太深刻,如果儿童的周围环境发生了变化,或者如果在进入成人以后,有人赞赏他或在情感上支持他,那么这种反应也会发生变化。如果这种变化没有发生,那种怨天尤人的倾向就会变成自责,同时在短时间内变得更为强烈,而不会减弱。与此同时,对世界的怨恨逐渐地从各种来源中堆积起来,恐惧表达怨恨的心理也日益增强,因为他日益担心他的这种怨恨心理会被他人发现,同时在内心中设想他人也有这种的敏感性。

但是,对一种态度的历史渊源的认识并不足以解释它。无论是从实践上还是从动力学上看,更重要的问题都是,是什么样的一些因素,使这一态度在那一时刻发生。在神经症患者难以作出批评和谴责的态度中,在他的成年人格中有许多决定性的因素。

首先,这种不能作出批评和谴责的态度是他缺乏自发地进行

自我确认的表现之一。要认识这一缺失,就有必要将他的态度与我们文化中的健康人作出和表达谴责或更普遍地说他们进攻和防御时的所感所为的方式加以比较。正常人能够在争论中防御自己的意见,反驳无中生有的谴责,拒斥他人的巴结或强迫,能对他人的忽视和欺骗在内心和外表上都表现出自己的抗议,如果他愿意的话,或者如果情势允许的话,他会拒斥一次要求或提议。必要的时候,他能够感受和表达他的批评,感受和表达他的谴责,如果他愿意的话,他能够自觉地逃避一个人或不理睬一个人。他能够防御和进攻而没有什么不适当的情感紧张,他既不会夸张地自我谴责,也不会夸张地进攻他人,而是能够在这两点之间保持中间路线,因为夸张的进攻会使他不适当地、粗暴地怨天尤人。所以要能够采取这种幸福的中间路线,只有在这种条件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从混乱的无意识敌视中更多地解脱出来,并且具有更安全的自尊。而这些条件,在神经症患者那里是或多或少地缺乏的。

当这种自发的自我肯定缺乏的时候,其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具有一种软弱感和没有防御感。一个认识到——可能不曾意识到这一点——这种情况:如果情势要求他能进攻或能够防卫自己的人就是一个强有力的人,并且他感到自己是强有力的。一个心中老是想着他可能会做不了这件事的人就是一个软弱的人,而且他感到软弱无力。尽管我们会成功地决定我们意识的自我,但是对下述的情况我们心中有一本账,它像电子钟一样准确,这就是:我们是出于恐惧还是老于世故才压抑着对他人的批评?我们是出于软弱还是出于正义感才接受他人的谴责?对于神经症患者来说,他心中软弱的印记是他长期不快的隐秘源泉。如果一个人不能成功地防御别人对他的攻击或者不能成功地表达他的批评意见,那

么他的各种各样的压抑就开始了。

影响批评和谴责的一个更为重要的障碍的直接渊源就是基本的焦虑。如果一个人感到外部世界具有敌意,如果他对此感到无助,那么他就感到冒险去打扰他人未免过于鲁莽了。对于神经症患者来说,这种危险看起来就更大,而且他的安全感越是建立在他人的关爱上,他就越害怕丧失这种关爱。对于神经症患者来说,“打扰”这一概念与正常人所想到的完全不同。由于他与他人的关系是脆弱的,所以,他不能够相信,他人与他的关系会是更好。所以,他认为,打扰他人包含着与他人断绝关系的危险。他认为这样会遭到他人的舍弃,或招致他人的唾弃或怨恨。除此之外,他有意无意地假设,他人也会像他一样害怕被发现心中的秘密,害怕受到他人的批评,所以他倾向于用对待自己的方法来对待他人,谨小慎微地行事。他既害怕对他人进行谴责,又怕感到他人会谴责自己,这种极端的恐惧使他陷入一种两难的困境,因为正如我们在上文所看到的那样,他心中充满了郁积的怨恨。事实上,正如每一个熟悉神经症患者行为的人所知,他们的大量的谴责的确也表达出来了,有时候是以掩饰的方式,有时候是以公开而最具进攻的方式加以表现的。由于我一直主张他们对待批评和责难具有一种根本的唯命是从的态度,所以就有必要简短地讨论一下这种责难表达的条件。

这些责难可能会在绝望的压力下表达出来,尤其是,当神经症患者感到他不会丧失什么时,当他感到不论他的行为怎样他人都会对之加以拒绝时,就会表达出他的责难。例如,如果他竭尽全力的善良和关照没有立即得到回报或者遭到了拒绝,这种责难的情形就会发生。他的责难是否在一特定的场合爆发性地发泄出来,

或者,是否这种责难要持续一些时间,这得取决于他绝望的时限。他可能会在单一的危机中将他对他人的所有怨恨全部倾泄给他人,或者他的责难会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他说话算数,因此希望他人严肃地对待他所说的话——然而他内心希望他人会认识到他绝望的深度,从而能够安慰他,即使他没有处在绝望的状态。如果他的责难涉及到的是他有意识地憎恶的人和他不从其得到好处的人,发泄责难的条件也同样存在。在另外的条件下,这种真诚的要素就不会存在,对此我们在下文将予以讨论。

如果神经症患者感到他处在被发现内心的隐秘或遭受到了责难,或者当他感到他处在这种情势的危险之中,他也能够或多或少地激烈表达他的责难态度。这种打扰他人的危险比起遭到他人反对的危险,看起来要小得多。他感到自己处在危急之中,因而要加以反击,就像一头动物受到大自然的威胁或处在危险中那样,需要进行反击。当神经症患者害怕某事会被发现时,或者当他在做某件事会受到他人反对的事情时,他们就会对神经症医生进行强烈的非难。

与在绝望的压力下进行的责难不同,上面这些反击是盲目的。他们发泄他们的责难,而不管对他人的责难是否正确,因为这些发泄纯粹出于排除眼前危险的需要,而不管使用的是什么方法。尽管这些发泄偶尔包含真正感到的责难,但是这些非难大多也是经过夸大的、幻想的。在神经症患者的内心深处也不相信这些非难,希望他人不要将这些非难当一回事,如果他人拿这些非难与他较真,比如说,如果他人就此与他进行严肃的争论、或者表现出受到伤害的迹象,他也会感到极为惊异。

如果我们认识到这种对非难的恐惧是神经症结构中所固有

的,而且如果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处理这种恐惧的各种方法,那么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在这一方面、这一现象表面上常常是矛盾的。神经症患者常常不能表达一项合理的批评,即使他的内心充满了强烈的不满。当他丢了东西时,每次他都可能确信是仆人偷去了,但是他又不能谴责她,甚至不能表示不满,因为,仆人已经不能按时给他做午饭了。他所表达的非难常常具有某种不切实际的特点,有时是无的放矢,具有虚假的色彩,是不合适的,或者完全是幻想的。作为一个病人,他可能会激昂地非难精神分析医生毁了他,但是却不能表达他对医生香烟味的真正的厌恶。

公开地表达出他的这些指责,通常还不足以发泄他所积郁的全部怨恨。要想充分地发泄他的不满,需要一些直接的方式,这些方式就是,既能让神经症患者发泄他的怨恨,而又不使他意识到他真正这样做。有些怨恨是无意识中发泄出来的,有些怨恨是他从一个他要真正指责的人那里转嫁到一个相对说来不大相干的人身上的——例如,当一个女人对她的丈夫充满怨恨时,她可能责骂她的女仆——或者她转而去怨天尤人。这些都是出于安全上的考虑,它们本身并不是神经症特有的。神经症患者间接地和无意识地表达非难的特殊方法就是利用受苦这一媒介。通过受苦,神经症患者将自己表现为一个活生生的指责。一位妻子由于丈夫回家较迟而生病,不用吵架就能更有效地表达她的怨恨,同时也具有这样的便利:自己看起来也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

受苦如何有效地表达非难,取决于引发非难的禁止作用。在恐惧不太强烈的地方,痛苦可以戏剧性地表现出来,公开指责的一般内容是:“你看,你是如何使我受苦的!”事实上,这是表达非难的第三种条件,因为,受苦使非难看起来比较合情合理。这里,与获

取关爱的方法也具有密切的联系,这一点我们在上文已讨论过了;非难性的受苦同时也可以充当乞求怜悯的方法,并且可以用来获取关爱以弥补所受的伤害。表达非难时,限制越多,就会越不去表现他的受苦。这种限制可能会走向极端,以致神经症患者不想引起他人注意他正在受苦。同时,我们在他表现他的苦难时,发现最大的差异。

由于恐惧萦怀不绝,神经症患者不断地在谴责他人与自我谴责之间摇摆不定。其结果之一就是,他从来不能确定,而且根本也无法确定去批评他人或在认为自己的错事上是否正确。他通过经验记住和认识到他的非难常常是不符合实际的,是由自己非理性的反应所激发的。这些知识使他很难认识到,他是否真的错了,从而使他在必要的时候不能坚定立场。

观察者易于接受和解释这些现象,认为它们是特别敏锐的罪恶感的一种表现。这并不意味着观察者是病态的,但是它意味着观察者与神经症患者的思维和情感一样,都屈从于文化的影响。要想理解决定我们对罪责感态度的文化影响,我们就得考虑历史、文化和哲学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大大超出了本书的范围。但是即使要完全略过这些问题不讲,至少有必要提到基督教观念对道德问题的影响。

关于罪责感的讨论,我们可以作如下简短的概述:当神经症患者自责或者表现出某种罪责感时,首要的问题不应该是:“他真正感到罪责的东西是什么?”而是:“这种自责态度的功能是什么?”我们所发现的主要功能是:它是恐惧他人反对的一种表现;是一种防御恐惧的机制;是一种防御作出责难的机制。

当弗洛伊德和大部分心理分析学家认为罪责感是最终的动机

时,他们反映了他们那个时代的思想倾向。弗洛伊德认识到,罪责感来源于恐惧,因为他假定,恐惧导致了“超我”的产生,超我是罪责感的根源;但是,他倾向于相信,良心的要求和罪责感一旦建立起来,就会作为终极的因素起作用。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即使在我们已经学会了以罪责感来对良心的压力作出反应,并且接受了道德标准以后,这些罪责感背后的动机——尽管它只是以精巧和间接的方式表现出来——乃是对后果的直接恐惧。如果我们承认,罪责感本身不是最后的动力力量,那么就有必要修改某些心理分析的理论,这些理论是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之上的:罪责感——尤其是那些被弗洛伊德勉强称之为无意识罪责感的特征不清楚的罪责感——是产生神经症最主要的原因。在此我只提及这些理论的最重要的三点:其一为“消极的治疗反应”,这种观点认为,由于病人的罪责感处在无意识的状态,所以病人宁愿保持他的疾病;<sup>①</sup> 其二为作为一种内在建构的超我,对自我实施惩罚;其三为道德性的被虐狂,它把自我惩罚的受苦解释为需要惩罚的结果。

---

<sup>①</sup> 参见荷妮:“消极治疗反应的难题”。(“The Problem of the Negative Therapeutic Reaction”)载于《精神分析季刊》第五卷,1936年版,第29~45页。

## 第十四章 病态受苦的意义

### （受虐狂问题）

我们已经看到，在与自己的冲突进行斗争的过程中，神经症患者经受了巨大的痛苦，他常常将痛苦用做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但是由于现存的困境，这些目的很难实现。尽管我们在每一个别的情景中能够认识到利用痛苦的理由以及通过受苦所想要达到的那些目的，但是，为什么神经症患者宁愿付出如此大的代价，这一点依然使人有些迷惑不解。看起来仿佛是慷慨地利用痛苦并毫不迟疑地从一种积极生活中退缩回来，源自于一种自在的驱力，这种驱力大致可以描述为一种要使自己更为软弱而不是更为坚强、使自己更为悲惨而不是更为幸福的倾向。

由于这种倾向与一般的人性观念相矛盾，因此，它一直使人大惑不解，事实上，它是心理学和神经症学的一块绊脚石。的确，它是受虐的基本问题。受虐这个词原来指的是通过受苦，即经由被人毒打、折磨、强暴、奴役、侮辱来获得性满足的性变态和性幻想。弗洛伊德已经认识到，这些性变态和性幻想与受苦的一般倾向有着密切的联系，也就是说，与没有明显的性基础的倾向有关；后一种倾向被归类为“道德上的受虐狂”。由于在性变态和性幻想中，受苦的目的是为了一种积极的满足，因此，人们得出结论说，所有病态的受苦都是由满足的愿望决定的，或者，用简单的语言描述就

是,神经症患者想要受苦。他们认为,性变态与所谓的道德受虐狂之间的区别在于,该行为是否真有意识。性变态无论是对满足的追求还是满足本身都是有意识的行为,而道德受虐狂在这两方面都是无意识的。

即使是在性变态中,通过受苦来提高满足是个大难题,但是受苦的一般倾向就更为令人不解了。

为了解释受虐这一现象,人们作了很多的努力。其最卓越者是弗洛伊德的死亡本能的假说。<sup>①</sup> 简短说来,这一假说认为,在人身上有两大主要生物力量在起作用:生命本能和死亡本能。死亡本能的目的是自我毁灭,当死亡本能与里比多的驱力结合在一起时,就导致了自虐的现象。

我在这里要提的最有兴趣的一个问题是,受苦的倾向是否可以从心理学上来理解,而不必从生理学的假设上来寻找根源。

开始时,我们不得不处理一种误解,这种误解混淆了真实的痛苦与受苦的倾向。我们没有理由跳过这样的一个结论:既然痛苦存在,那么就有一种引发它甚至是享受它的倾向。例如,我们不能像 H. 多伊奇(H. Deutsch)<sup>②</sup> 那样,解释这样的事实:在我们的文化中,妇女分娩时的痛苦是她们内心自虐地享受这种痛苦的一个证据,即使这可能在一些特殊的案例中才是真实的。在神经症患者身上发生的大量的痛苦与痛苦的欲望无关,它只是现存冲突的

---

① 弗洛伊德:“超越快乐原则”(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国际精神分析文库第4号。

② H. 多伊奇(H. Deutsch):“母亲身份与性能力”(Motherhood and Sexuality),载于《精神分析季刊》第二卷,1933年版,第476~488页。

不可避免的结果。它的出现只不过像一个人折断了一条腿时出现的痛苦那样。在这两个例子中,不管一个人要不要痛苦,痛苦都会出现,当痛苦出现时,他并没有通过痛苦得到过什么东西。由现存的冲突所产生的焦虑是明显的,但不是神经症患者遭受这种痛苦的唯一例子。其他的痛苦也可以用这种方式加以理解——诸如认识到潜力与实际成就之间日益增加的差距时的痛苦,在某种困境中所产生的绝望的感觉,对微不足道的侮辱的过分敏感,因为有神经症而轻视自己。病态受苦的这一部分由于不是十分明显,常常受到了完全的忽视,因为人们总认为,神经症患者希望受苦这一假设已经解决了这一难题。如果这样做了,我们有时就会奇怪,在何种程度上,外行人,甚至是有些神经症学家在无意识中分享了神经症患者对待他的神经症的轻视态度。

既然已经澄清了神经症患者的受苦不是由受苦的倾向所产生的这一观点,那么,现在我们转而讨论那些由这些倾向所引起的痛苦,并因此讨论受虐驱力这一概念下的内容。在这些情况中,表面的印象是,神经症患者所遭受的痛苦比起现实中理应受的痛苦要大得多。更详细地说,他给人这样的印象,其内心有些倾向要急切地抓住每一个受苦的机会,他能够设法将每一种幸福的环境转变为某种痛苦的事情,他极不愿意放弃痛苦。但是在这里,产生这种印象的行为在很大的程度上可以通过病态的痛苦所具有的功能来解释。

关于病态痛苦的这些功能,我可以总结一下我们在前一章中已看到的论述。对于神经症患者来说,受苦有一种直接的防御价值,而且事实上常常可能是他能防御眼前危险的唯一方法。通过自我责难,他逃避被人谴责或谴责他人,通过生病或无知,他逃避

指责,通过贬低自己,他逃避竞争的危险——但是,他由此加诸自身的痛苦同时也是一种防御。

受苦也是他获得他所需东西的一种手段,是他有效地实施需求,将他的需求放在合理的基础上的一种手段。对生活的希望,神经症患者也处在两难的境地。他的希望是,或者已经变成了强迫性的和无条件的,部分地是因为这些愿望受到焦虑的驱使,部分地是因为这些愿望受到任何真正关心他人心理的检查。但是另一方面,他确认自己要求的能力受到了很大的损害,因为,他没有自发的自我判断,用更一般的话来说就是,因为他那基本的无助感。这种两难的结果就是,他希望他人照顾他的愿望。他给人的印象是,在他的行为背后潜藏着一种信念,他人要替他的生活负责,如果事情变坏了,他人就应受到指责。这与他的另一信念互相冲突,即没有人愿意给予他任何事物,其结果是,他必须强迫他人来实现自己的愿望。正是在这里,受苦成了他的助手。受苦和无助成了他获得关爱、寻求帮助、进行控制的最主要的手段,与此同时,也使他能够逃避他人可能会强加在他身上的各种要求。

受苦还有最后的一种功能,即以一种伪装但却有效的方式来表达对他人的指责。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上一章中已作了较为详细的讨论。

当我们认清病态受苦的功能时,我们就已经揭开了这些神秘特征的面纱,但是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尽管受苦有这么多种策略性的价值,但是还有一种因素支持这样的一种思想:神经症患者想要受苦;他所受的苦常常超过了战略目标的合理程度,他经常夸大他的苦难,使自己沉溺于无助感之中。即使我们知道他的情感有可能是被夸大了,并且知道不能用表面的价值来判断他的情感,但

是,对这一事实我们还是感到惊异,即由他的内心冲突倾向所产生的失望,使他陷入了悲惨的深渊,这种悲惨的情景向他显示的意义被他夸大了。当他只有些微小成功时,他却戏剧性地将他的失败夸大成无可挽回的丢脸。当他只是不能摆正自己的位置时,他的自尊心就像泄了气的气球一般从天而降。在进行心理分析治疗时,他必须面对的不愉快的前景就是,要解决他陷入了绝对的无助这样一种全新的问题。我们还不得不考察,为什么他要因此看上去如此自愿地超出策略的需要之外增加他的受苦。

在这种受苦中,不可能获得明显的好处,他不能给大家任何印象,难以赢得任何同情,在确认将自己的意志加诸在他人身上的时候,没有任何内心的胜利感。然而,对于神经症患者来说,还是有所受益,只是以不同的形式而已。在爱情方面受到了失败,在竞争中受到挫折,必须认识到他自身的根本的弱点或缺点,对于一位具有鹤立鸡群思想的人来说,是难以忍受的。所以当他对自己的估价日渐低迷直至一无所有之时,就不再有成功与失败,优越与自卑的概念了;通过夸大自己的痛苦,通过沉溺于悲惨或一文不值的情感之中,那些日益恶化的体验就丧失了他的某种真实性,那么这种特别痛苦的刺痛就减轻和麻痹了。在这种过程中起作用的原理是一种辩证的原理,包含着这样的一种哲学真理:在某一点上量变转化为质变。具体说来,它意味着,尽管受苦是痛苦的,但是,放弃个人的自我,而沉溺于过度的痛苦,可以起抗拒痛苦的鸦片作用。

一本丹麦小说对这种过程作了精彩的描述,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位丹麦作家,他的可爱的妻子在两年前被奸杀了。他凭借那些只是模糊地经验到的事情发生的经过来排遣自己的痛苦。为了逃避对悲伤的认识,他没日没夜地埋头工作写出了一本书。故事的

叙述是从这本书的完成开始的,亦即他必须面对痛苦的最适当的时刻。我们首先在墓地上遇到他,踽踽独行,任意为之。我们看到,他正沉溺于最令人恐怖的、幻想的思考中,他想象蛆虫在咬着死尸,人们都被活生生地埋着。他精疲力尽地回到家中,然而,他的折磨仍在继续。他不由得回忆起事情发生的每一个细节。在那天晚上,当他的妻子外出访友时,如果他陪同她前往的话,如果她打电话给他,请他去接她,如果她与朋友呆在一起,如果他散步碰巧到达了现场,那么,凶杀就或许不会发生。他不由得想象事情发生的细节,那件谋杀案是如何进行的,他沉溺于痛苦的痴迷之中,直到最后丧失了意志。对我们已经讨论的问题来说,故事至此具有特别的意味。当他从放任的折磨中恢复过来以后,随后发生的事情是,他还得思考报复的问题,最终,他开始能够切合实际地面对自己的痛苦。这个故事中所描述的过程,我们在某些丧葬习俗中看得到,在这种习俗中,通过从强烈地加强痛苦到最后完全放弃痛苦这种过程来减轻丧失亲人的哀痛。

如果认识到夸大痛苦所起的麻痹作用,就能进一步帮助我们找到受虐动力背后的可以理解的动机。但是仍然存在有这样的一些问题:为什么这种受苦能产生满足,就像在受虐变态和幻想所明显表现出来的那样,以及像我们在一般的病态受苦的倾向中所看到的那样。

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就首先有必要认识到所有的受虐倾向所共同具有的因素,或者更确切地说,认识到潜藏在这些倾向之后的对待生活的态度。如果我们从这一点来考察这些因素,最终就会发现一种共同的现象,即它们都具有一种内在的软弱感。这种感受出现在对待自我、对待他人、对待一般的命运的态度上。简言

之,这种情感可以描述为一种深深的不名一文之感;仿佛是风中的芦苇,置身于他人的权力之中,惟他人之命是从;并为了主宰而永不屈服,首先表现出来的是强烈地需求关爱,其次表现为极端害怕反对,对自己的人生一无可说,希望他人承担自己人生的责任作出决定;感到善恶均来自外部,人对自己的命运无能为力,一方面消极沉沦,另一方面又希望不动一根手指就会有奇迹发生;感到在生活中如果没有他人提供动机、方法和目的,就无法呼吸、工作和享受人生;感到自己是主宰者手中的玩物。我们如何来理解这种内在的软弱感?归根到底,它是不是缺乏活力的一种表现?在某些情形中,情况可能是如此。但是,就整体而言,神经症患者的活力与正常人并没有多大的差别。它是不是基本焦虑的一种结果?的确,焦虑与此有些关系,但是,在催促人们去追求和获取越来越多的力量以便得到安全感方面,焦虑只能起相反的作用。

答案首先是,这种内心软弱感根本不是事实;感到软弱和表现为软弱只是一种倾向软弱的结果。这一事实可以从我们已经讨论过的特征中认识到:在他自己的情感中,神经症患者无意识地夸大了自己的软弱,并固执地坚持这种软弱。然而,不仅从逻辑的推论上看,可以发现这种软弱倾向,在工作中也可以经常发现这种软弱。在想象中,病人可能会抓住每一种可能性,认为自己有器质性的疾病。有一个病人,只要有任何困难产生,就十分有意识地希望自己有肺结核,躺在疗养院中,受到他人的精心照护。对他所提的任何要求,这种病人的第一种冲动就是服从,然后,又走向另外的一种极端:拒绝屈服,不惜代价。在分析治疗的过程中,病人的自我非难乃是他将预期的批评当作自己的意见的一种结果,所以显示出他乐意事先屈服任何判断。盲目地接受权威的主张,依附于

某人,总是以一种无助的态度从困难处退缩回来,总觉得“我不能”,而不是将它作为一种挑战接受它,这种倾向是倾向软弱的进一步的证据。

通常这些软弱的倾向中所包含的受苦并没有产生有意识的满足,而是相反,不论它服务于什么样的目的,它们肯定是神经症患者一般的悲惨意识的一部分。然而,这些倾向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即使当它们不能,或至少看起来不能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偶尔也可以观察到这一目的,有时候,也非常明显地看到满足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有一个病人去拜访她的一些住在乡村里的朋友,但是她感到非常失望,没有一个人到火车站来迎接她,当她到达时,有些朋友还不在家。至此为止,她说,她的经历都是痛苦的。但是,她后来感到自己滑到了一种极端的凄凉与孤寂的感觉之中。后来,她很快认识到这种情感与当时的情景不符合,有些夸大了。这种沉迷于悲惨的态度不仅会减轻痛苦,而且会感到相当的愉快。

这种满足的实现在具有自虐特点的性幻想和性变态中更为经常,更为明显,诸如被强暴、被鞭打、受侮辱、被奴役的幻想中,或在真正实施这些性变态的行为中都能得到满足。事实上,它们只是这种一般的软弱倾向的另外的表现。

通过沉迷于痛苦而获得满足,是通过如下的方式寻求满足的一般原则的表现:将自己丧失在更大的事物之中,消溶在个体之中,以怀疑、冲突、痛苦、限制和孤独来摆脱自我。<sup>①</sup> 这就是尼采所说的“从个体原则”中解脱出来的思想。这也就是他所谓的“狄俄

---

<sup>①</sup> 在受虐中获得满足,对这一问题的解释我与弗罗姆的解释基本相同,参见马克斯·霍克海默尔编辑的上引著作。

尼索斯”倾向,尼采认为,这种“狄俄尼索斯”倾向是人类的基本驱力之一,与他所称之为阿波罗的倾向相反,阿波罗倾向于积极地控制和主宰人生。鲁思·本尼迪克特也谈到狄俄尼索斯倾向,她的这种倾向指的是力图诱发狂欢的经验,并且指出这种倾向在各种不同的文化中流布甚广,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

“狄俄尼索斯”这个名词取自古希腊的狄俄尼索斯崇拜。这种崇拜,如同古代色雷斯人的早期崇拜一样,<sup>①</sup> 其目的在于强烈地刺激所有的感觉,使其达到梦幻的状态。产生出神状态的诸种手段是:音乐、高亢的节奏、午夜的狂欢、酗酒享乐、淫逸。所有这些活动都要达到狂热的兴奋和出神状态(“出神”这个词的意思从字面上看就是超越自我之外)。在世界各地,有很多习俗和宗教仪式遵循着下面的相同的原则:就集体而言,就是沉湎于狂欢和宗教痴迷;就个人而言,就是忘情于毒品。在产生狄俄尼索斯情景方面,痛苦也能起到同样的作用。在某些平原印第安人那里,通过捆绑、割下一块肌肉、以一种痛苦的姿态将人捆起来的方式来达到幻觉。在太阳舞——平原印第安人的一种最重要的仪式——中,身体的折磨乃是激发出神体验的最为常见的方式。<sup>②</sup> 中世纪的鞭身教派教徒们(the Flagellantes)使用鞭打来产生出神状态。新墨西哥的苦修会士使用荆棘、鞭打、负重物来达到出神状态。

---

① 欧文·罗德(Erwin Rohde):《心灵》,“古希腊人灵魂和信仰不朽的宗教仪式”(1925年版)。

② 莱斯利·施皮尔(Leslie Spier):“平原印第安人的太阳舞:其发展和传播”(The Sun Dance of the Plains Indians: Its Development and Diffusion),载于《美国自然史博物馆人类学论文集》(*Anthropological Papers of the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第十六卷,第七部分,纽约,1921年版。

尽管这些狄俄尼索斯倾向的文化表现不是我们文化的模式经验,但是,它们并不是完全与我们无关的。在某种程度上讲,我们大家都知道从“丧失自我”中所产生的满足。在一次身体或心理紧张之后,进入睡眠或者进入一种麻醉状态时,我们在这些过程中都感到这种满足。酗酒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在酗酒中,我们丧失了某些禁忌,这是它所包含的因素之一,而减轻悲哀和焦虑则是另一种因素。然而,在这里忘我和丧失自我的满足才是真正的目的。然而,有少数人还不知道在某些剧烈的情感中丧失自我的满足,不论它是爱、大自然、音乐、热心于探究,还是性的放纵。我们如何解释这些追求的普遍性?

尽管生活能够提供幸福,但是它同时也充满了无可逃避的悲剧。即使不遭受特别的痛苦,但是仍然还是有衰老、疾病和死亡这样的事实;用更为常见的话来说,这样的事实是人类生活中所固有的:个人是有限的、孤独的——有限,是因为他的知识有限,他的成就有限,或者说他的享乐有限;孤独,是因为他是独一无二的个体,与其同胞相互独立,与周围的环境分离开来。事实上,正是这种个体的有限性和孤独性,才要求我们去克服那种文化上的遗忘和弃绝的倾向。对这一点追求的最为辛酸而又美丽的表达在《奥义书》中就有了,它描述说:“人生就是一条河流,消失在大海之中,没有自己的名字和形状。”通过将自己溶入在一些伟大事物中,通过成为伟大事物的一部分,个人在一定的程度克服了他的局限性;正如在《奥义书》中所表达的那样,“通过消失在无中,我们成为宇宙创造原则的一部分”。这看起来就是宗教向人类提供的最大慰藉和满足;通过丧失自我,人能够与上帝和自然合而为一。献身于学术研究也能获得同样的满足;通过使自我沉湎于学术研究而使我

们感到与更为伟大的整体合而为一。

在我们的文化中,我们更可以了解到与自我相对立的态度,这种态度高度强调和评价个人的特殊性和独一无二性。我们文化中的人更为强烈地感到,他自己的自我是一个独立的统一体,与外部世界完全不同或者说完全对立。他不仅坚持这种个体性,而且他从这种坚持中获取更大的满足;他在发展自己的特殊潜力中,在主宰自己和世界中,在积极地征服自然中,在建构和做创造性的工作中,寻求自己的幸福。歌德曾就个人发展的理想说过这样的话:“儿童的最大幸福就是个性。”

但是我们所讨论过的相反的倾向——打破个体性的限制的倾向和摆脱有限性和孤独性的倾向——同样深深地植根于人类的态度之中,而且也孕育着无限的满足。这两种倾向本身都不是病态的;维持和发展个性与牺牲个性二者在解决人的问题时都是合法的目标。

没有哪一个神经症患者在放弃自我的倾向中不是以直接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他可能幻想自己离开了家乡成了一个流浪汉,或者幻想丧失了自己的身份;他可能幻想将自己与所读书籍中的一个角色等同起来;或者像一个病人所描述的那样,有一种遗弃在黑暗和波涛中的感觉;有一种与黑暗和波涛合而为一的感觉。这种倾向出现在渴望催眠的欲望中,出现在神秘主义的倾向中,出现在不真实的感情中,出现在嗜睡的需求中,出现在对疾病、疯狂和死亡的渴求中。正如我前面所提到的那样,在受虐的幻想中,普遍的现象是感到成了主宰者的玩偶,有一种完全被剥夺了意志力量,完全屈从于他人的主宰的感觉。当然,每一个不同的现象都受其特殊的方式决定,有其自己的意义。例如,被奴役的感觉可能是牺牲

感的一部分,其本身抗拒的是奴役他人的冲动,同时也是为了不让自己受到奴役而谴责他人。但是,尽管它具有表达抵抗和敌视的价值,但是其内心也具有自我投降的积极价值。

无论神经症患者是屈从于个人还是屈从于命运,不论他所允许加诸自己身上的痛苦是什么,他所寻求的满足看起来都是软化或消除他的个体自我。然后,他停止去做一个行动的积极承载者,成为一个没有自己意志的客体。

当受虐的欲望与一般的欲望现象结合在一起从而放弃个体自我时,通过软弱和受苦所寻求或获得的满足就丧失了它的奇异性;它被放在为人所熟知的参考框架内。<sup>①</sup> 神经症患者对受虐欲望的执着,可以通过这样的事实来解释:既充当防御焦虑的作用,同时又提供潜在的和真实的满足。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这种满足很少是真实的,除非是在性幻想或性变态中,尽管在软弱和被动的一般倾向中,对它的追求是一种重要的因素。所以,要提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神经症患者很少获得解脱和遗忘一切,也很少获得他所要的满足?

阻止明显的满足得以实现的一个重要的环境就是,受虐的欲望被神经症患者对独一无二的个性的极端的强调所抵消了。大部分受虐现象与神经症症状一样,都具有这样的特征:即屈从于不可比较的欲望。神经症患者倾向于屈服于每个人的意志,但是同时

---

① W. 赖希(W. Reich)在“心理关联与植物流”(Psychisches Korrelat und vegetative Stroemung)和“论性格分析”(Ueber Charakteranalyse)作了同样的尝试,要解决受虐的问题。他也主张,受虐的各种倾向与快乐原则并不对立。然而,他将受虐放在性欲的基础上,他将我们描述的消溶个体界限的欲望设想为性高潮的欲望。

又坚持认为,世界应该适应他本人。他倾向于感到受到了奴役,但是与此同时,他又坚持认为,把他的力量加诸给他人不应有什么问题。他想要无助和被人照顾,但与此同时,又坚持认为,自己不仅是完全自足的,而且事实上是无所不能的。他倾向于认为,他一无是处,但是如果不把他当作一个天才来对待,他又恼怒不已。在他身上,绝对没有任何满意的解决方法来调和这两种极端的态度,尤其是当这两种欲望极为强烈的时候。

这种追求解脱的欲望,在神经症患者身上比在正常人身上更为迫切。因为,神经症患者不仅想要摆脱恐惧、有限性、孤独感这些人类存在的普遍痛苦,而且要摆脱这样的一种情感:他陷入了一种无法解决的内心冲突以及由此冲突所造成的痛苦。而且他的那种渴求权力和自我扩张的矛盾心态也同样比正常人要强烈得多。诚然,他的确试图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即在同一刻既拥有一切又一无所有;例如,他可能会无依无助地依赖他人而生活,但是与此同时,又借助于他的软弱来行使他对他人的专制。对这样的一种妥协作用,他自己错以为是屈服他人的能力。事实上,有时候,即使是心理学家看起来也倾向于将二者混淆,认为这种屈服本身是一种受虐的态度。在现实中,与此相反,受虐者完全不能使自己屈从于任何事或任何人;例如,他不能将自己的全副精力用到学术研究上,或者,他不能完全使自己爱上另一个人。他能够使自己屈从于受苦,但是这种屈服完全是被动的,而引起他痛苦的感觉、兴趣和他人,都是他利用的手段,以便为丧失自我而努力。在自我与他人之间,没有积极的相互作用,有的只是以自我为中心,沉湎于自己的目的。真正地屈服于一个人或一件事是内在力量的一种表现;受虐性的屈服最终只是一种软弱性的表现。

为什么神经症患者追求的满足很少达到,其另外的一个理由就在于,在神经症患者的结构中具有一种内在的破坏性的因素,这一点我在上文已经描述过了。这些因素在文化的“狄俄尼索斯”欲望中并不存在。在狄俄尼索斯欲望中,没有构成神经症患者格的病态的破坏性因素,它不能破坏一切成就和幸福的潜在力量。例如,让我们将古希腊的狄俄尼索斯崇拜与疯狂的病态幻想加以比较一下即可知晓。在前者那里,其目的是为了暂时的出神体验,以便加强生活的快乐;在后者这里,忘情的欲望是一样的,但它既不是暂时的沉溺而导致重新的浮现,也不是使生活丰富多彩的手段。其目的是为了摆脱对自我的整个折磨,而不管它的价值是什么,所以,其人格的完整部分遂产生恐惧的反应。事实上,神经症患者的人格的一部分会役使其整个的人格,对这一灾难性的可能性,神经症患者感到恐惧,这种恐惧是神经症患者影响其意识过程的惟一因素。所有的神经症患者都知道,他极为恐惧会丧失理智。只有当这种过程被分成其组成部分——一种自我放弃的驱动力和一种反应性的恐惧——时,才能够理解他对明确满足的渴望,但是由于受到恐惧的妨碍,却又得不到这种明确的满足。

我们文化中的一种特殊的因素加强了与忘情的欲望相联系的焦虑。在西方的文明中,如果有的话,也只是很少的文化模式能满足这些渴望,即使不管它的病态特征。宗教能够提供这样的一种可能性,但是已经丧失了它的力量,并且只对大多数人有吸引力。不仅没有有效的文化手段来实施这些满足,而且我们的文化模式也不积极鼓励它的发展,因为,在一种个体主义的文化中,人们期望个人必须立稳脚跟,而且如果需要奋斗的话,必须能有自信心。在我们的文化中,如果在现实中屈服于自我放弃的倾向,就有受排

斥的危险。

在了解了通常阻止神经症患者实现其所追求的特殊满足之恐惧之后,就能够理解,对于神经症患者来说,受虐幻想和变态具有什么样的价值。如果他放弃自我的欲望表现在幻想中或表现在性生活中,他或许有可能逃避完全自我毁灭的危险。像狄俄尼索斯崇拜一样,这些受虐行为也提供暂时的忘情,而较少冒伤害自我的危险。通常这些自虐行为遍布整个人格结构;有时候,它们集中在性行为上,而人格的其他部分则比较不受它们的影响。有些男人在他们的工作中积极进取,大获成功,但是却不由自主地沉湎于变态的自虐之中,诸如着装女性化,扮演一个不听话的坏孩子,自我鞭笞等。另一方面,阻止神经症患者找到解决困难的满意办法的那些恐惧也遍布他的那些受虐的欲望中。如果这些欲望是性欲方面的,那么,尽管他具有性关系方面的强烈的受虐幻想,但是他会远离一切性的活动,他会对异性表现出厌恶的态度,或者至少有极大的性方面的禁忌。

弗洛伊德认为,受虐的欲望,在本质上是一种性欲的现象。他已经提出了诸种理论来解释这一点。早先,他认为受虐狂是性欲发展的一个明确的、生理决定阶段的一个方面。后来,他补充了他的假说,认为受虐的欲望与女性特征有内在的关系,具有一种希望成为女人的欲望。<sup>①</sup>最后,正如我们在上文提到的那样,受虐欲望

---

① 弗洛伊德的“受虐狂的经济原理”(The Economic Principle of Masochism),载于《弗洛伊德论文集》(*Collected Papers*)第二卷,第255~268页,和《精神分析导论讲演》。也可以参见卡伦·荷妮:“女性受虐狂问题”(The Problem of Feminine Masochism),载于《精神分析评论》(*Psychoanalytic Review*),第二十二卷,1935年版。

是自我破坏和性欲欲望的一种结合,其功能就是要使自我破坏的欲望对个人无伤害。

另一方面,我自己的观点可以总结如下:受虐的渴望,既不是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性欲的现象,也不是生理决定的过程的结果,而是来源于人格冲突。它们的目的是为了受苦;神经症患者像任何人一样都不希望受苦。病态的受苦,就其所发挥的作用而言,不是个人所想要的,而是他所付出的代价,而他所要达到的满足目标,不是受苦本身,而是放弃自我。

---

## 第十五章 文化与神经症

即使是最富有经验的心理分析家,每次个体分析都会碰到新的难题。在每一个病人那里,他都会发现自己面临着以前从未碰到过的困难,面临着一些不仅难以认识,而且更加难以解释的一些态度,面临着一些初看起来不那么透明的反应。反观病态性格结构的错综复杂,正如我们在前几章所描述的那样,考虑到许多相关的因素,这种多样性就不会令人惊异了。一个人在其一生中所继承和经历的各种不同的物质和情景,尤其是在儿童时期的情况,在建构相关的神经症因素上,产生了多种多样的特异性。

但是,正如开头所指出的那样,尽管有这些个体的不同性,围绕神经症患者成长的关键性的冲突在实际的生活中总是相同的。一般说来,它们也是我们这些健康人在我们的文化中所遭逢的冲突。尽管真正说来我们不能清楚地区分神经症患者与正常人之间的分别,但是,再次重复这一点也是有益无害的事情。很多读者面临着这样的冲突和态度,在他们自己的经验中认识到这样的冲突和态度,可能会反躬自问:我是不是一个神经症患者?最有效的标准就是:个人是否感到受这些冲突的困扰,他是否直接地面对它们,处理它们。

当我们认识到了我们文化中的神经症患者乃是由同样的潜在的冲突所引起的,认识到正常人也在较轻的程度上屈从于这些冲

突,我们又会面临着在本书的开头所提出来的这样一个问题:神经症既然集中在我们描述的那些特殊冲突上,而不是集中在其他的冲突上,那么,我们文化中的什么因素是导致这一事实的原因?

弗洛伊德曾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但是没有作出深入的探究,他的生物学的取向站在对立的一边,缺乏社会学的取向,所以,他试图将社会现象完全归结于心理因素,并且将这些心理因素再归结为生物的因素(里比多理论)。举例说来,他的这种倾向导致精神分析学者相信,战争是由于死亡本能作祟,我们现在的经济体系植根于肛欲驱力,而机械时代之所以没有在 2000 年前开始,乃是因为在那个时代没有发现自恋情结。

弗洛伊德看到,一种文化,不是一种复杂社会过程的结果,而只是那些被压抑或升华的生物驱力的结果。人们建立了反应形式以抵抗这些生物的驱力。这些驱力的压抑越彻底,文化的发展程度也就越高。因为升华的能力受到了限制,又因为原始驱力受到了强烈的压抑而没有得到升华而导致了神经症,所以文明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导致神经症的发展。神经症是人类为文化发展所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这套思路的基础就是这样一套明确的假设,它相信,存在着一种受到生物决定论的人性,或者更简洁地说,它相信,口欲、肛欲、生殖器和进攻的欲望以相等的数量存在于所有人的身上。个体的人格发展各自不同,文化之间的特性大相迥异,乃是由于所要求的压抑之强度之不相同,以及这种压抑的不同的程度影响不同的驱力的结果。

历史学和人类学上的发现并没有证实文化高度与性或进攻驱力之压抑之间有这样的一段直接的关系。弗洛伊德的错误主要在

于,他没有设定质的关系,而只是设定量的关系。这种关系不是压抑与文化之间量的关系,而是个体冲突与文化困境之间质的关系。量的因素当然不能忽视,但是,它只有在整个结构关系中才能加以评估。

我们的文化中内在地固有一定的典型的困扰,这些困扰本身作为冲突反应到每个人的生活之中,这些困扰的日积月累可能会导致神经症的形成。由于我不是一个社会学家,我将只是简要地指出一些主要的倾向,这些倾向承载着神经症和文化的问题。

从经济上看,现代文化是基于个体竞争原则之上的。孤独的个体不得不与同一群体中的其他个体进行斗争,不得不凌驾于他人之上,并且常常要将他们踢到一边。自己的利益通常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这种情景的心理结果,是个体之间的混淆的敌视情绪。每个人都是另外一个人的现实的或潜在的竞争对手。这种情景在同事之间最为明显,不论他们之间的竞争是否公平,或以彬彬有礼的态度装出君子之风。然而,有必要强调的是,竞争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潜在的敌视,遍布一切人类关系之中。竞争是社会关系中最主要的因素之一。它遍布在男人与男人的关系之中,女人与女人的关系之中,而不论其竞争之点是受欢迎、权力、吸引力还是任何其他的社会价值之上,它都会极大地阻碍可以信赖的朋友关系的可能性。正如上文已经表明的那样,它也扰乱了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不论是在选择伴侣方面,还是在与他人竞争优越的地位方面。它还遍布在学校生活中。而且,最为重要的是,它遍布在家庭环境之中,因此,一般说来,儿童一生下来就播下了这样的种子。父子之间的竞争、母女之间的竞争、子女之间的竞争,不是一般的人类现象,而是文化环境刺激的结果。弗洛伊德的最大成

就之一就是看到了家庭竞争的作用,正如在俄狄浦斯情结这一概念和在其他的假设中表达的那样。然而,有必要补充的是,竞争本身并不是生物的本能,而是一定文化环境的结果。因此,进而言之,家庭环境并不是激发竞争的惟一环境,这种竞争的刺激从生到死都是积极地活动着。

个体之间的潜在的敌视情绪导致了不断产生的恐惧——对他人的潜在敌视的恐惧,又会因自己对他人的恐惧而产生报复,从而为新的恐惧所加强。在正常的个体那里,恐惧的另一个重要来源就是,对失败的预期。对失败的恐惧是一种真实的恐惧,因为,一般说来,失败的机会非常之大,而成功的机会非常之少,而在竞争社会中,失败包含了一种真实的需求的挫折。它们不仅意味着经济上的无安全性,而且丧失了声誉,并且充满了各种情绪上的挫折。

为什么成功是如此的一个引人入胜的现象,它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它对我们自尊的影响。不只是他人会按照我们成功的程度来评价我们,我们自己也会按照同样的模式来进行自我评估。根据现存的思想,成功乃是由于我们内在的优点,或者用宗教术语来说就是,是上帝的恩惠的可见标志;在现实中,它依赖不受我们控制的大量因素——偶发的环境、不讲道德性等等。然而,在现存的意识形态的压抑下,即便是最正常的人也不由得想到:当他获得成功的时候,就会获益良多,如果他被打败了,他就会一钱不值。不用说,这一点表现了自尊的不稳定性基础。

所有这些因素——同事之间的相互竞争与潜在的敌视、恐惧、日益消减的自尊——结合在一起,在心理上导致了个体这样的情感:他是孤独的。即使当他与他人具有很多的接触,即使他幸福地

结了婚,他在情感上也是孤独的。情感孤独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难以忍受的;然而,如果它与恐惧和不自信结合在一起,那么,它就会成为一种灾难。

正是这种情景,在我们时代的个人那里,产生了对爱的强烈需求来作为补充。获得关爱使他感到更少的孤独,更少受到敌视的威胁,更少不自信。由于它是人们最重要的需求,因此,爱情便在我们的文化中被过高地估价了。它变成了一种幻想——就像成功具有这样的一种幻想:它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爱情本身并不是一种幻觉——尽管在我们的文化中,它是最常见的满足欲望的反映,尽管这与爱毫不相干——但是由于我们对它期望太多,而它又不可能实现,因此,它便成了幻觉。而且,在我们的思想中,我们过分地强调我们强加在爱情上的那些东西,因此,它掩盖了促使我们强烈需求它的那些因素。因此,个人——我在这里仍然指的是正常的个人——处在两难的境地之中:既需要大量的关爱,又难以获得这些关爱。

到目前为止,这些情景体现了神经症发展的肥沃土壤。影响正常人的同样的文化因素——导致他动摇自尊、潜在的敌视、恐惧、包含恐惧和敌视的竞争、满足个人关系的强烈需求——在更高的程度上影响神经症患者,在他的身上其结果更为严重——崩溃了的自尊、破坏性、焦虑、包含焦虑和破坏冲动的强烈的竞争、对关爱的过分需求。

如果我们记得,在每个神经症患者那里都有一些无法克服的矛盾的倾向,那么,我们就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在我们的文化中是否有一定的矛盾潜藏在典型的神经症冲突之中,研究和描述这些文化矛盾是社会学家的任务。对于我来说,简要地、提纲挈领地指

出一些主要的矛盾倾向就足够了。

首先要提到的矛盾就是：一方面是竞争与成功，另一方面则是手足之情与侮辱之间的矛盾。一方面，一切事情都要求我们为成功而行事，这就意味着，我们不仅要自信，而且要充满竞争意识，从而才能迫使他人出局。另一方面，我们如此之深地充满基督教 ideal，这种理想宣称，为自己占有一切是自私自利的行为，我们应该谦卑，要顺从，如果有人打我的左脸，我应该同时将右脸也凑过去给他打。对于这种矛盾来说，在正常的范围内只有两种解决的方法：要么严肃地接受这一欲望，舍弃另外的需求；要么二者兼得，但是其结果就是个人在这两种信念上都受到严格的禁止。

第二个矛盾冲突是：刺激我们的需求与在满足这些需求时我们在现实中所遭受的挫折。由于经济的原因，我们的需求日益受到我们文化的刺激，诸如：广告、“标新立异的消费”、与名流看齐的理想等等。然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些需求在现实中是很难实现的。对于个体来说，其心理结果就是：欲望与满足之间严重的失衡。

另一个矛盾就是个人陈述的自由与实际生活中的限制之间的矛盾。社会告诉我们说，个人是自由的，独立的，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决定自己的生活：“生命的最大游戏”向他敞开，如果他有能力、有精力，他能得到自己所需要的一切。但是，在现实中，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所有这些可能性都是受限制的。正如俗语所说的，“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父母”，这句话可以引申到一般的生活之中——在职业上的选择和成功，选择娱乐的方法，选择伴侣，莫不如此。对于个体来说，其结果都是在决定自己命运的无限权力与生命的无助感之间的摇摆不定。

深藏于我们文化中的这些矛盾,正是神经症患者要努力调和的冲突:进攻和屈服的倾向;过度的需求与对一无所获的恐惧;自我夸大的欲望与无依无助感。他们与正常人的区别仅在于量上的不同。正常人可以在不损害人格的前提下处理这些困境,而在神经症患者那里,所有这些冲突都极为强烈,以致达到了不可能有任何满意的解决方法的程度。

看起来,那些有可能变成神经症的患者,似乎是那些十分敏锐地体验到文化环境的人,他们通常由于孩提时的体验,结果无法解决这些冲突困境,或者只能牺牲自己的人格来解决它们。我们不妨称他们为我们文化的继子。

深藏于我们文化中的这些矛盾,正是神经症患者要努力调和的冲突:进攻和屈服的倾向;过度的需求与对一无所获的恐惧;自我夸大的欲望与无依无助感。他们与正常人的区别仅在于量上的不同。正常人可以在不损害人格的前提下处理这些困境,而在神经症患者那里,所有这些冲突都极为强烈,以致达到了不可能有任何满意的解决方法的程度。

看起来,那些有可能变成神经症的患者,似乎是那些十分敏锐地体验到文化环境的人,他们通常由于孩提时的体验,结果无法解决这些冲突困境,或者只能牺牲自己的人格来解决它们。我们不妨称他们为我们文化的继子。